

目 录

文 献

- 论敌后抗战 聂荣臻 (1)

回 忆 录

- 北伐和南昌起义 (下) 李一氓 (8)
接管沈阳记事 李 锐 (30)
我的革命生涯 张庆孚 (72)
战斗在胶东抗日战场的日日夜夜 王 彬 (90)

日 记 摘 登

- 随毛主席重上井冈山日记 汪东兴 (124)

人物介绍

革命教育家谢台臣传略

..... 中共濮阳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 (145)

专题资料

闽粤赣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及其

斗争情况 闽粤赣边区党史办公室 (156)

中共组织史资料

五大至六大期间东北三省党的组织

状况 赵 朴 (198)

《中共党史资料》(1—40辑) 目录索引 (208)

论 敌 后 抗 战

(1943年10月)

聂 荣 臻

华北敌后之抗战，迄今已六年多，斗争之残酷实为历史上空前所未有。就华北之一角——晋察冀边区而论，其尖锐复杂而剧烈之斗争形势实远处大后方的人士所想象不到的。迄抗战六周年为止共计作战 17450 次，共毙伤俘敌伪 235364 人。我亦伤亡 64670 人。一点一滴的胜利都是从一点一滴之流血斗争中得来的。

几年来敌我在武装斗争方面，曾经过许多发展与演变，1938 年武汉陷落之前，敌人即已开始对我举行进攻，屡次集结优势兵力，以正规战术作战，攻我一面（如阜平、涞源等地）。武汉会战之际，敌同时大举进攻我五台、阜平，且将“扫荡”华北与进攻武汉相提并论；在战术上改取分进合击的数路“围攻”方式，然仍未脱离机械的军事教条之束缚。我以游击战、运动战相辅与之对抗，因之使敌找不到我固定阵地与固定战线，而常于扑空之余，遭我痛击。1939 年，敌则集结相当优势兵力为一路，采取“长驱直入”地袭击我之中心地区（如灵寿之陈庄及涞源之黄土岭

等役)，但均遭受歼灭性之打击。进攻陈庄之敌，全军覆没。日军独立第2混成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则随其部下葬身于黄土岭，就是敌寇所谓“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敌屡次惨败，故自1940年起，乃实行所谓“极度分散配备”，以控制平原各大村镇与山地各要点，以冀窒息我军。奈兵力既感不足，再加分散配备，则弱点愈多。1941年百团大战展开后，不仅敌在山地若干据点被我拔除，即沿铁道封锁据点亦均遭我猛烈破坏。我在战术上不仅展开广泛游击战，而且局部地展开对敌阵地之攻击。于是敌之分散配备亦告失败。乃复调集大的兵力“分进合击”，向我大举“扫荡”，并一度侵占我阜平。但在我运用游击战与运动战配合打击之下，使侵占阜平之敌于弹尽援绝之后，狼狈逃窜。

1941年敌酋冈村宁次鉴于既往之失败，乃谋改弦易辙，实施所谓“铁壁合围”战术，以中条山与晋察冀为全年两大战役进攻目标。经长期之准备，企图先荡平中条山根据地，截断敌后我军与主力之联系，结束后，立即转其凶锋指向我边区。战斗一经开始即分十数路直扑而来，山沟小道，无所不至，反复“围剿”，在战术上则与“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并用，杀戮焚掠，凶残无比。然经我将士之浴血抗战，迭挫敌锋，纵敌酋冈村亦不得不承认失败，并谓：“荡清八路军，非短时间所能奏效”。而只得以“狮子扑鼠，效力不大”等遁词聊自解嘲，其窘态可想见矣。之后，敌复强调“高度之分散配备”，增筑碉堡及

封锁沟墙，其密度几至逐村皆是。封锁既成，乃实行其对我根据地之“蚕食”政策。直到今天，“蚕食”政策亦经多次演变。初则“步步推进”，继则“分区扫荡”，“分割蚕食”，以达其“蚕食”之目的。1942年对我冀中区之“扫荡”战，即属此种性质。然敌此种紧缩“蚕食”之目的，至今虽已付重大代价而犹未遂其所欲，且亦将永不能遂其所欲。至其分散配备之结果，愈使敌军兵力分散，由之纪律废弛，其腐化，堕落，厌战，反战之情绪亦随之增高，战斗力亦日趋低落。如此，我军纵在堡垒如林，沟墙如网之广大战场上仍能纵横驰骋，游击战争之火，更广泛燃烧于敌占区。变敌后为前线，远近交攻，敌我交错，我之前锋更早已越长城榆关而插入伪满边境，震撼敌人之心脏。战局之发展将益增敌寇惶恐，而促其败亡。

六年余敌我斗争之尖锐与复杂之形势，不仅表现于军事方面，而且表现于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之综合斗争。自1941年起敌即开始其所谓“总力战”，此“总力战”之表现最显著者，即敌寇所进行之“治安强化运动”，自1941年起，前后已举行六次之多，其中心则各期不同。就我边区而言，敌寇在其“治安强化运动”中，集中于人力物力之抢夺，及政治上思想上之诬蔑造谣，企图达到其“以华制华”之目的。敌以兵力不足到处抓捕壮丁，扩编伪军，充实守备兵力。现敌占领区大部分均由伪军防守，此等伪军一部分为失业或流亡者之集团，敌寇本拟利用之于一时，结果多与愿违。而今敌寇去之不能，欲“肃”之又不胜其

“肃”。若干地区，如大清河以北，与其说是敌寇“治安区”，毋宁说是伪军统治地。另一部分伪军，则大部为农村之壮丁，被强迫捕捉而来，他们既无战意，又无战力。尤其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敌寇必败之势日渐明显，造成伪军普遍动摇，日寇也明知其不可信，然不得不利用之于一时，此乃其严重之危机。敌寇对物力之掠夺，乃图达成“以战养战”之目的。敌曾以“开发资源”、“确保农产”、“勤俭增产”等类口号相号召，但实际上敌寇之所为，适得其反。敌寇到处挖沟筑堡，强占与毁坏人民田地房屋不知凡几；而苛捐杂税，勒索掠夺，层出不穷，加之壮丁之被捕走或逃亡，致使敌占区农村或有地无人耕，或有人无地种，或有人而无心耕，终至“增产”成为空言，经济之危机日趋严重；而我对敌之经济封锁，更使敌寇之经济困难有加无己。日寇明知敌后人民与之尖锐对立，乃极力进行所谓“思想战”，宣扬所谓“皇道精神”，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但“七分政治”之一切欺骗假面具，早被其“三分军事”之残酷暴行暴露无遗。“三光政策”之下，遍地血腥，使广大中国人民益增与敌不共戴天之深仇。数年来，敌后军民在对敌斗争中，涌现众多民族英雄，其惊天动地之壮烈事迹，传遍人民之间，记不胜记。于是敌寇“思想战”亦宣告破产。此外，敌寇所擅长者乃在政治上挑拨离间，破坏我军民关系，离间我抗日军队之团结，更无一日放松，且以此为谋略之重要部分。我们回答敌人的，却是更千百倍地提高了我们的警惕，肃清了各种潜藏的第五

纵队分子，加紧抗日阵营的团结，粉碎敌寇的阴谋。

六年余敌后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战争是无情的，不战不能存，不战更不能胜。我军采用之战术基本上为游击战，但此种游击战决非等闲的“游击战”，更非一般墨守战术教条者所可比，也不是仅守过去游击战争的“老一套”经验。游击战术发展至今日，乃是在既有的战争经验基础上，再从六年余抗日战争中，不断获得新的经验，而高度发展之结果。斯大林说：在战争中不进步者即将为敌人所击败。这虽指现代最优良之军事装备与作战技术而言（我们固然没有现代化优良装备），但我之战术，必须适应我现有装备而力求改进，其理则亦相同也。

（一）我民族自卫战，必须为全面性之总力战，为军事，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复杂配合之战争，若根据单纯军事观点去组织抗战，决难取胜。尤以我军远处敌后与大后方断绝，得不到任何补充，仅凭简陋之武器与强敌周旋，若忽视各种斗争之配合，则不仅我军事上不能取胜，敌且从其他方面以攻我。须知敌以不义之侵略战，对我正义之保卫战，政治上之优势在我而不在敌。故我须以政治上之优势与军事斗争相配合，以对抗敌之军事优势，以求在各种复杂斗争中改变敌我之优劣形势。

（二）必须真正实现民主政治，给人民以民主自由，改善人民的生活，真正能动员组织并武装广大人民，才能真正发挥总力战之力量，并使军民成为鱼水不可分之整体，否则孤军苦战，必难获胜。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即有全国总动

员之号召。我们坚持敌后抗战，六年来恪遵此种号召，认真动员组织与武装广大人民参加各种抗日斗争，故能坚持敌后作战以至今日，且将继续坚持下去，直到最后胜利。

(三) 团结乃战胜敌人之唯一武器。军队与军队间，军队与人民间，均应以抗战第一，胜利第一为目的；消除任何不团结的现象，反对任何减削自己力量的行为，不予敌人以任何可乘之机。

(四) 坚持敌后战争，必须创立赖以凭依的根据地，作为战略基地，以遂行独立作战之战斗任务。无论武装部队，地方政权，民众组织以及经济文化等设施均必须有完善具体之整套办法，更须完全适合敌后斗争之环境，不能囿于成规，固守旧习，如不明此理，武断专行，否认各种建设，则抗战之胜利与建国之成功，都不过徒托空言。我晋察冀边区行政当局不仅有其各种设施维系敌后人心，团结广大人民在保卫祖国的旗帜之下，获得温饱，并使敌占区同胞心向祖国，精神上有所寄托，其作用亦非常巨大。

(五) 在这样残酷的对敌斗争中，要能够领导各阶层人民团结一致的对敌作战，这就必须有照顾各阶级，各阶层人民共同利益的政策。我们所坚守的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根本精神，不但为大多数人着想，也为少数人着想，更为全国人民抗战利益着想。

(六) 在敌后作战之部队有成功者，有失败者，因此，我们就必须有严正之赏罚制度；虚心检讨其成功或失败的原因，得出经验教训。如果是赏罚不明，墨守成规的军队，

早就是军党代表或政治部主任。没有革命群众，而只有一些军政干部，不能形成一个革命的武装集团。当时，军队开党员会议时，到会的绝大部分是校、尉军官，士兵党员很少，有几个独立团的党员士兵在座是非常显眼的了。士兵党员如此之少，支部就无法建立在连队上，只有独立团少数连有支部。井冈山朱毛会师以后，士兵党员才多起来，普遍把支部建立在连队上。这样，自然形成了一支真正为人民解放而战斗的群众武装。不管发生什么情况，这支队伍都能确保是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力量。

我想大革命失败的军事教训，总的来说，第一，要有一支各级指挥员都是共产党员的武装；第二，这支武装要把党的基础建立在连队上。

郭沫若脱离了总政治部之后，改任第二方面军的党代表^①兼政治部主任，总指挥是张发奎（字向华）。以南昌政治部的班底成立这个政治部，时在7月底。那个时候武汉是乱哄哄的，党虽开了第五次代表大会，但方针并不明确，思想并不统一。我在武汉无事可做，要在武汉等出个什么名堂是等不出来的，而且好多人都已经离开武汉去九江，去南昌。这时张发奎在九江，郭沫若也在九江。我只好离开武汉，去九江报到。到九江报到后，首先感到的到不是政治危机或者军事危机，而是经济危机。在九江，武汉中央银行的钞票一天一天的不值钱，一个人吃一顿饭要10多块

^① 一说是副党代表，见1927年6月23日《汉口民国日报》。

钱。拿那时九江生活水准来说，吃一顿好饭一块钱也就足够了。物价高涨，市场混乱，对这种情况，我们是什么办法也没有。至于政治军事问题，究竟怎么搞法，在党内也是各说各的，一下也弄不清楚。

这时，郭沫若带了几个人上庐山去了。8月1日下午张发奎通知我，要郭下山。郭下山后就去找张发奎，张告诉他，南昌已经成立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名单上有你也有我，但是我是不会去的。他问郭何去何从，并表示可以继续留在他这个方面军，当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张希望他留下来，但又说，假如郭想到南昌去，他也不勉强。郭沫若当时表示，他不好留下来，既然南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组成有他的名字，他就应该去。

张发奎答应郭沫若把这个政治部带到南昌去，并且派一只汽船，从湖口经过鄱阳湖进入赣江，把我们送到南昌。但是，当我们回来正在打行李准备上船的时候，张发奎又打电话来，变卦了。托辞没有汽船，只能派一辆摇车（铁路上用的手摇的急救车，只能坐四五个人），送我们去南昌。至于哪些人去，由郭沫若自己选定。这下就没有办法了，所有交通工具都在张发奎手里，我们也搞不到什么汽船，这个政治部，连人带物，就只好全交给张发奎了。虽然群龙无首，但我们也不能把政治部的党员留在张发奎那里。于是决定政治部里的党员全部撤出来送回上海，由潘汉年带队。政治部里非党的工作人员都留给张发奎。政治部的主要物资，特别是一些枪支弹药，我们就交给当时在九江负

责地方工作的陈奇涵了。

摇车到手以后，上摇车的人只有五个。郭沫若带一个警卫员，我和欧阳继修（欧阳那时是第四军政治部的秘书）加上梅电龙，他那时是第四军（军长黄琪翔）第十一师（师长缪培南）政治部主任。这样，我们坐上这辆摇车，沿南浔路（南昌——九江）到南昌去了。但是路上又起了两个波折，并不顺利。

一是当天傍晚的时候，来到张发奎部队的警戒线（德安），被当地驻军拦住，不准我们通过。我们把张发奎的手令（张亲笔写的一张小条子，通知前线部队让我们出境的一个命令）给他看，他也不相信。我们就被扣在那个地方，找连长也不行，找营长更不行，营长以上就没有人了。天一黑，只好守在摇车上。第二天天刚蒙蒙亮的时候，才予以放行。这时已经是8月4日的早晨了。

二是我们的车子到涂家埠以后，在车站上停下来，这时车站上有一辆火车头。我们想要求火车站站长，把这个火车头向南昌开，比我们坐摇车快。但是这个车头上趴的全是在南昌缴了械的第三军朱培德部的散兵。这就引起了一个矛盾。我们要向南昌，他们要向九江。这些散兵又跑到摇车上抢我们的枪，并且打我们的人。众寡悬殊，我们当然打不过他们，幸好我们躲进了站长的房间，才免于吃大亏。那个站长很机灵，他立刻吹哨子叫开车，火车的汽笛一响，这些散兵立刻把我们甩掉争着跑回去，爬上那辆火车头。但究竟我们还是挨打了，郭沫若和我，还被抢去

了两支驳壳枪。我们也只好依然坐摇车离开涂家埠前进。

要是没有这两番周折，我们可能早就到南昌了。摇车到牛行车站的时候已是下午了。在当时的军事情况下，牛行车站没有什么人，赣江上也没有渡船。也弄不清楚为什么南昌的警戒线不放在牛行。想了好多办法，才和南昌打通关系，南昌才放了一只渡船过来，把我们接过赣江。

到了城里才知道部队明天早晨就要离开南昌向广东前进，因而大家都忙忙乱乱的。南昌前委只简单地听了一下我们脱离张发奎部队赶到南昌的情况。郭沫若作为革命委员会委员兼宣传委员会主任，兼总政治部主任，当然跟着革命委员会的建制行动了。欧阳继修被委任为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的政治部主任。师长是古勋铭，国民党左派军人。梅电龙任二十四师第七十团的党代表，团长是刘明夏。我任参谋团秘书长。当晚，四个人就分开了。参谋团主任是周恩来，参谋长是刘伯承。现在一些记录说周只是参谋团的成员，完全不对。主要因为只有一个政治上的革命委员会，没有一个军事上的总司令部，而刘伯承用参谋长的名义也不能指挥整个部队。周恩来既是参谋团主任，又是党的前委书记，所以实际上他就是这支起义军的总司令。在整个起义过程当中，我还经常和郭沫若见面，但同欧阳继修和梅电龙就没有见面了，一直到起义失败大家回到上海。

这支起义部队其实也并不稳定。参加起义的第十一军第十师师长蔡廷锴出了南昌到进贤境内，就脱离了指挥，带着这个师单独向福建开走了。直到他这个部队的共产党员

被他礼送出部队以后，我们才知道。这又少了一个师的兵力。给朱德一个军的番号叫第九军，他任军长，实际上并没有自己的部队，只有一个空的军的番号。在部队进入广东韩江地区，留下十一军周士第师住大埔的三河坝，向梅县方向警戒，归有军长衔的朱德指挥。所以这个师在南昌起义失败以后，经过许多的周折和战斗，一直由朱德带领着，1928年才和毛泽东的秋收起义部队汇合，编成中国工农革命军（随后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

部队向广东前进的时候，在江西会昌和广东的钱大钧部队打了一仗，把广东军队击溃和消灭了一部分，并占领了会昌城。陈赓就是在那次战斗中负伤的。这次胜利，保证了这支部队向广东的顺利前进。钱大钧是敌南路指挥，所辖为第二十师、第二十八师、新编第一师，共10个团，还有桂军黄绍竑部7个团。我方由朱德指挥的是教导团和第二十军的一部分；叶挺指挥第十一军的第二十四师和第二十五师；贺龙率领的第二十军位于瑞金附近。

南昌起义部队离开江西入福建以后，驻在汀州上杭地区。当时邓子恢、张鼎丞正在那里搞农民运动，渴望得到一支军事力量的支持。若是这支很整齐的武装，不去打广东，而是留在闽粤赣这个三角地带，一面巩固，一面扩大力量，是会取得很大的成果的。可惜当时只有军队进行武装斗争的概念，没有农民进行武装斗争的概念；只有建设城市根据地的概念，没有建立农村根据地的概念。虽然后来仍然建立了以瑞金为中心的赣闽粤苏维埃根据地，但已

是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失败以后的事情了。在这点上，我们都要佩服毛泽东同志搞农民战争的战略指导的远见卓识。对于农民这个阶级的社会地位，生活情况，心理状态和它的历史渊源，当时中国共产党内，没有第二个人比他在这方面有更好的真知灼见了。

离开南昌以后，经过抚州（临川），那时候还是夏末，抚州还有很好的西瓜。过宜黄、广昌、石城到瑞金，都是平路，或稍微有点丘陵，全靠步行。在瑞金的时候，周恩来同我商量，要介绍郭沫若入党。究竟是郭沫若提出在先，还是组织上要他入党在先，现在无从说起。我看这不是一个重要问题，因为当时作为郭沫若来讲，入党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瑞金到汀州要翻一个武夷山脉，也不觉得很高。只是后来走得太疲劳，见了水就想坐船，全不了解汀江的上杭到永定这一段全是礁石，而且水的落差很大、很急。我们搞到一只船后要船夫向下游开，老船夫向我们做了许多解释，全是福建话，我们听不大懂，只一个劲儿要他向下游开。船是开出去了，不久就发觉这个船已落到急流当中，下游屡见礁石，要想靠岸也不可能了。我们前面有的船已被打碎了，有的人趴在礁石上，毫无办法。我们也无法停下来救他们。所幸我们这个老船夫本领很大，熟悉水性，把那些礁石绕过了，很快地到了永定，水流才平缓下来。我们这几个坐船的丘八对于这个船夫真是感激不尽。现在有漂流黄河的英雄，有漂流长江的英雄，经过这段急流，我

们也算是漂流汀江的英雄了。

从永定进入广东，到达大埔的三河坝时，我得了急性肠胃炎。在三河坝镇上，找到个卖药的医生，也没有什么药，他给了我一杯白兰地，居然酒到病除。至今我还相信白兰地可以治这类肠胃病。我们在三河坝没有停留，直奔大埔。我们住进大埔城里的一户人家，弄午饭吃。一打听，这是邹鲁的家，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拿他家里的米菜弄了一顿饭吃。部队南下经过潮安到汕头以后，向揭阳、普宁方向攻击前进，企图进入海陆丰地区。在丰顺的汤坑地区就跟敌人遭遇了，9月27日、28日连打了两天很激烈的仗。因为二十五师留在大埔的三河坝了，还有二十军的第三师留在潮安了。我们参战的只有叶挺一个师，贺龙两个师的兵力，人数不过六七千人。敌人却有一万多人。我军在汤坑一带牺牲颇大，作战失利。

在汕头的时候，传来的前线消息很不好，部队大约在9月29日、30日分别撤下来。同时也不能够孤守在汕头，因此汕头的人马和部队集合起来，避开敌人，还是向海陆丰地区前进。因为那里经过杨殷和彭湃工作，群众基础好。但这时部队组织比较松散，纪律不严格。我虽向刘伯承同志提起，我以为他是参谋长，说话会算数的，但他只是无可奈何地摊开双手，说他也指挥不了什么人，这支部队，那支部队，互不统属，行军速度很慢。10月4日下午部队行军到揭阳流沙，前面的山头上，聚集了一些人，人数不多，向我们开枪。这下部队就乱了，各不相顾，没有部队担负

掩护，没有部队向山头反击，也看不见一个指挥员站出来指挥部队的行动。时间是很快的，一转眼就到了黄昏了。这时我周围除了一个参谋团的参谋，和几个潮州同志以外，更无别人。我们只能打自己的主意。我是四川人不会讲广东话，那参谋（大概黄埔四期或五期学生）是山西人，也不会讲广东话。我们只能听这几个潮州同志的安排。因为他们都会讲客家话，也有群众关系，还熟悉社会情况。确定的方针大体是我和山西同志经香港回上海，他们则把我们送离广东以后各自回家。犯难的事情是我们两个人身上都没有一个钱，怎么筹到回上海的路费。我突然想起我们进入汕头的时候，曾和郭沫若去过创造社在汕头的出版部，可以冒一个小险，回到汕头，去向他们借几个钱，大概不会有什么问题，而且汕头去香港交通也方便。因此大家都同意，我们一起去汕头。我和山西同志夹在几个潮州同志中，什么话也不说，不分昼夜地向前赶，不知在一个什么小站赶上了潮（安）汕（头）铁路去汕头的火车，我们就大摇大摆地坐上去了。这条路是1904年到1906年，由华侨资本修成的，是条窄轨铁路，全长共39公里，1939年日寇入侵汕头时，被拆毁了。

我们到了汕头一打听，汕头驻军是薛岳，我想不怕，即或出问题，我们还有一面之缘。当然最好不去碰他。打定主意后我们径直到创造社的汕头出版部（地址在汕头外马路张园15号二楼），找到他们的经理梁海生直说，想借几个钱去香港。看在郭沫若的面子上，或者出于对革命事业

的同情，他慷慨地借给我们 30 块钱。潮州同志还帮忙，给了我们一个广东省委在香港的通讯处。谢别了潮州同志和梁海生，我们便动身去了香港。那个在香港的广东省委通讯处还是很灵的，接上关系，发了我们两个人每人一张去上海的三等船票，又发了 20 块钱的港币，可以买点什么东西。广东穿来的衣服是根本无法穿到上海的，那是在流沙的那天晚上为替换军服，由潮州同志从老百姓那里收集来的广东式的普通布衣服。我们想再向省委要点钱，省委未给。我们只好勉强回上海再说。在船上我又碰到了李立三、林伯渠，没有贺龙。大家也不好打招呼，只好点点头，笑一笑。大概这一路很疲劳了，一倒在铺上，就睡熟了。等到醒来时，已经睡了 20 多个钟头，以为是第二天，其实已经是第三天了，一直也没有吃饭。

从 1926 年春天离开上海到广州，到 1927 年秋天又从广东回到了上海。那个与我同路的黄埔毕业的参谋，山西同志，他接上党的关系以后，单独回山西去了。可惜我现在已忘掉了他的姓名，一个在革命战争失败的艰难时期和我共患难的同志。

后来才知道在流沙袭击我们的是当地的地主武装民团，人数并不多，武器也不好，但是我们却被他们打散了。南昌起义的希望寄托在朱德同志身上。

南昌起义失败了，大革命也失败了。这是中国政治局势的重大变化。大革命最高潮时中共党员有 7 万人，到 1928 年就只剩下 1 万人，减少了 85%。这还包括了在农村

中进行武装斗争的党员，这部分同志恐怕比在城市里坚持地下工作的党员人数还要多。

脱党的情况在武汉极为明显。8月初，武汉国民党颁布了《清查共产党员办法四项》，其中第三项就规定：“有共产党嫌疑者，令其于三日内登报声明反对共产党或发表文字反对共产党。”因为登脱党声明的人多了，以致汉口《中央日报》还专门登一个启事说：“奉中央命令，关于党报登载脱离共产党或声明非共产主义启事，非经汉口特别市党部改组委员会审查盖章，不得登载。因此，本报自即日起，凡不合上项手续的启事，一概不代刊登。”

这种启事报上天天都有，少则一两人，多则10来人。启事的格式大概是这样：

（一）我曾误入CY，旋因该团不合国情，已于4月间脱离关系，特此声明。

（二）敝人曾经由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旋因政见不合，早已退出，特此声明。

（三）我以前被人引诱加入共产党，我本是不知什么叫做共产主义。现在看见中央命令，晓得共产党是一个叛国害民的党，特此登报声明，决与该党脱离关系。

当然这些人都是湖北本地的一般的党员团员，形形色色就不去说它了。

既脱了党，又在这时候跳出来反共的，其丑恶无过于周佛海了。他的所谓《逃出了赤都武汉》，就是他制造的关于武汉中国共产党内部情况的种种谣言。他预料自己可能

在上海被捕，事先写成这篇东西，作为被捕时证明他周佛海早就反共拥蒋了。果然靠这篇东西救了他的命。这种人后来当汉奸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

在脱党的人数中第一位的当是那些消极分子。他们自谋职业，隐姓埋名，对党亦没有什么危害。虽然如此，其中也有少数人自觉“高明”，认为革命失败都是你们这些人搞“左”了，甚至说出“为什么象苍蝇那样向窗玻璃片上盲撞便算不落伍？”“这出路差不多已成为‘绝路’，现在不是已证明得明白？”第二位的就是脱党分子，他们找着一些门路，投降蒋介石，跑到国民党那里去；也有些人去参加汪精卫的改组派，或者邓演达的第三党。但是也有少数人，即或留在党内，特别象陈独秀这个小集团，搞分裂活动，自然也只有被开除党籍一个下场了。总之，聚变在一起了，一霎时的风雨变幻，又裂变为多种形式的社会成员。聚变和裂变交替不断地变。正如毛泽东所说：“从此以后，内战代替了团结，独裁代替了民主，黑暗的中国代替了光明的中国。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他们又继续战斗了。他们高举起革命的大旗，举行了武装的抵抗。”

（责任编辑 汪新）

接管沈阳记事

李 锐

1948年2月，我从热河到哈尔滨，被留在东北局工作。沈阳解放前夕，让我担任陈云同志的政治秘书，参加沈阳接管工作。到陈云身边工作我是乐意的，在延安中央青委时，参加过中央组织部的读书班，亲聆过他的教诲。

1948年10月中旬，东北战场“关门打狗”，蒋军孤处沈阳、长春、锦州三大城市，面临最后覆灭的命运。10月15日，经31小时激战，歼敌10万，攻下锦州。只隔4天，曾泽生率全军起义，长春10万守敌放下武器，宣告解放。28日，廖耀湘兵团12个精锐师10万余众就歼于辽西。这种迅速发展的军事形势，使得各方面的工作都要服从这个大局：立即迎接东北全境解放，并准备不久挥师进关作战。

我的得以幸存的旧档中，有一个小本子（封面印字《一九四八年手册》），记载了1948年9月7日到1949年1月27日的工作日记，详略不一，但比较清楚地反映了当时的东北形势和接管沈阳时军管会工作的一些情况。另外一个小本子，则记载了沈阳接管最初几天，军管会领导（陈云、伍修权、陶铸）向中央和东北局汇报情况的电报稿，这是由我起草的，自己留的底本。现在根据这两个本子的记

录，整理出这篇《记事》。其中同事实如有出入之处，当然由我个人负责。

东北局的十月会议

10月3日至19日，由高岗主持，东北局召开了各省市（包括热河）党政负责人会议，讨论当前形势，布置1949年的工农业生产和财经工作，以及建党建政工作。高岗作了关于东北基本情况与主要工作的简要讲话，陈云就财经和工业问题作了长篇报告，张闻天讲建党问题，林枫讲政权建设。大家讨论很热烈。我从头至尾列席了这次会议。

会议估计东北全境解放即将到来，当前任务是全力支援战争。我们已具备消灭东北全部敌军的条件：有工业，有粮食，有铁路（通车8000公里），还有外贸；解放区已完成土地改革，群众条件空前之好，社会中上层都坚信国民党再也回不来了。会议强调，土改的直接目的是发展生产，干部不能做空头政治家，要善于抓生产，要大鼓发展生产之劲，组织起来，精耕细作，尤其要稳定中农情绪。农民要求“黄金万两”、“牛羊满圈”（春节招贴语），但农村干部怕提资本主义，怕提吴满有（抗战后期陕甘宁边区提倡的新式富农样板）。要承认这个事实：必然有一小部分农民上升为富农，这不要怕，政权在手，党的政策是让多数人劳动致富。会议详细讨论了新区生产，特别强调要抓紧粮食。当时前后方一切开支都折粮计算，如两匹或两匹半布

值 1 吨粗粮，1 辆大小汽车 1 年各消耗 75 吨、15 吨粗粮。

陈云的长篇报告主要讲三大问题：财政开支、工业投资和物价问题（“左肩财政，右肩工业”）。前两者多要钞票，后者反对多发钞票。当时东北每天财政开支要 1 万吨粮。1948 年财政预算是 360 万吨粮。全区人口 3000 万，其中 1000 万城市人口，140 万公家人（热河在外）——军队 108 万、地方 32 万，脱离生产人数占 4.6%。关内各解放区大体为 2.5%。长期战争中的经验数字是不能超过 2%。这个 4.6% 是当时的基本矛盾，但东北有工业，有铁路，这个数字能承受得了。当时困难主要在军队还要扩大。“办法还是要紧缩后方，充实前方，苦几年再说。”如布匹只能先军需后市场，车辆等使用也是如此。财政收入中粮食占 40%，货币回笼靠物资和贸易，税收比例很小。当时现金收支很不平衡（每月需 2850 亿票子），由于钞票发多了，物资不足，还有人为因素（如曾禁止粮食流通，粮食开禁前又先调整了价格等），7 月后，引起物价大涨。所谓掌握一定物资，当年标准是手中经常要有 40—50 万吨粮，100 万匹布等。因此，要设法多用实物供应、物物交换。国家银行必须成为全部公家机关的总会计，对促进生产起调剂作用。要严格控制发行，要严格财经纪律，如市场购物优先国营。陈云在报告中还强调大力节约，财经干部要精于业务，克服管理中的一切浪费。首先是从保管、运输到加工各个环节，节约粮食，完成 15 万吨指标。煤矿要提高回采率。铁路车皮不能当仓库用，机车保证行驶 3—5 万公里才

大修。要精减人员，前方多一人即多耗 2.1 吨粮，后方即 1.4 吨粮。生活办公都要力戒奢侈。学校不要全由公家办。水利与社会公益事业要动员群众办，公家帮助。当时发展工业的主要困难在缺乏资金与技术专家，因此定要省吃俭用，解决投资问题。同时要加强总体计划，解决各方面还缺乏计划的问题。总之，强调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

1949 年东北工业计划为：煤 8000 万吨，纸 1.5 万吨，盐 60 万吨，木材 300 万立方米，黄金 10 万两等。重点在恢复若干重工业，全力为军工生产服务，支援全国。铁轨方面，要解决恢复关内 1500 公里铁路的需要。总之，在原材料、技术、资金和运输四个方面，要保证计划的完成。以上这些指标后来当然有变动，于此可见当时考虑的水平。

在干部问题上，会议认为主要是大胆培养新干部。全东北 3 万老干部，地方占 1/3，军队占 2/3。已吸收 2600 名中学生参加工作。省县各级办训练班与党校，1949 年春季前，10 万党员要受到训练。新培养 3000 名区干部，大多数区委书记和全部区长要由新干部担任。秋季前，全部区委书记、县委副书记、副县长都要由新干部担任。在产业工人中要争取发展 5% 的党员。

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在新的形势下，要求全党和全体干部，在组织工作和思想方面有迅速的转变，尤其思想认识上要克服经验主义。如有人竟认为“铁路最大弱点是不能随便指挥，不如毛驴听话”。要让全体干部懂得，今天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要从农村进入城市，准备

接管大城市。不适应这种变化，是当时干部工作中的主要危险。

解放沈阳，准备接管沈阳，这是中国革命有史以来第一个接管的大城市，必须作好充分准备。会议认为中国革命从此揭开了新的一页。

10月26日会议——讨论接管沈阳

攻占锦州的第二天，前线已决定回师东进，吃掉西援的廖耀湘兵团，作全歼东北敌军的布置，以促进全国形势的大变。10月26日晨，围歼廖兵团的大战打响。记得这天晚上，在高岗住处（哈尔滨南岗原法国领事馆）楼上开了个紧急会议，也就是这时高岗通知我参加沈阳接管工作。我就住在楼下，列席了当晚的会议。会议由高岗主持，参加会议的有陈云、林枫、王首道、叶季壮、李立三、吕正操、汪金祥、张平化等。

当时估计沈阳敌人要撤，主力任务是歼灭全部敌人。已经有14个独立团到沈阳周围活动，准备接收，负保护治安之责。鉴于进长春时有些乱，有的部队接收财物，商人乱进城，接管人员开始忙于写布告，许多俘虏走散，造成相当的无政府状态，因此，会议集中讨论了接管沈阳的具体方针和办法。沈阳的紊乱当能设想，要预计到一切困难。如敌撤退，我只歼灭大部，残兵败将必乱窜，挤在沈阳周围。出现此种情况，要将散敌强迫集中几处，严格管理。俘虏

决不可走散，估计总数达二三十万，尽快用个把月时间收编训练，以补充主力部队，成为二线兵团，老弱残废则有计划送走，这是重要任务。各省还要准备补充兵员 10 万，抓紧训练好。同时抓紧军工生产，立即修复铁路（首先修通北宁路）。中央认为这是头等大事，否则就会犯错误。

关于接管总方针，一切旧机构先不要打乱，暂按原有系统接管。一切原封不动，工厂、矿山、仓库、机关、学校，一切器材、物资、房产、现款、人员，直到文件档案，都原封不动。各接管系统负责保管，绝对不准破坏。要防止本位主义、打土豪习气以及铺张浪费等作法。要先弄清旧系统情况，按照统一计划，规定范围，按系统接收。会议强调按陈云定的方针去做：先稳下来，统一指挥，分工接收，不是多头，而是集中统一于各个接管系统，服从接管最高领导。接收时先不谈分配，一切以命令行之，互相监督。所有的接管部门不归原机关领导，归军管会统一领导。要暂时利用旧政权的一套，包括保甲在内；大量利用旧人员，尤其技术人员原岗位不动，发挥其专长。

会议担心军事形势变化太快，恐怕连 10 天准备时间也没有。因此各系统参加接管的干部要立即集中。如工业部除少数人留下照顾日常工作外，全部搬去；其他财政、交通、金融、商业、军需、军工等都依此精神办理；公安、文教和群众团体都要派得力干部去；铁路、工会等部门，今后重点都在沈阳，东北局也放在沈阳，要尽快迁去。

会议还强调不怕外乱，就怕内乱。基本是三个问题：方

针政策，纪律教育，严格的组织管理。一切服从统一指挥，高度集中统一。如一律禁止各单位自行采购物资，统一由贸易局管；各单位只带自己必须的管理费用。总之定要严格纪律，紧箍咒要紧一点。破坏了纪律要找头头，要层层负责。还要准备慰劳好主力部队，让部队得到必要休整。部队不管接收，对工厂、仓库等只负看守之责。

估计到战争和敌人的破坏很大，沈阳周围的秋收无望，粮食困难将是首先遇到的大问题，要解决沈阳城市及周围共约600万人的吃饭问题，有粮才好办一切事情。因此，要先在沈阳市附近适当地点集中一批粮食。力争汽车运粮（如用大车，每天至少要3000—3500辆），一天运2000吨粮。

总之，沈阳接管得好不好，对全国影响很大。沈阳的接管经验无疑有全国意义。当时东北的主力部队大部都集中在辽沈区域，必须由最有威望和熟悉城市的领导人负责沈阳接管工作。这天晚上就宣布由陈云任沈阳军管会主任。

军管会出发途中

根据余建亭同志的回忆文章《军管会接管沈阳的经过及经验》，10月27日东北局决定了沈阳军管会人选，抽调4000名新老干部接管沈阳。28日开动员大会。29日从哈尔滨出发，乘火车经吉林市、梅河口，绕道四平市到达开原。记得沿途一路绿灯，飞速前进。这说明当时情势的紧急，前

方军事形势发展太快，已来不及从容准备。军管会许多具体工作，都是在火车专列上开会议定的。

我的记录本上，记有10月28日“军管会一次会”，似不是“动员大会”，而是陈云主持，军管会成员参加，主要谈工作分工的会议。军管会下设办公室、经济、铁道、财贸、后勤、政务、公安等处，另成立市政府、卫戍司令部。文教、外事没有单独设处，由市政府管（后来外事由陈云直接管，我当助理）。会上宣布了各处负责人名单，确定分工范围等。沈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陈云，副主任伍修权、陶铸（陶是市委书记）；沈阳卫戍司令部司令员伍修权，政治委员陶铸；沈阳市市长朱其文。

关于分工范围及注意事项：

军事——管卫戍、敌俘、伤兵散兵、武器弹药等。伍修权负总责。

政权——市政府、阶级政策、文教、外事等。朱其文、张学思负责。

治安——与卫戍有联系有区别（内外之分），敌特要快抓，一般国民党、团员用登记办法。张作相（老东北将领）要释放。陈龙负责。

财贸粮食——要掌握市场。易秀湘负责。

铁路——主要是抢修铁路。刘居英负责。

工业——军工、军需抓紧。王首道负责。

房产——归市政府管。张学思负责。

市委和市政府是军管会的实际办事机构。

陈云在会上还谈了以下主要问题：

准备些什么？军管会发布告，约法八章（后来正式发布的为有关接收工作的六项规定）。卫戍司令部发入城布告：维持社会治安，迅速建立民主秩序。发市长就职布告。这些布告要多印多发，一进城就由电台向全市人民广播。

接收原则：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决不能乱。当时前线具体情况还不甚清楚，估计接收方式不外受降式、打进法。接收时先找各系统头子，让他们向民主政府报到。实行军代表制，暂时一切不动。各系统有接收之权，无分配之权。

什么问题上可能出大乱子？沈阳解放，全国瞩目。我们接管人员应当兢兢业业，有如“进京赴考”。对外事、外国人，要处理妥当，否则会犯大错。抓人、杀人要慎重。私人银行不动，外国银行是否停业？票子是大问题，金元券如何处理？压低 25% 收一些，然后停止使用（吉林市解放 11 天后停用）。工人、公教人员、贫民先发维持费、救济费。本票如何占领市场？应有计划推出物资，采购商品，才能逐渐取得群众信任。

还谈到其他具体问题：如警察下枪后，徒手上岗。一般中间报纸让出版，外国记者消息好好利用。除专职人员外，干部一律不准跟外国人接触。

会议还汇报了各大系统派出干部的具体人数。一共 7 大系统：军管、军事、政委会（东北政府的办事处）、市府、财经、工业、治安。干部人数最多的系统是：治安 800 人、

工业 500 人、政委会 470 人、军事 500 人、财经 1500 人，军管会本身人员并不多。

10 月 31 日在火车上开了军管会第二次会议。到达沈阳后，关于各接管系统驻地条件及应注意事项，都由陈云一一规定：电话畅通；力求集中住，不要分散住；一切物资、文件不得外拿，禁止拆散；扫清地雷，注意警戒；无事不准外出，有事二人行动；不准乱打枪；只准公安机关抓特务，不准杀；不准没收财物；采购统一于商业局等等。

会议进一步讨论了接收的具体办法，及几种布告的具体内容。一切被接收单位只对军管会负责，最后结束时，由军管会派出的代表负责签字。还讨论了某些单位的归属，如气象台、医院等归政府；铁路宾馆归外事（由于中长铁路条约关系）。进城后的一个问题是各单位必争房子，因此特别规定房产分配权属东北局，任何机关无权占房子。

关于粮食问题：保护好敌留粮仓；设法在市内先借粮；奖励粮食进城。

关于金融物价：当时物资、筹码两缺，按何种标准计算为宜？粮价应比铁岭高（铁岭比开原高），低了粮就进不来。各接收单位先发一批维持费。公教人员可按一定比价（七五折、六折），将金元券兑换本票，但数量不能过多，应少于工资与救济费。物价不要低于解放区，不要使之暴涨暴跌。允许商人、农民进城购物。

关于铁路问题：先集中力量修通抚顺至清原线，力争 15 天修通。本溪与安东间，1 周到 10 天修通。动员 3000 人

从里向外修，枕木决不能烧。

关于卫戍工作：分五六个卫戍分区，设分区司令部。白天不戒严，夜6点后宵禁。哨兵不准拦汽车，只有巡逻队有权拦。开始三五天内要特别严格，夜间可发特别通行证。干部发通行证，机关初期不准闲人进入。调3个师作卫戍部队，调高炮部队，防止敌机轰炸。

关于干部教育问题：入城守则，各种问题，要分头好好传达，重新受一次入城教育。发生了问题，唯各单位负责人是问。各路干部入城，沈阳东西南北设4个口子（如东面东陵、北面官屯），有人把守，北面要持党政军介绍信。由卫戍部队统管。

11月1日上午在车上开了军管会第三次会（这时可能在铁岭或铁岭以北某站）。解放沈阳力争长春方式，争取周福成反正，张学思已写了信，欢迎反正，部队可原编制不动（按：周福成时任沈阳守备兵团司令，最后放弃指挥，部下纷纷投降）。当时还不完全清楚前线情况（先打营口还是沈阳，或两城同时打），专列暂不前进。准备发布告，编好一天报纸（《沈阳时报》入城后即出版），把各种驻地招牌都准备好。

晚上开第四次会。陶铸来信（陶当时是辽宁省委书记），沈阳敌只剩4个团未解决，今晚部队可能突入城内。要军管会起程同他们汇合后，分批走。决定军管会主要人员今晚即出发，其他各系统干部明晨出发。当夜共乘大小汽车17辆，于2日晨到沈阳外围。

我的记录本上，第五次会是 11 月 2 日在榆林堡开的（一般地图上查不到这个地点），陶铸到，随后伍修权也乘吉普车到达。说沈阳市内情况尚好，市民悬旗欢迎，敌散兵约二三万，已无敌军抵抗。入城部队纪律无大问题。周福成、苏炳文等已放下武器被俘。陈云向陶铸介绍了军管会组织具体情况及接收方针。决定各系统都按该系统接收单位住定。先要解决五六万俘虏吃饭问题，每天要准备 15 万斤粮。由市长朱其文先召集商人摊集粮食。王首道先负责解决电力供应。先戒严封城 3 天。交通警、消防队等先恢复。即调高炮队入城防卫。现在市内无自来水，通知所有入城人员，不使用驻地抽水马桶厕所。卫戍部队 3 个师。陶铸提出市委组织主要负责人名单，即报东北局批准。辽北省府不进城。

11 月 2 日黄昏时，军管会主要人员共乘 17 辆大小汽车开入城内，住“大转盘”的原大和旅馆（现沈阳宾馆）。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宣布：人民解放军于 11 月 2 日下午 5 点解放沈阳。

我的记忆中还留有这样的印象：夜色朦胧中，市内大街上没有灯光，很是寂静，敌军散兵三五成群地游荡着。

我的秦城旧作《龙胆紫集》中，有这样两首七绝回忆接管沈阳时的情况：

一路绿灯飞沈阳，车中约法共商量。

分兵各把各关口，革命揭开新篇章。

（随陈云同志接管沈阳）

十万残俘一死城，烛光人影报佳音。

笑谈三日城苏醒，处处飞轮马达鸣。

(进入沈阳头两天无电，在大和旅馆点蜡烛办公)

接收规定与卫戍布告

如上所述，军管会一路在火车上讨论的主要是两方面问题：一是关于接管政策与办法，保证接收工作的顺利进行；二是如何维护社会治安，迅速恢复正常生活和建立新的民主秩序。许多大小困难都预计到了，都有相应的对策。几次会议都由陈云主讲或由他作总结。大家充满了必胜信心。

关于接收工作的六项规定是由军管会公布的。卫戍司令部布告的七项规定，既有全体市民必须一体遵行的，也有接收人员包括部队自我约束的纪律。现在根据当时的报载，将这两个最重要的公告与布告，全文录下。这是有历史意义的文件，为以后全国接管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提供了一个范本。

新华社“沈阳四日电”广播了军管会的公告：沈阳特别市甫告解放，军事管制委员会奉东北军区司令部、政治部之命令，宣告成立，并于十一月三日开始办公。为确立革命秩序，维护社会安宁，保障各阶层人民生命财产，特在沈市实行军事管制，并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该会为军

管期间最高权力机关，负责统一指挥本市一切工作。军管会由陈云、伍修权、陶铸、张学思、王首道、陈郁、朱其文、陈龙八委员组成，以陈云为主任，伍修权、陶铸为副主任。内设财政、经济、后勤、铁路四处，并直接指挥卫戍司令部、（东北）政委会办事处、市政府、公安局。当即知照全体市民、军政机关人员。

军事管制委员会于十一月三日对沈市原有全体公教职工人员发布有关接收工作的六项规定，原文如下：

沈市甫告解放，为安定社会秩序，便于本会清理接收，特向原在沈市的军事、行政、经济、教育、社会等机关一切工作人员（包括主任、局长、科长、经理、职员、厂长、技师、工人、医生、校长、教员等）颁布以下事项：

（一）应按原有职务照常上班。

（二）应各负责保管所属部门一切资产、设备、机器、文件、档案、帐册等。

（三）应将所属部门人员、资产等简要情况按原有组织系统分别造册，呈交本会所属卫戍司令部、政委会办事处、市政府、公安局、财政处、经济处、后勤处、铁路处等。

（四）呈报手续由各机关主管人员负责办理，如第一级负责人不在，由第二级负责人办理，第二级不在，即依此下推。自布告之日起，限三日内呈报完毕。

（五）以上事项办理妥善者，本会一律予以奖励；如有违抗或办理不当者，即予惩处。

（六）一切到职工作人员，得按具体情况由本会酌发维

持费，由各机关、工厂等负责呈报人数具领。

同样是“新华社四日电”：沈阳特别市卫戍司令部于本月3日发布第一号布告，原文如下：

为布告事，际兹沈阳收复，东北已告全部解放之时，本部奉令在沈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指挥下卫戍沈阳。为维持社会治安，迅速建立民主秩序，特宣布下列各项规定，仰我各界人民、军政人员，一体周知，切实遵行：

（一）全体市民均应遵守民主政府法令，各安生业。本市各界人民及外侨生命财产，一切私人工商业财产及其合法之营业，本部均切实负责保护，决不许任何侵犯。

（二）为确保城市秩序，防止破坏分子活动，特实行全市临时戒严，除持有本司令部许可证之人员外，任何军民人等一律禁止出城入城。市内自晚上六点至翌晨六点，禁止通行。违者以破坏戒严令论处。

（三）本部负责保护本市一切公共建筑物、公共机关、仓库、堆栈、工厂、火车站、飞机场、邮电、自来水、电车、银行、学校、医院、图书馆、教堂、街树等。严禁任何抢劫破坏行为，如有违犯，决予严惩，不稍宽贷。

（四）现仍藏匿民间的蒋军官兵，应向本司令部投诚报到；凡自动投诚报到，及持有武器自动交出者，即不予追究，并斟酌情形予以优待。凡迟不报到者，一经查出，即予严办。窝藏不报者，亦须受到应得之处分。凡蒋军所隐藏或分散遗弃之武器及军用物资，必须向本司令部报告缴送；凡自动报告缴送者奖，隐藏不报者罚。

(五)本部切实执行保障人权法令，任何机关部队，除经法律手续，不准非法捕人。凡一切破坏分子，军民人等均有检举报告之义务，但无自行处理之权利。

(六)除卫戍部队与本市工作人员外，在军事管制期间，其他任何部队与工作人员均不许入城。指定之入城部队与机关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所颁布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及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野战军颁布之城市政策及一切入城纪律和规则。必须严格遵守群众纪律，不得擅入民房，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实行公买公卖。对一切公共建筑物与企业资财均须负责保护，不得自由迁运、拆卸、动用，违者以破坏城市论处。

(七)驻城部队不许自由外出，不准无故鸣枪，严禁进出烟馆、妓院，不许自由进出影院、剧场。

以上规定，均由本部执法队监督执行。如有违犯，即予扣押严惩。

头三天接管情况

军管会主要人员都住在大和旅馆，这儿是沈阳市中心区域。各系统接管人员每天按时来汇报，头两夜点蜡烛开会，人来人往，烛影憧憧。我与余建亭（时任陈云秘书）共住一室，就在陈云、陶铸住处旁边。中厅有一大会议室。

从11月3日到28日，我的记事本上逐日记有每天的汇报和开会讨论的情况。3日、4日、5日3天，军管会负

责人（陈、伍、陶）每天向东北局并中央汇报接管情况，为当时各接管系统汇报的综合要点。现抄录如下：

11月3日10点的电报

沈阳已全部解放。敌二〇七师最后抵抗之一个团已于2日中午投诚。陶铸于1日下午、军管会主要人员于2日黄昏、第一批干部约千人于3日晨，进入沈市。现将情况简报如下：

（一）沈市秩序现大致尚好，部分街道悬旗贴标语欢迎。群众乱抢富户与仓库事稍有发生。已收容俘虏除一、二纵不详外，已达3万以上（主要是周福成五十三军与暂五十三师），街上散俘估计近万，尚守秩序。伤兵不多。

重要工厂、仓库、机关等，我军入城即派独一、独四两师卫戍看管，迄今未发现严重破坏事件。电力3天内可修复，主要由鞍山、抚顺送电。警察本日可全部接收，徒手维持全市交通秩序。铁路员工有2万未散。现铁岭已抢修通车，正动员抢修清原段。敌机于1日夜轰炸军火仓库，2日整天轰炸车站与铁西区（按：当时车站附近有满载炮弹的3列火车），未闻有重大损失。2日夜，敌定时炸弹爆炸一列车弹药。

（二）入城部队过多，有一、二、六纵，辽北三独立师等。纪律仍有些问题，“抓一把”现象仍严重。如进银行拿钱，摊公鞋，在铁西区仓库搞物资，在驻地机关仍有乱翻行为。当尽力制止。

（三）军管会等先出就职、安民、接收等4种布告。市

内分区卫戍，实行夜间戒严（下午6点至晨6点），并封城3天左右。估计布告一出，人心可更安定。3日起，军、政、市、财、经、公安、铁路、后勤8大系统分头接收。办法是自上而下，按原有系统找各级负责人，正式具报清册接收。同时派人视察。原有职工人员一律上班，重要部门派军事代表。

（四）当前重大问题为粮食、票子。目前需供粮人员约10万。沈市粮情较长春为好。现拟由市府召开商会借粮若干，同时各地抢运。我东北票占领市场办法：设想主要为全体公教职工人员发部分工薪，贸易局统一收购一批物资，物价跟外地不悬殊过大，以免暴涨暴跌。同时按需要情况，以适当比价收兑若干金元券。

（五）对部队慰劳品收集，由朱理治负总责。各单位接收日用品一律封存，并设法购置一批。

11月4日16点的电报

现将昨日（3日）情况简报如下：

（一）沈阳最重要的大工厂：兵工厂、机车厂、炼铜厂、机器厂、汽车制造厂、橡胶厂、车辆厂、电工器材厂、桥梁工厂等，均完整接收。兵工厂昨遭敌机轰炸，落弹百余枚，无大损失。铁路有机车400台，马上能用者80台。有许多工厂并未停工，电力一到即可复工。主要工厂均已派军事代表。抚顺送电已到，市区部分有电。

（二）各系统自上而下接收顺利，警察局枪枝基本缴收。国民党市府各局长、生产管理局代局长、副局长、银行、各

工厂、各机关正职、副职或次要负责人均出面办理交代。大体东北人均未走，部分关里人也未走。各系统召集讲话后，反应都好。警察局人员对我宽大政策甚表感激。商会已允借粮 70 万斤。

(三) 当前群众最关心问题为物价与金元券之处理。商店尚未开门(票币与轰炸都有关系)。现决定明日公教职工人员预支工薪每人 10 万元，估计 15 万人发 150 亿。公布靠近沈市之开原、安东等地物价，并经百货公司公布收买物资的价格，以便商人参考。银行送来东北票尚有一半在路上，到后拟采取适当办法部分收兑金元券。如筹码仍不足，则再找其他办法补救。金元券发行据说有 2 亿，确数尚未查出。

(四) 沈市敌留下弹药，确数未查清。因 1、2、3 日敌机轰炸，昨已星夜疏散 48 车皮。现仍在继续搜寻、疏散。

(五) 遵林罗刘(林彪、罗荣桓、刘亚楼)指示，决定一、二、十二纵队及辽北共 4 个师为沈市卫戍部队，师长即分区卫戍司令，均于今日接防。

(六) 昨日发生的问题：

1、沈阳车站被破坏抢劫，幸电话线路尚在。其他次要机关、小仓库及敌方官员住宅内有少数被抢，主要是敌散兵和流氓行劫，亦有贫民乘机而来。估计散兵尚有三五千，各纵队仍在搜集。

2、卫戍司令部与部队过去无建制关系，命令转达不及时。白天街上站岗战士仍在断绝行人来往，少数则乱放枪。

3. 散兵俘虏住民房学校，折烧家俱，并有小的抢劫事。

(七) 三日来，我们感触最深者，一为民心向我，许多机关、工厂的公务人员有条不紊地保存物资文件等待接收。二为哈尔滨及北满随来的新干部（原东北公教职员技术人员）忠勇努力而业务熟练。三为党地下工作者（包括一切情报关系在内）在敌军将溃已溃时，挺身而出，向各机关号召保护资财，等待接收，起了不小作用。

（按：沈阳解放时，东北局城工部领导的沈阳市工委下属7个系统及中央军委情报系统等，共有地下工作人员1200多人，其中党员178人。兵工厂、铁路、学校等都有地下活动。市学联曾领导过“反饥饿”等斗争，于10月29日即作欢迎解放军入城准备，赶印入城布告及东北局《保护城市工商业政策》、《关于知识分子决定》等文件，连续三天三夜，在一些街头张贴标语口号，并翻印散发《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歌片。）

11月5日沈阳情况（按：这份电报没有发出）

(一) 兵工厂共有3600台机器。现在每月生产能力：步枪500支，步炮10门，轻机枪70挺，冲锋枪若干，各种炮弹2万发，枪弹400万发。现存山炮弹2700箱，迫击炮弹2万余发，小型炸弹126箱，大型炸弹1500个。

本溪很完整。煤矿继续开工，每月产煤9万吨，水泥9000吨，日产特殊工具钢2.5吨。发电设备24000千瓦，可送一半至沈阳。抚顺电力已恢复。其他情况不明。

满铁医院全部完整，共有人员1030人。博物馆四库全

书无损（全国所存三部四库全书，据说沈阳最完整）。国民党各党部特务机关文件均被毁。

现自上而下接收已大体告一段落，准备自下而上动员职工，以加强恢复与保护工作。

（二）车站与铁西区所存弹药及仓库重要物资正加紧疏散中。沈阳站已清出弹药 200 余车皮。昨日高射炮已到，敌机稍收敛。沈阳至安东铁路明日可通车。《沈阳时报》今日出版。

（三）我军现集中于沈阳周围部队有 25 万。各地工人及公费学生均无粮。沈市 15 万人，月需粮 7500 吨，已告开原、安东方向抢运。市内购借粮仅达 2000 余吨。

（四）金元券调查有两个半亿。现考虑贫民贷款以工代赈及实物贷款。百货公司今日开市，定出价格：米东北票 3000 元 1 斤。正收购花纱布及日用品等。

（五）昨日街上通行仍有受阻碍处。散兵及群众抢劫事仍有发生。现拟专门研究如何改善卫戍问题。公安工作重点 is 全力恢复秩序及抓特务。昨日已查出敌电台 12 部。据说主要特务均未跑出。

（六）外交问题。昨日朱市长向英美法苏驻沈阳领事馆送去就职通知。英总领事回信（中文，未签字）拟来访。美总领事来信要求保护所属财产。法领事亦有回信，态度较顽固，提出根据国际法捉人要按什么手续等五点。今日准备由军管会主任、市长召集英美法苏外交人员谈话，告以派兵保护等问题。

关于沈阳情况及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下面这份《关于沈阳情况与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电报稿，记事本上注明“未发出”（也可能后来由交通送哈尔滨）。从中可以看到接收头几天更深一层的情况，以及存在的困难和问题。这个汇报稿大概是 11 月 13 日左右写的：

甲、主要情况

（一）散俘原有二三万，成为治安最大问题。各纵队、卫戍司令部及区政府收容后，除旧城内尚有游散外，街上已无成群结串者。最高估计游散及换便衣者尚有三四千。但长春遣散之俘虏仍在陆续来到沈阳，除一部分可争取参军外，估计尚有一二万老弱俘虏官兵须遣送唐山、平津。正派出干部按站发钱南遣。沈阳俘兵早由国民党发了棉衣。

（二）沈市所存弹药甚多，据说分藏各仓库之弹药、炸药估计约可装 600 车皮，已运出疏散 240 车皮。敌机专炸兵工厂与弹药库，兵工厂受损失较大。弹药因仓库分散，所损尚小。已由周纯全、刘居英、江泽民（抗战时就搞军工生产的江泽民）组成运输三人团抢运。如能安全运出，将大利于全国作战。

（按：弹药仓库是沈阳解放头几天敌机轰炸的主要目标，如果都被炸，半座城市可能被毁。在三人团领导下，哈尔滨来的几百名技术干部和技工奋不顾身，几个昼夜抢运疏散，绝大部分弹药、枪炮未受损失。进入沈阳当天晚上，

铁路员工在敌机轰炸下，就将沈站三列满载炮弹的火车，拉到安东线上的一个小站。沈阳兵工厂厂长陈修和是陈毅的哥哥。蒋介石到沈阳督战时，曾拟搬迁兵工厂主要设备，被他抵制住了，陈云参观兵工厂时特别向他表示了慰问。）

（三）沈阳周围各县高粱颗粒未收，但市内民粮存储好于长春。7日，小市售粮不缺，每斤我币3000元以内。只要解放区各县对沈阳开放粮禁，可能不发生大的危机。蒋军西撤前售出军粮，故缴获粮食只300万斤。需由沈阳供给的我军人员约30万，必须请安东、辽北大力运粮来沈，才能解军粮之荒。此事务请李（富春）叶（季壮）督促。军粮问题上另一危机是沈安线上将无空车皮，因疏散弹药不易卸车，运粮来车悉数装出弹药，如弹药不能快卸，则必粮弹两误。

（四）从蒋中央银行帐看，敌所发东北九省流通券已收兑很多，未收回者仅15000亿。金元券在东北已发行2.5亿。金元券币值在市场上的表现，7天来由我票800合金元券1元跌为我票100至200换金元券1元。8日，我以100（我币）：1（金元券）挂牌收兑，3天兑入百余万。现锦州以我币2000元换金元券1元，估计金元券将向两锦流去。因贫民手中尚有九省券，我即参照国民党30万元九省券换1元金元券之比价，以1（我币）比3000（九省券）收兑，八日兑入九省券80亿，估计我只需5亿本币即可全部收兑九省券，所需甚微而得民心。

（五）据查沈阳原有商店两万余家，自去冬孤立沈阳后，

只剩七千。8日前，由于散俘多，币值未定，商店未开门。至昨日止，已有一半开门，大商店多数开门。因我预先公布沈阳附近地区物价及我百货公司收购价格，故物价一般平稳，无大波动。现街上行人还多，市面开始热闹。电灯电话3日下午即修复。邮电于5日即同全东北开通。自来水6日修复。电车8日都已上街。群众对我迅速恢复正常生活秩序，很是佩服。

（据《东北日报》11月11日载新华社“沈阳电”：沈市于5日夜首次落雪，翌晨放晴，全市焕然一新。晨光中迎来满载煤、粮的列车，汽笛声响震长空。中央大街有成批青年唱歌而过。墙上红绿标语与白雪相映。6日，各系统接收已告竣事；电车已开始有两路行驶；新华广播电台开始播音；市场于战后初次营业，尤以太原街小市场人山人海。近午，街上行人、车马拥挤；报贩手扬《沈阳时报》，被群众包围抢购，东北书店为上千人塞拥。向晚，雪已溶化，中央广场公安局门首红灯明亮。此东北人民首府已伴初冬来临而开始新生繁荣。）

（六）铁岭、沈阳3日通车，安沈路6日通车。中长路南段只差太子河桥未修复，沈阳至新民已通。目前正全力抢修营盘至清原线，只缺枕木。因疏散弹药与防止敌特逃跑，铁路尚未卖客票。俟营盘、清原线通后，即全力抢修西线。

（七）接收情况：八大工厂（即前述兵工厂等）除兵工厂、橡胶厂被轰炸受部分损失（主要是厂房）外，均完整

接管。其他工厂、企业、机关学校均已接管。旧人员报到上班者日增，全体职工均发临时生活维持费每人 10 万元，影响很大。沈市原公教职工 17 万，连家属在内可占现有总人口三分之二，他们与我们血肉关联，在保存物资及办理移交中看出，跟三年前正好相反，人心已完全向我。最可注意者，许多工厂、企业、机关、学校的高级职员，如联勤之将官、工厂厂长、银行经理、学校校长、铁路局处长、市政府各局长等，亦陆续报到上班。目前人事一般未变动，我只派去一个军管会的军事代表。许多工厂、企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是哈尔滨市与北满带来的新干部，他们既业务熟练，又忠勇尽职，十分可爱。军管会的接收方法基本学三年前苏军与熊式辉的接收方法，即在军管会下各按系统自上而下派去军事代表，命令旧人员照旧供职，呈报情况，等待接管处理。用此方法，主要工厂、企业、机关接收之后，已开始系统地接收其所属分支机构。接收内容是资产、人员、档案。移交接收签字手续不妨延迟，求快必乱，易被偷漏。已派军代表者，凡可开工之厂即行开工。

(八) 沈市原有警察 5500 人，现上班 4500 人。我们的办法是令其交出武器（除部队已收者外，又收缴 1300 支枪），即徒手服务。现交通警察在一切原岗指挥交通。我们的分局长均已派下去。依现有经验看，像过去哈尔滨处理的一样，旧警察的武装必须缴下，将来必须彻底改造。但在大城市中暂时利用徒手服务又是必要的。目前城市交通中一个大问题是靠左靠右走的问题。现全国各大城市均靠

右，因新汽车结构适于靠右，俘来司机已习于靠右。但我区因沿伪满时习惯久已通令靠左。为适于沈阳、长春各市及全国将占大城市情况，东北政委会以通令改为靠右为宜。敌电台已查出 15 部，情况由陈龙另报。

（按：靠左靠右问题军管会讨论两次，双方各执一端，争论不下。鉴于沈阳当时情况，必迅速决定，否则交通事故大量发生。最后作出决定靠右，报哈尔滨批准。）

（九）留沈美、英、法领馆到我各主要机关，找人拜访，侦我动向。对此，我尚无经验。现规定非经军管会决定，任何人不见外人。接见前必由对方先提出书面问题，每次会见前规定我方谈话范围，不准越出范围，也不答复书面以外问题。

（十）5 日，只以三五个干部利用国民党《中央日报》的有关人员，出了《沈阳时报》。现《辽东日报》人员已到。有关沈市的一切布告，中央及东北局有关政策文件，为公教职员和公民普遍注意，字字细读。在大城市中，报纸为传布政策及时事消息最大媒介，我们深感此工具之重要与关系重大。故以刘白羽、华山、姜丕之三人组成报道委员会，住在军管会，陈、陶亲看大样。

（十一）此次进城后，最要之举在严格保护工厂、企业，一切机件资财不准搬动。部队对城市政策严格执行，收了大效。个别仓库拿些细粮之类事是有的，这在久战缺粮之后，乃难以避免现象，且因供给工作尚未做好，即此亦仅属个别现象。市民对我军纪律严明很是赞许。我们正以大

力准备全军每人发一份慰劳品。

乙、困难和问题

(一) 各项政策中央和东北局都已规定，但人多手杂，经验不多，执行中稍不小心，即易出岔子。沈阳接管为全国和国际观瞻所系，故我们抱定方针，遇事不忙下结论，宁多研究请示。如此纵有所失，所失较小，如草率从事而出岔子，所失更大。目前对于高级技术人员、高级战俘、放下武器敌军官、隐藏或来报到的敌简任文官等处理，正在研究情况和办法。

(二) 哈尔滨市介绍来的宣传、青年等部门工作人员，已有好几批。但许多部门来人，大半忙于接收房屋与安家。军管会在找房子与争夺接收对象等问题上，与后来人员发生了许多应付上的困难，此种内耗抵销了力量。我们请求后方暂时不要派一般机关人员来，只派专到沈阳参加当前工作的人来。

丙、工厂与房子分配问题

目前决不能分配工厂，一分即乱，势必忙于内争而疏于对外接收。只有再过一二月，东北局讨论之后，再以合理使用的原则来分配。关于房子问题，有一重要情况须加说明，即现野战军司政后机关及卫戍沈市的主力纵队，他们在沈阳须作短期驻留，他们在大战苦战之后，须好好休整。目前必须首先保证他们所需的房屋和用具。让他们好好休整，就是增加今后进关作战的力量。故北满机关目前千万不要派人来打前站、找房子，必须待野战军离沈之后，

才能合理调整房子。

完成接收后有待处理的问题

大概在11月10日左右，一般接收工作大体结束。新华社的广播，则称军、政、警、财、经、后勤、铁路等系统，至5日止，已顺利完成接收。10日这天的会议，讨论了“什么标准叫接收完毕”的问题，是否各系统的资产、档案和人员都已接收，原主管人员已签字，即可认为已告结束？讨论时认为，这样远不能说最后完成了接收，存在的问题还多，特别是旧职员的训练和清查，工资问题一时还难妥善解决，等等，以后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当然，各单位正式负责人确定后，有的问题可以留待以后日常工作中进一步解决。

从11月10日以后，军管会逐日的会议，除遗留的接收问题外，就陆续讨论一些专题。如11月10日、19日和21日，三次讨论外交问题；12日，讨论市面行情，旧职员开始短时训练问题；13日，讨论技术人员问题；14日，汇报和讨论工人工作问题；15日，汇报市民群众的各种反映及扩大宣传周问题；16日，汇报中等以上学校情况及问题；20日讨论军事管制要达到的目标和近期的宣传、组织工作；25日，讨论工资问题和市委工作；26日，讨论沈阳接管经验向中央的报告；28日，陈云在干部大会上作“关于东北、沈阳情况与任务及沈阳当前工作重心”的报告；12

月8日、9日用两天时间汇报和研究旧职员问题；12月间还研究过工资问题；1949年1月7日，军管会各接管系统的负责人一起谈了这次沈阳接管的经验；1月27日（我的记事本上最后一天的记载），又讨论了旧人员处理问题。

关于上述接管中有些问题的情况，可简述如下：

（一）外交问题

沈阳解放时，英、美、法驻沈领事均未撤走，他们留下不走，显然是想观察动态，以待变化。苏联无领事馆，只有商务分局代表。

法国领事焦乐庵曾来市府，介绍本人身分，请求保护，并谈市内有20多侨民的市内通行（后来还要求去哈尔滨）以及教堂等问题。我告其少外出。我军初入市时，曾往法教堂查看有无电台，法方说部队取走一辆自行车及一袋面粉。经调查，自行车确有其事，即解释或因战事进行取车一用，即归还自行车，面粉事再调查。法国领事对此甚表满意。当时就此事例，通报全体卫戍部队，以为纪律教育。

美国总领事瓦尔德送来公函两封。一致卫戍司令官，说明本人身分、住址及馆员所住地带，请求于秩序恢复前给以保护。另致函朱市长祝贺新职，并表示愿建立亲密关系。随后向我要去土地法大纲。据各种渠道了解，沈阳五大特务系统中，有一“美国陆军联络团”，其中人员有留沈的日本侨民，有的是原日本宪兵。美领馆内有一电台，停电时仍继续工作。美国显然在极力搜集我方情报，尤其军事动向。

英国领事提出多项要求，如启东、颐中烟草公司要开

业，想去安东买烟叶；汇丰银行仓库有药品，想取走；为救济难民，要开粥厂等。这些要求或拒绝或回避。

英美领事在市长回拜时，都探询我们与苏方关系，尤注意大连和满洲里的情况，如侨民从香港来，能否经过大连，欧洲信件可否到哈尔滨等。当时有两位翻译（均为女同志，俄文翻译林利、英文翻译周砚）日常同我联系。关于市长同英美领事交谈中，有不必要的回答或回答有失原则之处，是她们向我反映的。陈云对此极为重视，即报告中央，请示进一步的外交方针。因此，作了前述有关外交活动的几项规定，定出外事纪律，严格控制了同外国人的接触。

当时东北野战军正积极准备进关作战，须严密封锁消息，而国民党各系统特务都在活动。经过慎重讨论决定，11月20日，卫戍司令部正式派人搜查美、法领事馆。事先作了充分准备，执行人员不带武器，不与交谈，只收缴电台及武器等违禁品。在美国领事馆查收电台1部及7部轻便发报机，并让其写明再无电台的保证书。同时通知领事馆人员必须集中居住，取消其汽车通行证，对外信件只准送与市府，电话亦只能通往市府，生活供应则予保证。当年我外交政策“一边倒”的形势下，美、英、法领馆不久都先后撤退或被驱逐出境。

在整个沈阳接管期间，唯有市长的外事活动出了点问题。在军管会作总结时，陈云说：市长发就职通知，回拜，这是政治不高明；人家有意试探，我们有问必答，是警惕

性不够；我们不要怕人家笑话“不答复”。在我的记忆中，中央这时对西方的外交方针，前后有过一种原则性的变动。

（二）关于工人和工厂情况

沈阳解放时，工厂都处于停工半停工状态，秩序很乱。在我党地下工作者的影响下，广大职工有计划护厂，但也有人有计划偷东西，隐瞒物资。工厂复工是大问题。铁西区原有 30 万工人，国民党统治时，仅 3 万人上班。兵工厂原 1.4 万名工人，上班的只 1000 多人。尤其私营厂开工的少，铁西区 320 家工厂中有 60 多家私厂。国民党统治 3 年，工人生活极困难，吃豆饼渣、麦麸子，缺煤或无煤烧。当时工人最关心的是怕失业，以及工资福利、缺煤缺粮问题。国民党联勤系统工厂发些实物，家属略有补助。情况较好的是铁路，12000 名职工大部上班，由于缺电缺煤，有的上班没事干，但情绪一般较好，这同哈尔滨来的干部、技工懂行有关。国民党控制铁路很严，曾枪毙过 6 个司机，1/3 职员挨过打，有的站长也挨过打。职工普遍感到我们会管铁路，“懂得铁路的规矩”。在张维桢领导下，哈尔滨来了 70 多名工会干部，最初在全市开展了大规模的“护厂复工”和“交纳器材”的活动。一般职员，尤其高级职员同我距离较大，尤有怕斗思想。社会上谣言很多，除特务造谣外，也同南满土改过“左”、镇压地主恶霸杀人过多有关。谣言如“哈尔滨不准穿好的”，有“闻香队”，“两双鞋分一双”等等，以至有的人借破衣穿，穿好衣不敢上街。当时登记的中高级技术人员只一百几十人，开过一次座谈会，反

映了许多思想问题。最害怕的是会不会像农村一样搞斗争；其次是生活问题，工资标准怎样定（国民党每月发工程师不过100斤粮）？对形势看法，国民党必败，共产党必胜已无疑问，但怕三次大战，认为“美国不会看着国民党垮台的”，“东北恐怕还将成为战场”；对共产党能不能管好大工业，有无这方面的知识和能力，则表示怀疑；有些人的家属已送住北平；有的人怕参军，怕跟着军队走；也有人隐瞒了物资，担心受处罚；不少人想到解放区参观；多数人期望尽快工作。

职员对工人不敢管，工人则不服管，生产纪律不好。工人对某些有积怨的职员，有想斗一斗的情绪。工人中普遍有平均主义思想，私厂工人尤想斗想分，对经理们生活优裕不满意。有的资方想同公家合营组合作社，也有要求贷款的。私厂工人有的新成立工会，向厂家要求6小时工作制。总之，情况有复杂的一面。工厂复工，首先要解决电力供应（煤的问题不大），需6万千瓦，有3万也好。这是当时问题的关键，否则一切无从谈起。能开工的尽量开工，暂时不能开的，工人上班擦擦机器也好，挨了轰炸的及时修复，这样才能给广大工人以信心。除兵工厂外，有关工厂和工人的消息，一律在报纸上刊登。工人决不能散，鞍山复工就要12万工人。工人同职员间的关系，必须慎重处理，不能搞斗争，诉苦方式也要注意，关键是那些“长字号”人物。当时在“三忆三查”（忆日伪残酷迫害，忆国民党种种罪行，忆资方狗腿剥削迫害；查国特反动组织，查

贪污盗窃物资，查阶级，划清敌我）中，对老班长、老工长虐待过徒弟等行为，也想斗一斗。职员中真有问题的人，可向工人赔礼道歉，或作调动处理。要让工人了解，工厂中非有管理人员不可，今后还长期要用这些人，他们同工人的利益是一致的，一切问题是历史造成的。私人工厂问题，实质是资本家同工人的矛盾，要先作调查研究。当前工厂和工人的头等问题是开工，工厂不复工就一切谈不上。工会筹备先自上而下，要有技术人员和职员即知识分子参加。先不忙建立全市工会，可先建厂工会或临时管委会，组织工人代表参加接管工作，发动工人和技术人员及职员为复工、生产献计献策。以上这些意见、多是在讨论中由陈云提出或总结的。

当时工厂中办了民主改革训练班，讲课3天5天不等，学习军管会颁布的政策法令，讲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道理。还开过多次工人代表会，几十人上百人不等，反映问题，互通声气，交流经验。1949年1月5日，军管会主任陈云召集了一次工人代表座谈会，我的记忆中，是在一间会议室开的；只有四五十人，主要是听取意见。最后陈云即席讲话，首先谈到工人当时最切身的生活问题，如烧饭的煤质量不好，买粮困难等等，使代表们感到异常亲切。讲话中也谈到工人应如何对待职员的问题：有点小“气”，是小事，适当解决后，就要团结一致，全力搞好生产等。我参加了这个座谈会，《东北日报》记者送来记录稿，我订正后，由陈云亲自定稿才发表的，因此发表时间拖后了。这个讲话

已编入《陈云文选》（1926——1949），标题为《在沈阳工人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本文原载 1949 年 2 月 26 日《人民日报》），这个题目必是《人民日报》刊登时用的。我记得《东北日报》用的是“工人代表会”或“座谈会”这样的标题。从内容一看便知是个座谈会。

（三）学校和学生情况

11 月 16 日讨论学校工作时，已接收的 39 所中学，大部已复课。原有学生 23000 人，报到的近 70%；中学教职员 1252 人，报到 1142 人。当年比较进步的学校为师专、沈医以及市立二中、省立一中、一女中等。市学联与东部学联都由地下党领导，其中积极分子不过三四百人。除进步学校外，学校中的学生自治会一般不起作用。国民党在学校中活动很厉害，学生中有三青团组织。有一个特务控制的青年中学。有不少校长跑了。国民党的反动影响不可忽视，如诬蔑共产党不要国家、民族，只是跟着“老毛子”（苏联）跑；土改就是搞流血斗争；共产党办学校，“扭三个月秧歌毕业”；特别是歪曲抗战历史，说共产党不抗战，只讲台儿庄大捷、进军缅甸等，也不讲“九·一八”到“七·七”这一段历史。在学生和教员中，哈尔滨、解放区的影响还是大的，国民党老打败仗，多已不相信其报纸宣传，对国民党的腐败无能也有所认识。

学校接收后，一般教员都要求看我们的书报，主要担心的还是能否保住饭碗。公民、党义、近代史等课不能上了，改上政治课，就有教员急待培训的问题。多数教员都

怕今后教不好书。教员和学生对国民党的盲目正统观念已基本不存在，大多数人都关心解放区，也愿意接近我们，但当前的主要问题，还是如何恢复安定正常的生活，以及工资待遇问题。有的学校设备很差，长春退下来的学生有的露宿，吃不饱饭，急待救济。私立学校则想改公立，有的学生想斗争坏校长、坏教员。临毕业的学生则关心出路问题，国民党宣传：“共产党只要工人、农民，不要学生。”地主子弟想的是还能不能回家。总之，一般教员和学生对党的政策还有许多疑虑，尤其对土改认识不清。因此，当时需要有水平较高的干部到学校去工作，至少要先去宣讲一次党的主要政策。教员的训练班，只有到寒假时才能办起来。

（四）关于旧职员问题

沈阳是反动势力在东北的巢穴，日本统治 14 年，国民党又统治 3 年，官僚众多，敌特麇集，旧职员情况之复杂是可想而知的。全市公教职工中，少数高层跑了，绝大部分都留下来。当时社会上流行一句话：下层要饭吃，上层看政策。新政权推翻了旧政权，这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旧机构、旧人员原封不动接下来，时间不能过长。接收初期，工人群众就觉得民主政府太宽大了。

各系统、各单位的情况不尽相同。如铁路局有这样的顺口溜：局长不照面，处长转一转，科长哼一哼，办事员累得满头汗。中长路中方理事长 1 年只来过 15 分钟。理事、顾问 16 人，报到的只 1 人；局长 5 人，报到 1 人；处长 37

人，报到 16 人；科长（包括专员、主任秘书）117 人，报到 75 人；科员、办事员等几乎全部报到，公务员也大部报到。银行高级职员中多裙带关系，这些贵族职员大都无能。也有解放区过来的。主任以上高级职员 80% 走了，中级也走了 1/4。银行勤杂人员多，走的也多。东北电业局 188 人，走 44 人，其余全部报到；沈阳电业局 533 人，报到 498 人。这些以技术、业务人员为主的单位，走的只是少数高级业务官僚，技术人员很少走的。市警察局接收较顺利，因有地下关系，5800 多人，逃跑的只是少数。全部职员、警察采取集训的办法，进行清理。户籍警接触群众多，过去专管穷人，也包庇坏人，有的群众痛恨，论罪不大，只能逐渐处理。消防警做坏事的也有，也搞敲诈。交警欺负三轮工人，要向头头送礼，但交警大多数可留用。当时为进行清理，都采取短期集训办法，从中发现各种人的各种问题。

国民党四大特务系统，经过几次打击，缴获电台近百部。

到 12 月 8 日总结时，全部公教职工 8 万多人，清退者约 7—8%。清退最多的是高级政府（如沈阳集有东北九省二市流亡政府 1000 多人），其次是公安，再次是金融财政，工厂、铁路、学校最少（约 1—2%）。被清退者都给以出路，或改行，或劳动，或自谋职业；一般有过错的，都没有过问，向他们讲清楚，在新政权下按本领吃饭。在人员处理时，陈云几次讲到要防“左”，要根据政策和具体情况，区别对待。1948 年 8 月 1 日，陈云曾为东北局起草过一个文

件：《正确处理新收企业中的职员问题》，其中谈到除注意右的偏向外，还谈到“左”的错误：“表现在只重视工人，轻视职员，对职员缺乏分析，不加区别地乱打击，形成工人与职员对立。这样就破坏了员工团结，其最后结果也必然是妨碍生产，危害企业。”“对于职员的改造，是一种思想和作风的改造，是细致而长期的教育工作，不能急性粗暴地处理，需要自上而下的教育，也需要工人与职员的相互批评与自我批评。”关于技术人员，陈云多次强调，他们是管理复杂的现代企业中必不可少的骨干力量，只要忠于职守，都要安排好工作和职务，并在生活待遇上给以必要优待，使他们能充分发挥专长。由于领导的正确和细致，在旧人员处理工作总结中，大家都认为处理比较圆满，没有出现什么偏差。关于国民党党团员的登记，1月间确定，待北平解放后，来一个登记热潮，这样更为顺利。

接管经验总结

11月26日军管会讨论了沈阳接管的经验。28日，陈云向东北局和中央发出了经验总结的电报（即收入《陈云文选》的《接收沈阳经验》），其中谈到关于怎样才能接收得快而完整，认为主要由于预先确定了接管方法：“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但沈阳军管会接收机构，还缺外交、军事、社会、文化四处。关于怎样才能迅速恢复秩序、稳定局面，认为关键在于抓好五件事：1、

尽快恢复电力供应。2、迅速解决物价金融问题。3、收缴警察枪支，各在原岗位徒手服务。4、立即出版报纸，以传布政策，稳定人心。5、工资问题需要妥善解决。此外还谈到必须及时解决的紧迫问题，如迅速处理俘虏和疏散弹药，入城部队的纪律教育，制止内部争房子、争汽车、争工厂等。关于重大问题特别是容易出乱子的问题，领导上先要心中有数。最后还建议：“中央和各战略区野战军，均需准备有专门接收大城市班子，待工作告一段落，即可移交给固定的市委等机关。”

这个经验总结，中央即转发各中央局和各野战军前委，对于全国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接收，起了很好的借鉴作用。《人民日报》还据此经验发表了专门的文章。北平解放后第二天，我随陈云到北平，以及1949年夏我南下到武汉、湖南，所见所闻，以及自己的经历，确感到沈阳的接管经验在起作用，且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1949年1月7日，军管会各系统负责人在一起，最后又谈了一次接管经验。陈云谈了四个主客观条件：1、沈阳没有经过战斗；2、人心已在变，兼有地下活动的配合；3、军队纪律是好的；4、军管会本身工作，大家都忠于职守，作风也雷厉风行。

陈云讲了一条主要教训：不应立即将所有监狱中的犯人都予以释放。政治犯当然应即释放，但盗窃、土匪等刑事犯罪分子不能释放。沈阳当时有一半左右的盗窃案，就是由这些释放犯人犯的。也有些侦察人员乱拉关系，保存

物资，引狼入室。

易秀湘谈到，电话簿子很重要，有些仓库和原来不知道的机关，都是在电话簿上发现的。

朱其文谈到，税务局因干部少，只是办了接收，而未照顾好如何继续工作。怕旧人员贪污，而停止了一些税收，因小失大，损失本票 100 亿以上。

伍修权谈到，卫戍司令部应有一支机动部队，以便随时派赴应保护的单位。

到 2 月间，军管会名义还存在，但各系统的日常工作都归市委和东北党政军所属各系统处理了。

11 月 28 日，陈云在干部大会上作《关于东北、沈阳情况与任务及沈阳当前工作重心》的报告。这个报告当时没有发表也未形成文件，我的记事本中记有要点，现照录如下，也可当作沈阳接管工作的总结。

（一）东北情况与任务

（1）东北解放了，但全国尚未解放，因此最根本的中心任务是支援全国。

（2）工业要放在首位，又以重工业、军事工业第一。土改在工作比重中已次要，新区也可自上而下以法律行之。农业还是很重要的，特别要抓紧粮食。

（3）还有许多军事任务：铁路在内，武器与兵源等，无铁路即不能行动，一列火车等于多少万头毛驴。铁轨与枕木都出在东北。1 公里需要 1700 根枕木（1 立方米木头出 6 根枕木）。

(4) 教育：学校要正规化，要培养技术人才。少搞训练班。以后每年要培养至少几百名专家。军事教育除步兵外，要有机械化部队。

(5) 反对一些不良倾向，如：无组织无纪律现象，要强调统一集中；骄傲情绪，军队与地方干部都要千万注意；还有松劲情绪，要加紧生产，比过去任务更重；享乐腐化思想，进了大城市，有些人会发生这种变化，要懂得节制约束自己；本位主义，小摊摊主义，定要有全局观点，反对局部观点，“我是哪一省、哪一系统的”，这都不行，只能搞马克思主义，步调一致，集中统一；地位观念，定要当个厂长，掌握个局面，“宁为鸡首，不为牛后”，那一套不行，要善于处理自己这个局部；等等。总之，搞工业、机械化、社会化生产，比农业、种地、搞合作化要复杂得多。

(二) 沈阳情况与任务

沈阳是重工业与铁路中心，是东北经济今后根本变化的关键所在。有八大工厂，有机械、母机工厂，各地要保证供给沈阳原料。没有沈阳，鞍山也活不了。今后东北工农业比重要发生大变化。农业分工也要变化，南满应种棉花，大豆可出口换机器。要准备明年闹春荒，粮价可能大涨。

沈阳现在还不是哈尔滨，接收了不等于天下太平。哈尔滨已做了两三年工作，各方面上了轨道。沈阳敌特留下电台很多，现在还只给以初步打击，过一个时候还要活动的。电力还没有解决，小丰满送来也不够。工厂复工问题仍多，工人走散了些，数量远不够。

目前任务：确保城市治安，正确执行政策，准备恢复生产。

(1) 散俘要全部集中。继续打击特务，查收电台、武器。重新登记户口。警察全部受训。旧人员分别处理。将校俘虏、高级职员、中央社编辑等人员处理非常复杂。继续制止一切破坏行为。

(2) 政策问题。流亡地主很多。国民党党团员登记。金元券处理等。

(3) 工厂复工。当前重心放在国营大企业。大企业中的群众工作与党的工作必须依靠地方党。市委重心放在国营企业、大厂，而不是一般工商业与市民工作。

向工厂行政负责同志讲清楚，工厂群众与党的工作要靠市委。又管行政又管党务不行，何况业务还不精通，行政、生产够忙的了。北满经验：工业部 138800 工人中，只有 1500 名党员；铁路 86000 名员工，也只有 3000 名党员，就因无专人做党群工作。原料、机器、劳动力三者合在一起，才能生产，最重要、有决定意义的还是活的人。对工人与工程师都要做思想工作，所有做行政工作的同志都要认识到这一点（在另一次讨论工厂工作问题时，陈云还谈到：厂长应以 55% 的精力管工人问题，机器是死的，人是活的，一辈子都要注意）。资本家只注意机器和技术，而压迫人、轻视人。我们是两者结合。

今后由地方党领导工厂党群工作，保证完成生产任务，但现在认识上与组织形式上尚未解决。军工、军需有政治

部，铁路只部分有。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行政负责同志，现在问题是没人做党群工作。生产计划要交地方党委一份。过去工业少，地方党力量主要放在农村。

余建亭的文章概述了军管会接管沈阳的经过及经验，特别论述了陈云的领导艺术与领导作风，使大家深受教育。文中写了这样五个方面：1、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制定工作方针；2、作风民主，正确执行民主集中制；3、调查研究，深入基层，掌握第一手材料；4、重视群众工作，关心群众生活；5、重视和善于总结经验。我上面记录的这些只是回顾历史的资料。关于陈云当时深入基层、掌握第一手材料，我几乎没作什么记录。在沈阳时他就去过兵工厂等工厂，1949年1月到4月间，又先后分4次到过鞍山、抚顺、本溪、大连、瓦房店、安东、长春、吉林、四平、磐石等地，参观工厂、矿山、电站、科研单位及商场等。大多数地方我也是随同去了的，可惜都没作记录。沈阳接管时，我在陈云同志身边工作，一直住在一起，受到的教益很多。至今我还记得他讲的这样的话：鹅毛扇摇摇，能摇出问题。不踱方步，大事、大问题出不来；踱方步时，不要有人来找。领导必须抓住大问题。他还对我说过：既然在我左右，有什么重要问题要经常从旁提醒。陈云同志的工作作风和教诲，令我终身难忘。

（责任编辑 邢济萍）

我的革命生涯*

张庆孚

1901年8月4日，我出生在江苏省江阴县一个私塾教师的家中。

1916年我考进了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在这个学校里我有机会阅读了社会发展史和文史一类的书籍。当时旧中国正遭受各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国内军阀混战，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开始为国家的兴亡感到忧虑。1921年，我从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毕业，同年考上了上海大学英文系。上海大学是由东南高师改组的。在该校使我有很多机会看到进步书籍及马列主义书籍。《向导》和《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对我启发很大。1923年，我与安剑平（安若定），张晓柳等成立了“孤星社”，创办了《孤星报》，我们宣传革命的思想，发表对时局的见解，展开讨论。当时，刘华、韩步先、秦邦宪等都参加了这个组织。1925年我回到了故乡江阴县与钱青泉（振标、选青）、周水平（刚直）、毛

* 这里发表的是张庆孚回忆录中与党史有关的部分，文章标题是编者加的。

学勤、孙逊辟、朱士能等在江阴创办了《星光报》，大家推选我任社长。《星光报》积极配合革命形势的发展，宣传革命思想。不久我回到上海，《星光报》在其他同志的努力下继续办下去。1929年江阴几县农民举行了武装暴动，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红十四军。农民运动蓬蓬勃勃，江阴一带组织了农民协会，《星光报》也积极鼓动农民起来抗租，革命的浪潮猛烈地冲击着地主、豪绅的统治。当时江阴的36个地主、豪绅联名到军阀孙传芳处告状，周水平同志首先遭到杀害，这就是当时轰动江阴的“周案”。

旧中国的黑暗、军阀的横行、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领土上为非作歹，使我非常愤恨。1925年上海发生的“五卅”惨案，这血淋淋的事实使我进一步地认识到，只有在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决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国革命才能胜利。我积极要求入党。1925年经恽代英同志介绍，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我担任了上海平民学校校长。这是一所用革命思想培养职工的业余学校，在学校里我也参加授课，讲授马列主义理论。

1926年7月我在上海大学英文系刚毕业。这时，恽代英同志根据党的指示去广州担任了黄埔军官学校政治总教官。同年8月我经恽代英同志的介绍也来到了黄埔军校。当时教育长是方鼎英、张春甫，政治部主任是熊雄，入伍生部政治部主任是贾伯涛，入伍生部政治部秘书是阳翰笙（原名欧阳继修）。到校后我被分到第六期入伍生部第一团

四营担任政治教官。该营驻在虎门，党内联系人是宋时轮，每周他向我汇报该营左派发展情况。当时一团团长郭大雄，营长陈明仁，都是坚决反共的，他们仇视革命，常在团里和营里挑起纠纷，使两党之间的矛盾越演越烈。在一次纪念孙中山的大会上我充分揭发了陈明仁违反孙中山联俄、联共、辅助农工三大政策的行为，这样，我与陈明仁的矛盾完全表面化了。难于继续在一个营共事；上级知道后于11月将我调到了一团三营任政治教官。三营驻地深圳，离香港仅20多里。这里条件很好，营长邓子超是共产党员，这个营的共产党员最多，工作很好开展，但也因此成为国民党特务密切注意的对象。

在三营当政治教官时，要常给学员们讲政治形势，作报告。这对于我这个初毕业的学生来说，还是个尝试。在这方面，恽代英同志和肖楚女同志常常给我以指教。在黄埔军校期间，我与恽代英同志见面的机会较多，常在一起交谈，同肖楚女同志见过四次面。第一次见面时恽代英同志也在场，我向他们汇报了我营的情况后，说：“要想讲好课，这里面还真有学问。前次上课，我准备了讲稿，打算讲三个小时，可不知怎么搞的，不到半小时就讲完了。”恽代英笑着对我说：“讲好课要有一个过程。不过，我告诉你一个方法，你试试看效果如何：讲东西不能逐字逐句写稿子。我讲话只是把地点、人名和年代记下来，以免讲话时弄错，其它的就画些符号。好比讲资本主义世界的四大矛盾吧，你就在稿子上写个‘四’字，不过你必须要把所讲

的内容弄得很清楚，以免讲时出错。讲的时候要慢一些，把语气和感情讲出来，准能吸引人。”以后上课我就试着办，效果果然很好。后来到了延安在抗大军政学院教书时，我都是按着这种方法备课、讲课。

1926年9月，黄埔军校需要上节大课，主要是讲目前的形势问题，宣传科长杨其纲找到我，请我去作这个报告。我按着上述方法理了个提纲，在作报告的时候，我从国内形势讲到国外，分析了目前我国的状态，我们的任务，由于思路清晰，深入浅出，又举出大量的实例，这样报告既生动又感人，足足讲了两个钟头，在一片掌声中结束。当人们陆续散场时，我才看到坐在后面的恽代英和肖楚女。恽代英握住我的手说：“报告做得很不错，看来你已经掌握窍门了。”临走时，肖楚女对我说：“我虽然才与你见过四次面，但你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永远不会忘记你。希望我们常保持联系。”但没想到这次见面，竟成了我们的诀别。1927年4月15日传来了肖楚女在广州牺牲的噩耗；1931年4月恽代英又被大叛徒顾顺章出卖，在狱中牺牲了。与他们同期为革命献身的还有在上海工作的钱青泉（振标）、毛学勤、欧阳新、武迈吾、贺尚志……这些革命的好同志，只要我一闭上眼睛，他们的音容笑貌就会浮现在我的眼前，我深深怀念他们——为今天的胜利而献身的烈士。

1927年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疯狂地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这一股反革命阴风从上海刮到了广州。1927年

4月15日，李济深在广州对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下毒手了。这天，邓子超同志正在向全营官兵训话，突然一团团长郭大雄带兵包围了三营，发动了反革命事变。营长邓子超以及其他共产党员当即被捕。这时，城内城外枪声大作。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和所有的民众团体及党校机关，都被李济深劫掠一空，并贴了封条。一夜之间，广州变成了恐怖世界，大街小巷，遍地尸体。工农纠察队被反动军队缴了械，城墙上贴着大幅布告，斗大的黑字写着被通缉者的姓名。反革命分子见穿中山装、剪短发的，便说是共产党，不加问讯，拖出去就杀。事变的当天，我因去深圳工会开会未在营中，才幸免于难。深圳工会的同志得知事变的消息后，立即带我转移。我们急行十几里后，来到了一个偏僻的乡村，工会同志把我托付给了一个农协会员，向他讲了当前的形势，嘱咐农协要隐蔽一段时间，不要搞公开的活动，之后便匆匆走了。我在农民家呆了一周左右，见局势稍有缓和，便根据党组织的指示，离开此地秘密回广州。临走的那天农民一家人都依依不舍。在他们家中，我感受到了亲人般的关心和温暖，在危急关头，他们不怕被牵连、杀头，坚定地站在革命这一边，使我深深感到革命必须依靠工农群众，有了他们，革命就一定有希望。

回到广州后，局势仍很紧张，敌人完全疯狂了。他们认为“凡农皆匪，无徒不暴”，老百姓人人都是他们的仇敌，稍不顺眼抓起来就杀。我也不敢到处乱闯。回到广州后身无分文，在困难之际我想到了方鼎英，方鼎英当时是同情

革命的。我趁黑夜不为人注意来到他家中，他见到我很吃惊，说：“到处贴出告示要抓你，你怎么还在这儿？”我说：“我才从深圳回来，才知局势这么紧张，现在又身无分文，想走也走不了。”他很慷慨地拿出500元钱，叫我速速离开此地。为了使我迅速平安脱险，党组织给了我一张邮票，这是找船上地下组织接头的暗号，我经过乔装，躲过了敌人的耳目，上船后拿着邮票到机仓顺利地对上了暗号。就在这时，岸上突然传来一阵紧急的口哨声，只见一群特务忽拉一下把船封锁了，说奉上级的命令要进行搜查，情况十分危险。轮船上的工人急中生智，忙让我藏到水箱里。这时特务来到了机仓，查看了每个人的证件，又拿着手电筒在水箱内照了一遍，没发现什么异常情况，才咋咋呼呼地走了。在同志们的掩护下，我终于由广州绕道香港回到了上海。

此时的上海，江心停泊着外国轮船，船上插着五颜六色的外国旗。江边巍峨的建筑物，挂着晃眼的铜招牌，全是外国字。江边码头上，到处都是外国巡捕，虎视眈眈地盯着过往行人。这也是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横行霸道的世界。一进入市区，最触目的是“铲除共产党，人人有责”的大字标语。蒋介石那幅戎装画像，凶神恶煞地竖在不远的房顶上。街上便衣特务、暗探很多。党组织已完全转入地下，广州、上海到处都一样，是一片白色恐怖。

1927年5月我抵达上海后，就立即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经组织介绍我来到了武汉。党派我到三十五军（军长

何键)当师政治部主任兼军部党团、师部党团书记,师长是陶广。三十五军原驻武汉,后因北伐吴佩孚进驻在河南驻马店,部队在此地打了一个多月的仗。在驻马店我患起猩红热高烧不退,被送返汉口治疗。走后不久,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正式召开了分共会议,宣布与共产党决裂,公开叛变革命,在“宁可枉杀一千,不使一人漏网”的血腥口号下,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了疯狂的大屠杀,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至此完全失败了。

大革命失败后,为保存革命力量,在1927年8月中旬,党组织决定我们这批共产党员约有三十七八人通过胡伦(即王守义)的介绍,从武汉撤退到安徽太和,在新编第四十七军任事,军长是高桂滋。我被委派任师政治部主任,军部党团、师部党团书记。我的上级是曾晓渊(曾鲁),担任军政治部主任。王世英大约任团的教导员。我们去的目的地就是要分化和利用敌人,同时养精蓄锐,争取参加以后的暴动。军长高桂滋不大过问政治,是个鸦片烟鬼,这就给我们工作的开展提供了一些条件。不久杨虎城的部队也进驻了太和县与高桂滋部队会师,这使我有机会结识了杨虎城。杨虎城是国民党爱国将领,曾参加过辛亥革命,1917年任陕西靖国军第五路司令,1924年任国民军第三军第三师师长。1927年参加国民革命军,在当时军界中比较有名气。在党的特委委员开会时,我又认识了在军委作情报工作的刘仲华和杨虎城部队的政治部主任魏野畴。

为了扼杀革命,蒋介石的魔爪又伸向了这支部队。1928

年初，蒋介石派人前来“整编”高桂滋部队为正式国民党的军队，并完成“清党”工作。一下子部队上上下下开始紧张起来。我在黄埔军校教过书，国民党内部许多人认识我，“清党”这一关是过不了的，因此，无法在这里继续工作下去了。党组织决定我和胡伦、曾晓渊等同志分两批离开高桂滋部队。我与胡伦返回上海。我们走后，余下的共产党继续隐藏在高桂滋部队，后听说在1928年4月参加阜阳暴动时，这几十名共产党员牺牲了。1944年延安整风时，我意外地见到了王世英，我说你还活着，我还以为你也牺牲了，他说，他与刘贯一两人是开小差离开高桂滋部队的。

1928年2月初，我回到上海后，组织分配我在上海中共中央驻交通发行机关工作，胡伦分配到何处已记不清了。此时的上海仍是党的领导机关所在地，当时因受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党的领导没有以红军游击战争为中心，还在号召中心城市举行总起义。游行示威、飞行集会几乎天天不断，喊口号，散传单，砸电车。结果是积极分子大批被捕，秘密组织大批遭受破坏。在反革命白色恐怖下举行城市起义，这种错误路线使革命事业受到严重的损失。在敌人心脏我们的斗争也更加艰苦了。回上海不久，上海中央局曾安排我去莫斯科开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中央特科行动科长顾顺章（后叛变革命）给我开了一间大旅馆，叫我住在那里，日夜不准外出。住了好几天我实在憋不住，便出去换换空气，顾顺章来找我没见到我，就把各省代表到莫斯科开会的介绍信堆在桌上走了。我回到旅馆

门房告诉我有人找我，说有要事相商。我急忙上楼一看，房内无人，只见桌上堆了一堆纸，走近才知是绝密的代表人名单。他把革命视为儿戏的作法，使我非常气愤。我把人名单藏好后就去找顾顺章，见到他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愤怒质问他：“你把那些秘密介绍信放在桌上，不等于向敌人告密吗？”顾顺章无言以对，但从此他便怀恨在心，并设法阻止我参加第六次党的代表大会。

从大旅馆搬出来后，1928年8月我经陈章甫介绍到吴克坚在上海创办的华德小学的夜校教书，这个学校是准备中央开会用的地方。但不久在1929年初我又离开华德小学，由李亚非（农）介绍到群治大学教书。1929年7月又通过上海法政学院教务长朱文黼（是我的表叔）介绍到法政学院任教授。以后我父亲有个学生名叫刘复，字半农，江苏江阴人，曾参加过《新青年》的文化革命运动，在北京大学任教授，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他介绍我去上海国立暨南大学任专职教授。这儿的薪水比法政学院要高出三倍，但党的工作需要我在法政学院，因这里便于开展工作，所以我没有去，而是借此机会通过刘复的关系，介绍了李达到暨南大学当社会系主任。李达把大学作为宣传革命真理的讲坛，勇敢地对广大青年学生讲授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国革命的问题。他的讲课受到进步青年的热烈欢迎，教室里常常挤得满满的，不少青年因受他讲课的影响而决心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扩大了革命的影响。当时，通过张志让，由我直接介绍到上海复旦

大学、暨南大学、上海法政学院担任教授的有：邓初民、潘震亚、吴亮平、潘梓年、王学文、阳翰笙、廖体仁、陈袒谦、刘兰明、洪孟博、钱亦石、李剑华、周新民、张定夫、熊得山等。

大革命失败后，党由公开转入地下。由于党中央 1927 年 11 月扩大会议犯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使初步恢复的白区工作遭到严重破坏。1928 年 5 月党中央在发布的通告《关于在白色恐怖下党组织的整顿、发展和秘密工作》中指出：“最近几月，党组织遭受重大破坏的原因，固然是反动派进攻，但党组织不适用于秘密工作环境，实为破坏的重大关键。”因此，“运用公开机关去团结广大群众的斗争是白色恐怖下党最重要的任务”。提出了“党的秘密工作必须与公开工作联系起来，尽量利用一切公开及半公开的机关团结工农群众”的策略方针。“六大”以后，党中央为实现白区工作方式的转变作了很大的努力，实现了党的机关工作社会化和家庭化，尽可能利用公开合法的方式去争取群众。由于党的策略方针和工作方式的转变，党的白区工作有了相当的恢复和发展。在党的白区工作正确方针的指引下，我们的工作也有了转机。从 1929 年至 1934 年期间，我在合法的工作职业的掩护下秘密地进行党的工作。

1930 年为反对国民党反革命文化“围剿”的斗争，在上海地下党的领导下，成立了“中国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参加社联的成员要能写文章，能讲课，能翻译的人。我任社联党团书记，杜国痒（林伯修）担任

组织，李春番（柯柏年）担任宣传。社联的主要活动是团结广大进步知识分子，出版刊物，成立读书会和社会科学研究小组，宣传马列主义，在学生、职工中开展业余文化教育。当时社联所出的刊物除《新思潮研究》以外，还有《申报月刊》、《学生杂志》、《中华月刊》、《中苏月刊》、《妇女杂志》、《江南生活》等 100 多种。社联的活动和鲁迅领导的“左联”相互配合，有力地反击了反革命的文化“围剿”。

1932 年“一·二八”上海淞沪抗战爆发后，中宣部领导张闻天动员党员与非党员大学教授公开召集群众讲话。这种盲动主义的作法，遭到了我们党团三人的坚决反对，因为这样就公开暴露了社联的全部组织人员，会立即被国民党全部消灭。不久由瞿秋白到我家召开会议动员党团组织同意中央意见，结果我们一致拒绝。第一任社联就此被中央解散，另行分配工作。第二任社联书记是武兆镐（武剑西）。

社联解散后，1932 年 3 月我被调到中央特别任务委员会。后来，临时中央组织局局长李竹声叛变，他将我上海与北方局及其它省一级的全部地下组织告诉了敌人，我们不宜在上海再呆下去了，党组织决定我作为中央代表去陕甘特委，任务是与中央红军长征队伍取得联系。我带去无线电一部，还有几箱药给长征部队。给了我一封用药水写的信，内容即是临时中央派我去陕甘特委作中央代表。并说上海到西安的交通由王世英负责，并带王世英到我家见

了面，这是分别后第二次与王世英见面，以后王世英又带王超北来我家见面，叫王超北护送我到西安。

1934年11月我离开了上海，乔装为国民党军官，由王超北护送，一路闯关过卡大约在1935年1月到达了西安。到西安后我用药水将临时中央派我作为中央代表的介绍信洗出来，然后由西安到陕甘的交通员徐国连同志将信先送到陕甘特委。当时陕甘边红军总指挥部的政委是高岗，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是习仲勋。他们看了介绍信后派陕甘特委书记薛子俊带着红二十六军的王世泰团的一个主力营（营长于占彪）到边界来接我。1967年在北京医院与于占彪相遇，谈起在陕甘边苏区的那一段日子，别有情趣。我从西安到陕甘特委边界是骑牲口去的，途中颠簸了半个多月，大约2月份才到达陕甘特委红二十六军根据地南梁堡。到后约两星期我就派人去西安取无线电台。去的两个人，一个是交通员徐国连，另一个记不住名了，此二人一去就没回来。我心里十分着急，因为没有电台就无法与长征的中央红军取得联系。等了一段时间，又派一同志去，结果这同志回来说上次派去的二人徐国连被敌人抓去杀害了，一人叛变了，王超北不知下落，无线电台也无法取回来。这部电台及两箱药品直到1936年才由刘向三从西安取回来。

当时因没有电台，无法与中央红军长征队伍取得联系，我准备向北移动。1935年2月东北抗日联军已组建，冯玉祥部队中有个重要的干部叫任唯吾（名字记得不准）是共产党员，我想通过他搞一部电台，以便与中央红军长征队

伍取得联系。红二十六军王世泰团长又派营长于占彪率主力营护送我向北走，在快到陕北边境的地方与敌人送军事装备的一个营遭遇，部队消灭了敌人，扩大了红军 300 多人，并缴获了敌人军事装备物资。到陕北后，护送我的部队就回去了。

我到达陕北，大约是 1935 年 7 月下旬。这时正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继续发展时期。1931 年 9 月间，从以秦邦宪（博古）同志为首的临时中央成立起，到 1935 年 1 月遵义会议止，临时中央因为白区工作在错误路线的领导下遭受严重损失，在 1933 年初迁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更使他的错误路线得以在中央所在的根据地和邻近各根据地进一步地贯彻执行。

1935 年秋，犯“左”倾错误的朱理治以中央代表名义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包括陕甘边和陕北），同原在那里犯“左”倾错误的郭洪涛同志结合，将“左”倾错误路线贯彻到政治、军事、组织等各方面。陕北苏区发生了严重的错误肃反事件，刘志丹等一大批创建西北苏区的同志被逮捕，遭受了残酷的迫害，造成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严重危机。这时，党中央长征到达陕北，纠正了这个“左”倾错误，将刘志丹等同志从监狱里放出来，从而挽救了陕北革命根据地。

我到陕北几天后，由于对推行“左”倾路线的错误肃反不满，很快也遭到“左”倾机会主义的残酷迫害，我被软禁起来。大约在 9 月中旬的一个夜晚，他们派人押着我，

走出房屋，我一眼就看到了挂在天边的一轮明月，被关禁的这段时间，我是第一次看见月亮。我心里很坦然，因为我的一切都是光明正大的。我被押进一间小屋，审问我的是戴季英。一进屋他审视着我，我毫无畏惧地盯着他。他突然说：“你是一个假中央代表。”我说：“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我有临时中央的介绍信，此信在西安用药水冲洗后由陕北到西安交通员徐国连送到陕甘特委，经高岗、刘志丹、习仲勋都看到过。他们见信后就马上派陕甘边区特委书记薛子俊，带了王世泰的主力营来接我，这个事实，你们可以去了解。”他无言以对。我见他的指控理屈，就又义正词严地对他进行了驳斥。戴季英一听恼羞成怒，叫打手对我用刑。

到了9月下旬10月初，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五六十人也被捕了与我关在一起。大家都被带上了脚镣，我的脚镣特别重，还被带上了一副手铐。经多次的严刑拷打，但始终没有得到我的任何口供。我坚信是非总会分明，党是会来营救我们的。

1935年11月初中央红军来到了陕北。当时由红二十六军团长王世泰前去迎接，并向中央先头部队汇报了许多负责干部被迫害的情况。

中央接到了红二十六军迎接部队的报告，便立即派刘向三带着一部分部队于11月下旬来到了瓦窑堡。12月初中央到达瓦窑堡，从17日开始，中央召开了瓦窑堡会议，毛主席在会上作了著名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的报告。一天下午，博古来到了我们的牢房，给我们打开了脚镣、手铐。因为血肉凝在一起，我的镣铐花了好几个小时才打开。我穿上组织上发的新衣服就马上到刘志丹和其他同志的房间对他们说：“你们看，我换新衣服了。党中央毛主席来了，我们可以重见天日了，我们得救了！”大家激动得热泪盈眶。当天，在陕北保卫局前院的大厅里，摆了两桌酒席，表示对我们的慰问。吃了饭后，我问博古这是怎么回事？博古说：“这是误会，过去在江西和鄂、豫、皖，肃 AB 团同样有这样情形。”我立刻很严肃地回答：“你没实际工作经验，你是天上掉下来的领袖。”“左”倾错误路线对我们这批革命同志的残酷迫害，当时未能全部清算。因为一则，中央是在长征途中，领导机关一些成员的思想还未彻底清理，对陕北搞错误肃反的负责人也还来不及清算；二则敌人正在“围剿”，不能做更细致的调查研究。所以，我们虽然被释放了，“肃反”的责任尚未全部弄清。以后，中央腾出手来，又经过调查研究，到 1942 年底至 1943 年初，党中央直接领导西北局在延安召开了西北高干会，毛泽东、任弼时、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彻底清算了“左”倾机会主义在西北造成的恶果。

在延安的这段时间，我与徐特立同志、周兴同志一起渡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我们在一起谈论过去，也时时一起幻想着未来，谈论革命胜利的明天。徐特立当时任教育部长，我出狱后便与徐老住在一起。我的伤势比较重，徐老在生活上对我很关心，常常把别人送给他的好东西煮给

我吃，给我补养身子。我们同住在一个窑洞，睡在一个炕上。在大雪纷飞、北风怒号的严冬寒夜，我们挤在一起同盖一张破羊皮防寒。到了夏天我的伤势已基本痊愈，我与徐老一块儿到河里洗澡，清凉的河水洗去了我们心中的全部烦恼。我们把衣服洗干净了晒在石头上，火辣辣的太阳，半晌就把衣服晒干了。待我们上岸时，又可以穿上干净的衣服了。虽然生活很艰苦，但我们的的心情非常愉快，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信念，就是革命一定会胜利。

1936年到1942年组织上分配我在红大、抗大军政学院教书。此时，周兴同志在西北局做保卫工作，他叫我在抗大也做一些保卫工作。我把我在上海掌握的情报及我所了解的情况都向周兴同志作了反映。周兴同志具有朴实的工农感情，对人诚恳，热情，作风正派。与他在一起我们无话不讲，他常在各个方面给我以帮助。每到空闲时间我便去他家中看他，在他家中就如同在自家一样。1964年冬他来北京开会，这时我已生病住院，我们久别相逢，共同回顾过去，谈论现在，有满腹说不完的知心话，这种深厚的革命情谊，我永生难忘。

1938年初，我爱人曹淑华带着小女儿铁铮来到了陕北。看着风尘仆仆的淑华和呀呀学语的小女儿，我真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是真的。我急切地问她怎么会来到这儿。淑华说：是组织上派人接他们来的。同志们都替我高兴，忙着帮我安顿房屋，准备饭菜。那窑洞一经布置真是焕然一新。晚上淑华向我讲述了我走后家中的一切。她说：自你

走后，母亲因为想念你病了很长一段时间。你一走就连个信儿也没有，我心里也总是七上八下的，全家人天天都在盼望你的消息。前段时间，还真的盼来了。地下党的联络员突然来到咱家，说让我收拾东西接我来延安，并告诉我们，你一切都好。母亲和全家听了都很高兴，忙着帮我收拾行装。因一路要过不少关卡，为防止意外，组织上说只能带走铁铮，因她还不会说话，盘查起来还不会出差错。另外三个孩子不能带来，分别由母亲和我哥带。一路上很艰辛，每走一段便有一个同志来护送，我们彼此之间都不认识。护送的人一路不多言。临走时，他就告诉我第二天的接头暗号，第二天一早一定又会有一个同志来接我们。就这样一程又一程地走到这里。在西安以北，国民党挖了一条又一条封锁沟，架了一重又一重铁丝网，通过内线搞到护照才混过关卡，真是历尽了千辛万苦。

1939年抗大总校转移到敌后，延安留了一个三分校。1940年下半年至1942年我调到军政学院任政治教员，但家仍住在抗大三分校窑洞，离徐老很近，我们来往就方便了。徐老常来我家，我和淑华也常去看他老人家，每次去看他，临走时他总要送我们一段路，才依依分手。徐老不仅在政治上，在生活上也是无微不至地关心我。有一回我拉肚子，长期不好，延安当时很缺药，只好拖着，身体渐渐垮了。徐老听了很着急，忙把他儿媳徐乾养的鸡下的蛋，自己舍不得吃，全部拿给我，使我很感动。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以后，我离开延安调到东北梅河口的前一个

星期，徐老又来给我送行。1964年当我心脏病突发时，徐老还叫他的女婿林山同志送药到北京医院守了一夜，因医生不许见客，徐老只能在门缝里探望我多次，他慈父般的关心，使我终生不能忘怀。

1946年到1949年，我一直转战在东北，杨至成是我的上级。1950年2月调到北京中央林业部任办公厅主任，1950年8月——1952年12月任林业部党组副书记，1956年8月任中央林业部副部长，1956年9月当选中共八大代表，1958年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959年底患心肌梗塞，住院休养。在我一生中曾出版的书籍有：《社会问题大纲》（分别于1930年、1932年出版）、《国际经济政治学原理》（1933年9月出版）、《国际问题讲话》（1937年5月2日出版），笔名为：张琴抚。

回顾几十年我跟随党渡过的艰苦岁月，回想起许多和我同时参加革命的同志都牺牲了，为了纪念他们，我把自己一生的经历写下来，让我们的子孙后代知道今天的胜利是来之不易的，要倍加珍惜，要为建设一个强大的新中国而奉献自己全部的力量。

（责任编辑 刘昌亮）

战斗在胶东抗日战场的日日夜夜

王 彬

1939年9月，在我担任八路军山东纵队参谋长期间，接到中央指示：在胶东区党委军事部的基础上成立八路军山东第三军区，并任命我为司令员，王文同志为政治委员。胶东军区的范围是：潍县以东的山东半岛，包括青岛、烟台、威海等城市。

胶东是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地区。“七·七”事变之后，英雄的胶东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天福山武装起义，成立了“山东省人民抗日救国第三军”，打响了胶东抗日战争的第一枪。此后，各县陆续举行武装起义，建立抗日游击队，开辟抗日根据地，有力地打击了日伪反动派的嚣张气焰。到1938年底，胶东已经建立了一批抗日民主政权，并形成了蓬（莱）、黄（县）、掖（县）部分地区连成一片的抗日根据地。当时，胶东地区的抗日人民武装，除山东纵队第五支队外，还有各县的抗日游击队。

成立山东第三军区的目的是为了统一管辖胶东各县的游击队，组建正规部队，发展和壮大抗日武装，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当时还规定，各县设抗日游击大队，区设

抗日游击中队，乡设抗日游击分队。在我去胶东上任前夕，中共中央于1939年12月6日曾发出《关于山东工作方针的指示》，指出山东工作的总方针是：坚持对日寇的游击战争，坚持自己已得的阵地，发展自己的力量，开展群众工作，与顽固分子进行坚决斗争。不久，毛泽东又明确指示：中共山东分局必须把发展武装力量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纵队领导同志根据中央指示精神，也对第三军区成立后的工作提出了要求。中心内容是：要坚持胶东的游击战争，敢于同国民党顽固派和日伪军进行斗争，在斗争中扩大武装力量，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

1939年底，我带着上级的指示精神，来到胶东军区的所在地招远县西南部的山里曹家（区党委住附近的掖县东来儿疃）就任新职。

1939年胶东人民的抗日战争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出现了一些曲折。在1月16日至3月7日的蓬、黄、掖保卫战中，胶东军民先后作战十余次，为保卫新生的抗日人民政权做出了贡献。但是，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在执行统一战线政策上的右倾倾向，如与只在口头上表示抗日的国民党顽固派组成“联军”，并把正副总指挥的领导权让给顽固派头目赵保原和秦毓堂。同年6月，在日伪集中兵力“扫荡”鲁南而胶东暂时缓和时，胶东的顽固派便猖狂起来，杀害共产党八路军人员的事件不断发生。赵保原在莱阳大肆捕杀抗日人员家属，杀害共产党员200余人，“抗日联军”宣告破裂。10月，日伪军增兵胶东，对国民党顽固派实行

诱降，顽固派便公开打出“先打八路，尔后抗日”、“抗日其次，抗八正经”的反动旗帜，并配合日伪军对我“扫荡”和进攻。由于当时领导思想上的右倾和过高地估计顽固派的力量，未能及时教育我党我军，并给顽固派以应有的打击。甚至想用蒋介石“抗日诺言”来说服他们，希望“精诚团结，安危共筹”，并在报纸上发表讲话，讲什么在“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之最高原则下，应把握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这种过份退让的指导思想，不仅没有取得和平团结的结果，而且使顽固派更加猖狂起来。年底，顽固派首领赵保原竟纠集胶东大小顽固派司令组成“抗八联军”，专与我作对。在日伪军和国民党投降派的联合进攻下，我八路军五支队和胶东抗日根据地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在日伪军占领了牟平、掖县、龙口、莱阳、栖霞等几个主要城镇之后，开始合击我蓬（莱）、黄（县）、掖（县）根据地。我们的活动范围缩小了。根据地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反击反共顽固势力 发展巩固抗日根据地

了解了上述情况后，我深深感到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任务很重。但是，刚刚宣告成立的第三军区又没有可供打仗的武装力量。不仅指挥机关不健全，就连一个营的兵力也凑不齐。怎么办？我就去找黎玉同志请示和商量。当时，他作为山东军政委员会代表和我一起来到胶东，任胶

东军政委员会的负责人。他说，要打顽固派，看来只有请五支队出兵。黎玉同志旋即召集我、王文同志和五支队司令员高锦纯同志等开会，研究反顽问题。我提出：应该在招远南部打一仗，那里的顽固派徐叔明（国民党苏鲁战区第二十六支队司令）经常杀我们的交通员，骚扰我们的部队。但是，有的负责同志却不主张打。结果，这次开会没作出什么决定。又过了些日子，我把第三军区的部队整顿成一个营，400余人，另加一个骑兵连，第三军区总算有了直辖的基干武装力量。

我刚到职不久，碰上了日本鬼子的冬季“扫荡”。当时，突然接到报告：日伪军已经到达上东庄和下东庄，距我们军区机关和胶东区党委机关只有五六里路了。当时我掌握兵力只有一个警卫连。为了掩护两个机关转移，我命令二排三排立即进入阵地，准备阻击敌人，争取时间，掩护军区机关转移。我亲自带一个排，掩护区党委机关撤退。刚到胶东，敌人就给我们来了个“下马威”，敌人一气追了我们三天三夜，从掖招（远）边区的山里曹家和来儿乔，经过招（远）莱掖边区直到平度北山区的小块根据地转到大泽山处，又从葛门口转回来，好不容易才甩掉了敌人。这次转移，机关把全部家当都带上了，什么文件、档案，还有一项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根据地银行的北海币和金条。那时我们有金矿，许多财政支出全靠它了。这次转移，使我深深感到：要抗日，没有巩固的根据地不行，没有强大的武装力量也不行，非得和国民党顽固派和日伪军做坚

决斗争不可。

现有的边区根据地范围大小，群众说是“一枪能打透”的一片地方，也有的说象“驴脊梁骨”那么窄。为了给反共顽固派以应有的反击，打开抗日局面，我又去找黎玉同志商量。黎玉同志又召集我和高锦纯、王文等同志开会，研究打仗问题。最后，初步决定要打，由五支队打徐叔明的司令部，徐大约有一个团的兵力；我们攻打顽固派焦舜卿的招远县政府（这个县政府并不在招远县城，而是在招南的农村）。但是，就在部队已经开进快要打的时候，五支队的指挥员又来电话了，说据侦察敌人情况又有变化，还是不打的好吧？这回我可有点火了，在电话中说：“咱这是打仗，不是下棋，会上决定的东西，怎么能随便更改呢？”后来终于打了。具体时间是1940年2月21日，作战地点在招远南部的曹孟、黑都泊、黎儿埠一带。这一仗，打死打伤顽军100余人，俘虏二三百人，还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五支队对徐叔明的仗也打得不错，最后徐叔明只带领百余名残兵败将投靠顽固派头目赵保原去了，还有百余名顽固派到大龙口投靠了日伪军。这一仗之后，招远南部广大地区与东北部我蓬、黄根据地和西部我掖县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大大鼓舞了人民的抗战热情。

招南反顽战斗胜利之后，我们获得了一些武器装备，并以俘虏补充了兵员。为了扩充武装力量，部队进行了休整，组编了第三军区第二营。

当时，掖县东南部的大泽山区北寺口住着顽军司令高

玉璞的一支部队，其首领叫王席珍。高玉璞原是掖县的伪军头目，占领北寺口后，杀害我方交通员，袭击我抗日游击队，作恶多端。我们决定拿下大泽山的北寺口。3月1日晚我们从高玉璞预料不到的一个山间小路迂回过去。记得当时带路的有掖县大队长王候山同志（原二机部副部长），他对这一带的道路很熟。拂晓前，我军居高临下对北寺口形成了一个半包围圈。打响之后，天已大亮。高玉璞的部队还在睡大觉呢。可惜兵力太少，没有四面包围，眼看着多数顽军狼狈逃走了。这一仗，击毙顽军不到100名，俘虏了350多人，缴获枪支300多支，电台1部。

这一仗，不仅打开了通往鲁中的一个关口，打击了顽固派的反动气焰，鼓舞了人民群众的士气，而且收复了掖南的大泽山区，使大泽山和掖东、招南、蓬莱山区连成一片，从而大大巩固和扩大了胶东根据地。

部队回到山里曹家，我们召开了一个祝捷大会。王文同志讲了话，热烈祝贺胶东的反顽斗争的重大胜利。我召集全体干部开会，总结了作战经验和教训。

打完北寺口，我们已经有几门迫击炮和一挺轻机枪了，于是我们成立了一个机炮连。成立的方法还是和过去一样，八路军游击队的老战士加上新过来的俘虏兵。

这时，又着手组建第三营。人员不够怎么办呢？当时只有向各县大队抽调。抗日战争以来，胶东各县的党组织和人民群众，不断为八路军输送兵员。后来，这就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制度，每打一仗，缴获的武器都要分一些给

地方游击队和民兵，以促进他们的发展。各地民兵、游击队也踊跃参加八路军，整个胶东人民武装便迅速发展起来。

第三营成立之后，昌潍大队暂时也没让他回去，留在军区准备再打一仗。当时，盘踞在平度的国民党保安十八旅陈兵大泽山至旧店一线，经常骚扰我平（度）、招（远）、掖（县）根据地。这个保安司令叫张金铭，自称兼平度县长。他投靠赵保原，参加反共联军，向我八路军发起进攻。

1940年3月7日，以赵保原为首的“抗八联军”向我进攻。我五支队将其打退，并于中旬解决了赵保原的县政府。3月20日我率军区的三个营和昌潍大队，围歼了张金铭驻在北大田的一支小部队，攻占了张金铭的两个后方基地，缴获很多物资。

这一仗打通了大泽山区与我平（度）北根据地的联系，使平度县的小块根据地连成一片，使我们控制了从掖县到平度的整个山区。上述这些战斗规模显然不大，但却密切配合了反对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斗争，在军事上、政治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当时，区党委通过报纸提出了“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口号，用事实揭露顽固派的种种罪恶，并发通电动员广大群众和各人民团体参加各县的临时参议会。5月13日，莱阳县宣布罢免了赵保原的“县长”职务；随即以我党为主组织了抗日的招远（招南）县政府，栖霞（栖霞北）县政府，不久又组成了平度（平北）及文登抗日县政府，极大地推动了人民抗日民主政治运动，扩大了党的影响，推进了胶东抗日

游击战争的发展。

1940年4月下旬，吴克华同志来到胶东任五支队司令员，高锦纯同志改任政委，使胶东部队增添了领导骨干。5月初，五支队率十三团活动在栖霞的观里集一带，又遭到赵保原的袭击。十三团奋起还击，打死打伤赵保原精锐部队数百人，从此赵保原的气焰才暂时有所收敛。

努力抗战 军民抗日力量愈战愈强

1940年夏天，第三军区组编了一个正规团，周光任团长，张环旭任政委，萧平任副团长。周光和萧平都是山纵从一一五师调来的骨干。除一团之外，还有一些军区直属队，如警卫连、骑兵连、机炮连等。这时，军区机关也比较健全了，政委王文同志到职了，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人员也比较齐全了。抗日根据地和政权扩大了，抗日群众运动也大大地发展了。

当年7月，日伪军三四百人从掖县出来到郭家店一带“扫荡”。根据确切消息，敌军必然要经过青山和两目山之间的通道。青山在西，两目山在东，都高四五百米，相距不过两三里。我们把主力埋伏在两目山上。为了防止敌人往青山逃窜，还请五支队一部在青山配合我们。

当敌人进入我们的埋伏圈时，几个营一齐开火，当场打死打伤一些敌人。日军遭到阻击后，立即卧倒在地，然后绕到我们这个高地的西南方，一步一步向高地攻了上来。

由于是梯田形的山坡，便于敌人隐蔽，再加上敌人的迫击炮、掷弹筒，一齐开火，火力很猛，我们的部队吃不住了。为减少伤亡，我命令部队收缩了一下。这时，我在指挥所突然闻到一股奇怪的气味，用望远镜一看，不好，敌人正在利用西南风向我们施放毒气。好在平时训练中讲过，我连忙下令：用水把毛巾浸湿，捂在口和鼻子上，撤出阵地；没有水的撒点尿代替水，不要嫌脏。结果，凡是这样做的，都没有中毒，很快撤出了阵地。

这一仗没有打好，我心里很生气。本来五支队说在青山配合我们一下，一直也没见到他们的动静。我们眼看着敌人退下去，通过去了。当然，作为新成立的一个团，首次打鬼子，给敌人以创伤，我们自己也没有什么伤亡，总算不容易。几位营的领导干部向我汇报作战情况，还谈了许多杀伤日伪军的战绩。不少干部战士还高兴地谈论着自己杀敌的经过。一次并不理想的对日伪军的作战，却激发了干部战士极大的抗战热情。

为了把这种抗战热情变成练兵的实际行动，我把部队集合起来进行了讲评。接着让大家回去讨论，总结经验教训。最后，又把部队拉到青山和两目山之间原来打阻击的地方，搞了一次实地演习。两个连伪装成敌人前进，其余的打埋伏。通过这次演习，把教训变成了经验，提高了部队的实战本领。

随着胶东根据地的扩大和人民武装力量的不断增强，各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弹药的要求更高了。为适应这种情

况，1940年3月，成立了胶东兵工生产委员会，统一领导兵工生产和分配武器弹药。我任委员会的主任，王本贤（解放后曾任上海市交通局局长）任专职副主任，其它委员有五支队参谋长贾若愚，后勤部长高达三，军区参谋长李发，区党委财务处长孙揆一等。

胶东的军工生产在全国的抗日根据地中是比较有名的。早在1938年4月，在黄县圈杨家村就成立了胶东人民抗日武装的第一个兵工厂。1939年秋冬之间，兵工厂迁到一条名叫“老庙后”的大芥里，这里林木茂密，人迹稀少，很利于隐蔽。同年冬季，兵工厂遭到顽固派头目蔡晋康的破坏，又搬到了蓬、黄、栖霞、招四县交界处的根据地。当时，兵工厂驻在前寨、后寨、曹高家、苗家、大蔡家等山村，虽然离敌人据点很近，经常遭到骚扰，但由于我们党的群众基础很好，仍然使军工生产坚持发展下来了。从1940年到1941年，胶东的兵工生产随着武装斗争的胜利和根据地的扩大，更获得进一步发展。老的兵工厂改为兵工一厂，先后又在掖县建立了兵工二厂，在昆嵛山区建立了兵工三厂，在牙山区建立了兵工四厂，在牟平鹃塚山区建立了兵工五厂。生产规模也逐渐扩大，由开始修修补补发展到每月能生产近万枚手榴弹，数千发迫击炮弹以及各种类型的步枪、机关枪、迫击炮和掷弹筒等。这些武器弹药除供给胶东地区的抗日武装外，还运往鲁中南、冀鲁豫、苏豫皖等抗日根据地，供给那里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地方武装。

在坚持胶东兵工生产的斗争中，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动人事迹，许多干部、工人、战士献出了生命。在1940年的“六一大扫荡”中，兵工一厂工人曲德明到后寨侦察敌情，不幸中弹牺牲。1941年5月，兵工四厂一名站岗的工人发现敌人偷袭工厂后，及时鸣枪报警，使绝大多数同志安全转移，自己却壮烈牺牲。在一次冬季反“扫荡”中，兵工一厂警卫队一个排，在连长指导员带领下，为掩护干部、工人的转移英勇战斗，大部分人壮烈牺牲。为了克服材料、设备严重缺乏的困难，兵工厂的干部工人更是千方百计进行艰苦卓绝的努力。兵工一厂总务科副科长王谟同志为搞材料，被敌人抓住活埋在即墨县。为了解决柴油缺乏的困难，大家创造了用花生油发动柴油机的经验。柴油机坏了，一时修不好，干部工人使用人力拉皮带轮，一连坚持二三十天不停产。他们还因陋就简，在山沟里办起一个硫酸厂，自己生产出盐酸、硝酸、硫磺，满足了炸药生产的急需。这个使敌人的化学专家瞠目结舌的消息，不仅鼓舞了根据地人民，而且鼓舞了敌占区人民。手榴弹里的雷管本来是铜片制做的，可我们当时硬是用牛皮纸加胶水制成了雷管。这一件件奇迹，又都是在胶东人民群众的掩护和关怀下取得的。胶东人民群众为发展兵工生产立下了汗马功劳，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可以说，没有胶东人民群众的掩护和支援，胶东的兵工生产是不可能得到如此迅速的发展的。

为了在反“扫荡”中保存和发展兵工厂，胶东军民积

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开始，敌人来“扫荡”了，我们便把兵工厂的机器设备埋起来，等敌人“扫荡”过后再刨出来继续生产。因为有时敌人来得很突然，机器来不及掩埋，结果被敌人破坏了一批。后来，我们又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敌人来得突然时，我们先把厂房炸掉，用厂房把机器掩盖起来。这样就又多保存了一些机器设备。但这个办法也有缺点，就是容易使机器受损坏，恢复生产比较困难。不久，发动群众动脑筋想办法，又找到一个更好的办法。我们把厂房的地下挖空，机器座在木板上坚持生产。敌人来了，立刻把机器“下放”到地下室，然后把厂房一炸，机器可完好无损，敌人也找不到。另外还通过在厂房各处及门窗内设置地雷炸弹的办法，在敌人“扫荡”时保护工厂设备。

1940年9月，山东纵队所属部队在第四期整训中进行了整编。第四期整训计划要求山东纵队一年内主力部队要扩大到54000人，并要大力扩充县、区、乡的游击队武装，实现各主力支队全部正规化。这时，整编后的山东纵队下设一、二、三、五旅（到1941年又成立四旅）和一、四、五支队及独立支队。原来胶东地区的五支队编成第五旅，由吴克华任旅长，高锦纯任政治委员，我们第三军区主力部队编为新的五支队，我兼任五支队司令员，王文同志任政治委员。这次整编之后，胶东的八路军以五旅为主，对日伪军打了两次胜仗：一次是10月15日至24日的上乔、良蒙山战斗，另一次是12月5日至10日的郭家店战役。这两仗打乱了日伪军进行冬季“扫荡”的准备，保卫了平、招、

菜、掖根据地，鼓舞了人民的抗战热情，另一方面，也对正在制造分裂的国民党顽固派和投降派是一个严厉的警告。

1940年日伪冬季“扫荡”过后，国民党顽固派被敌人吓破了胆，他们的大小“司令”们，投降的投降，插枪的插枪，溃逃的溃逃，枪枝弹药扔的到处都是，这就为我军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我东海地委书记于克功同志领导当地农民拿起武器，举行了武装起义。这在历史上叫东海二次起义（第一次起义是指抗日战争初期的天福山起义）。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于得水就在这里领导过一次武装暴动，起义失败后一直坚持游击战争，这里党的基础群众基础一直是好的。东海二次起义不到10天，就编成了1000多人的抗日武装部队。于克功同志任东海军分区司令员。

起义后不久，于克功同志带领的起义队伍接连受到当地顽固派的围攻。为了巩固和扩大东海二次起义的成果，我派张怀忠同志（解放后曾任一机部副部长）率北海独立大队（相当于加强营）从艾虎山区出发，直奔昆嵛山前去支援。两支队伍会师后，并肩作战，力量大大增强了。但是，1941年4月，在林村的一次战斗中，于克功同志不幸壮烈牺牲。为了加强对东海部队的领导，胶东军区决定派北海军分区司令员兼县长孙端夫同志和地委书记梁辑卿同志去东海担任领导职务。他们到那里之后，把起义部队整编一下，正式成立了第三军区的第二团。这个团共2000多人，孙端夫为团长，另派一团副团长肖平去当副团长。这个团

的队伍很整齐，年纪轻，觉悟高，素质好，特别是大多数人还有点文化，每人胸前插一支新钢笔，整整齐齐，一看就叫人喜欢。不久，又从五旅调来了蔡永泉同志来当团政治委员，梁辑卿同志仍任专职东海地委书记。

1941年春，我接到山东军政委员会的一份电报：命令我带一团轻装去东海与二团会合。并指示我：不带军区机关。当时，我们第三军区的指挥机关已经比较健全了，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都是健全的。我当时想，就这么一个团被我一带走，甩下军区机关，一旦有事，机关不好办；再说，到东海开辟根据地，既要打仗，还要做政治工作、地方群众工作、后勤工作，离开了机关也不好开展。于是，我又回电请示山东纵队，建议允许把机关都带上，并表示只要途中组织好就不会发生大的问题。罗荣桓同志很快回电同意了，并让我带去五旅的十四团（团长于得水对东海很熟悉）。

上级是同意了，但真正组织好这支数千人组成的队伍的长途行军可不那么容易。当时沿途一带密布着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我们的任务是以尽快的速度安全地插入东海昆崙山区。这么多的人，除掉要求快速保密之外，很重要的一条就是选择好行军路线。我们几个领导同志经过反复研究，决定宁可靠近日伪军，走北线。因为日伪军多龟缩在大的城镇，中间“空当”比较多，便于我们穿插通过。相反，南线虽然没有日伪军，但国民党顽固派多，他们熟悉环境，岗哨密布，占地为王，容易发现我们。

确定行军路线之后，便开始集结。由于机关、部队都分散在各个村子，我们便在山里曹家、扒头张家、张格庄和山后几个村子把大家集中起来，然后开到艾虎山区的黄城阳开了一个动员大会。记得政治部主任仲曦东和我在广场的台子上进行了动员。第二天我们就出发了。

将近三个团的兵力通过敌占区，只有夜行军最好。傍晚从黄城阳出发，第一夜走了80里，到达福山南部的张格庄一带。第二天白天隐蔽休息，封锁消息。第二天夜里，为了迷惑敌人，我们只走了25里路，在烟台南部的回里一带宿营了。当时我们有两个顾虑，一是怕敌人知道我们的底细，二是怕他们伏击我们。还好，前两天都安全地过去了。第三天夜里，长驱直入，搞了个急行军，一夜走了100多里，直插昆嵛山。在山西南脚下东于瞳一带地区宿了营。

机关和三个团在东海会师之后，那个高兴劲就甭提了。但我们没开会师大会，尽量不惊动周围的敌人，不让敌人知道我们又开过来两个团。

我们到东海之后，五旅的十三团、十五团留在原来的西海大泽山一带。这样，胶东地区我八路军的两大主力部队五旅和五支队，便开始分处东西配合作战。这时胶东军事力量的布局是：北是日伪军，南是国民党土顽，东西都是我八路军，形成了我军东西两处配合作战的战略态势。

严惩顽固派 克服投降内战危机

1941年春，我接到山东分局和纵队指示：命令渤海地区的三旅旅长许世友带一个团于3月底到胶东与五旅会合，并组织胶东军政委员会统一指挥五旅和五支队，为“配合全国克服投降内战危机”，“以反投降的胜利转变胶东局面”，开展一次反投降的战役。当时，皖南事变刚刚发生，国民党顽固派在全国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我们在胶东打几次反对顽固派、投降派的胜仗，就是对全党粉碎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有力的支援。

由于当时胶东的八路军被分割成东西两个部分，所以这场反投降战役是从东西夹击开始的。西线五旅十三团、十五团和清河独立团由许世友、林浩、吴克华同志率领由西往东打；东线五支队一团、二团和五旅十四团由我和王文同志率领由东往西打。

当时在东线我们的目标有三个：一是驻午极的安廷赓，二是驻崖子的苗占魁，三是驻胡八庄的丁绉庭。先打哪个呢？我们决定先打国民党游击第六纵队司令丁绉庭。因为丁绉庭对我们威胁最大。他的兵力有1000多人，号称东海地区的一霸。丁既是地主豪绅，又握有军权，坚持与共产党八路军为敌。安廷赓就差些了，名义上有一个团，其实只有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的一些海军陆战队，不到1000人。苗占魁虽然也号称司令，但只有几百人。

任务定了，怎么打呢？最后决定从胡八庄丁 绎庭司令部所在地动手，他的部队也主要驻守胡八庄。

主攻点确定之后，就是怎么部署兵力的问题。我一再考虑并和王文政委商量：想叫一团主攻，十四团配合，歼敌把握大些。因为十四团一方面是兄弟部队，另一方面这个团不健全，兵员不足，只有 1000 多人。一团是我们亲自组建起来的，战斗经验多，老同志多，兵员充足，让它担任主攻把握性大一些。但是，当我们提出一团担任主攻任务后，二团不同意，团长政委非要把主攻任务夺过去不可。我们也考虑过，二团在东海刚组建，热情高，兵员充足，都是 20 岁左右的小伙子。团长孙端夫是个大学生，很勇敢，政治委员蔡永泉也很精明能干，又是在东海地区作战。只是二团作战经验较少，若担任主攻，多少有点顾虑，但他们热情很高，保证完成任务。最后，我们改变了原来的打算，把主攻任务交给二团，让他们在战斗中锻炼、摔打一下。为了确保无误，我抽掉一团最强的一个营作预备队，万一打不下来，就把这个营拿上去。然后把特务营交一团指挥，补充抽掉的那个营。特务营老跟机关跑，打仗少，这次也想锻炼它一下。

一团的任务是攻打午极安廷赓的部队，同时也是为了防止别的顽军增援丁 绎庭。在发起攻击之前，二团已经三面包围了胡八庄，只给它留下了一个西逃的退路。

战斗在拂晓打响，部队很快攻进了村子，消灭了大部分顽军。跑掉的都到十四团那里“报到”去了。但是，天

亮之后，还有丁 缙庭司令部所在的大院和周围几个碉堡没拿下来。我们一个院子一个院子的争夺，仗打得很残酷，一时很难攻进去。为了早点结束战斗，以免拖到晚上顽军便于逃走和防止外部顽军增援，我派副团长萧平进村子里面去侦察。萧平在敌人封锁线上用一根棍子把衣服挑起来幌几下，顽军便朝“假人”连开几枪，枪刚响过，他乘顽军拉枪栓之机飞身跃过了封锁沟。萧平过去之后，蔡永泉政委也非要下去不可。我拦他没拦住，结果在通过封锁线时负了重伤，后来没有治好伤，牺牲了。

萧平同志侦察完毕回来报告了情况，因为顽军的碉堡封锁很严，白天看来不能结束战斗了。于是我下令：严密围困，原地监视，晚上攻击。

当天晚上，我们用火攻占领了丁 缙庭的司令部，他的老婆孩子和他的父亲全被俘虏了，电台台长也被活捉了，可惜丁 缙庭个人从水沟里只身逃走了。丁的老婆孩子和他的父亲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释放了。结果，在后来的一次战斗中，她们又当了我们的俘虏，还说：“我们知道八路军优待俘虏”。

这一仗共歼丁 缙庭部队 1000 多人，两个团俘虏 800 余人，缴获枪数百支和子弹一批。

胡八庄战斗结束后，我接到情报：3 月 10 日，赵保原为首的胶东大小投降派、顽固派在午极开了反共会议，乘日伪军正在“扫荡”我平、招、莱、掖边区根据地，而我主力在西部反“扫荡”之机，决定以赵保原为总指挥分兵

三路，号称 12000 大军，向我东海地区大举进犯，企图歼灭我东海部队，扼杀东海二次起义的结果。

为了迎头痛击投降派和顽固派的猖狂进攻，我们五支队二团留两个营在昆崙山区的冯家一带消灭残余敌人，宣传群众，组织民主政府，部队主力则集结完毕严阵以待。

在胡八庄战斗中，负责进攻午极的一团没有抓住安廷赓的部队而扑了空，心里很懊悔。这时，我决定派他们去打苗占魁。苗只有七八百人，一团完全可以歼灭他。这时，有情报说进击我昆崙山区的顽固派左路军洪彪部 2000 余人在朱车受到我二团的迎头痛击后，缩回到下雨村。于是，我命一团北上截击。一团以突然的行动北上，和二团一起两路大军合击下雨村，结果洪彪率部队窜逃了。这时，二团一营又攻打冷格庄，活捉了陈煜部三营营长姚金海，收容 80 多名俘虏，缴枪 70 多支，但该部大部逃散了。在冷格庄休整一下之后，又发现牟平县的顽固派司令陈煜正驻扎在观水镇。于是 3 月 18 日命二团一营于当天下午 5 时半一举攻克了观水。陈煜部除少数窜逃外，其余全部被歼灭。这时，西战场许世友、吴克华指挥的五旅和清河独立团已在牙山区攻克了北亭口和桃村，我东西两路大军在桃村一带会师。胶东抗日根据地从此东西连成一片。

打完观水以后，我们在铺西头休整了一下。3 月 20 日，我五支队一团又围歼了驻崖子的顽固派苗占魁。至此全部结束了胶东打通东西战役东部战场的全部战斗。

这时，日伪军除了占领着牟平、烟台、福山、栖霞等

孤立的城镇之外，其余大片农村领土都是我们的根据地，部队活动范围大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司令们有的被歼灭有的逃跑，只有赵保原等少数顽固分子还有些实力保存下来，企图长期与我对抗。

胶东军政委员会开会研究下一步该怎么打。许世友同志主张乘机打赵保原，于是决定消灭赵保原这个冤家。开始，军政委员会也没有预计要打那么大的仗。但是，一经打起来，就由不得自己了。很快形成了骑虎难下，长期僵持，犬牙交错的阵地战局面。这就是后来长达半年之久的榆山会战。尽管对这次会战的战略价值在认识上有分歧，但作为军政委员会的委员、会战的参加者和一名指挥人员，我有责任谈出我所了解的当时的实际情况。

对这一仗到底怎么看？当年在莒县山东分局总结抗战五年经验和延安整风时，都有过分歧意见。现在恐怕也没有完全统一。我认为，在1941年春夏的历史条件下，在胶东的客观环境内，打这样大规模的阵地战，是不符合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原则的。当时党中央也要求我们以集中兵力，速战速决的游击战为主，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缴获武器，发展壮大自己为主。但这一仗，虽然也沉重打击了顽固派，消耗了他们的力量，但我军伤亡和消耗也太大。因此说在战略上我们是有些失策的。当然，如果从积极的方面总结，这一仗的意义和作用也可以讲出许多条来，总之对这一仗的分析应用两分法，两点论。一概肯定或一概否定都是不对的。

参加榆山会战的部队主要有五旅的十三团、十五团和清河独立团，五支队的一团、二团，共5个主力团。这一仗实际上是和赵保原决战。

4月2日，我一团占领榆山。4月4日又战领了吉格庄以南的阵地。我五支队司令部和二团集结在下劳泊、泉水头一带，控制和监视万第的敌人。五旅十四团占领仓山后，也向吉格庄方向进逼，对吉格庄形成了包围之势。4月4日上午9时，吉格庄守敌700余人分三路向我一团阵地进攻，当即被我击溃，便缩了回去。5日，赵保原从发城派主力500余人于早晨6时窜到吉格庄来为守卫在那里的郑维屏、赵汉卿及海阳保安团助战。10点钟，在吉格庄集中的2000余人开始分路向我占领的周围高地进攻，都被我一打退了。这时，海阳保安团见势不妙，乘机逃离了吉格庄。赵保原的助战队也逃回了发城。

吉格庄粮草断绝，内部恐慌。4月20日，赵保原又派其黄团和二十七支队刘景川部共2000余人由发城出发向吉格庄强送给养。走到槐树底，与十三团接触，打得异常激烈。这时，我五支队二团迅速从敌人左翼迂回过去，夹击敌人，刘景川的二十七支队全部被歼灭，黄团也受挫惊恐而逃。

吉格庄的敌人被我们围困了20多天，想出不出来，赵保原几次增援又进不去，因此非常恐慌。赵保原本人也象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团团转。为了挽救其失败的命运，便乞求国民党五十一军于学忠部支援，此外来增援的还有伪

军、顽固派张步云、厉文礼。于学忠当时是国民党鲁苏战区总司令，曾经是张学良的部下。我们从延安来的时候，曾携带毛主席写给石友三、于学忠的亲笔信，希望他们同我们共同抗战。4月下旬，五十一军一个营（号称一个团）由鲁南到达万第，张步云、厉文礼也派兵来为赵保原助战。4月27日，赵保原的主力加上秦毓堂部1000多人，共4000多兵力，分3路向榆山我军阵地进犯。我军以清河独立团两个营分别固守榆山山脚下顾家乔和神家乔一带的阵地。然后将五旅十三团、五支队一团、五支队二团二营作为出击部队，二团的一营、三营分别防守榆山、仓山一带阵地，继续严密包围吉格庄。

赵保原的4000人从万第到了泉水头，便分成3路前进。中路有赵的主力 and 五十一军的1个营，还有张步云的2000余人。拂晓，开始向我顾家乔南山区阵地猛攻，激战一个小时，我军撤退到神家乔一带固守，敌人几次强攻，我都紧守阵地。右路军有秦毓堂1000人，由拴马岛向我进攻。中午12时，左路敌军占领了七寨南山，企图继续向我进攻，但犹豫不前。左路赵保原的一部分人配合曹支队进犯我榆山乔一带阵地，结果被我卧龙南山阵地和榆山阵地守军击退。下午2时，我军组织全线反击。二团一营以闪电式的动作，将右路军秦毓堂部击溃。二团二营配合独立团将进攻神家乔一带阵地的敌人也击退了。同时，十三团两个营由东格庄出击，除将小于山的敌人击退外，还歼灭了中路一部分敌人。十三团二营和二团二营由卧龙村出击，打退

了敌人的左路军。到下午 5 时，敌人全线溃退。

5 月 1 日晨 6 时，赵保原再次组织 3000 人马向我榆山以北的阵地进犯。我军用五支队的一团、二团固守榆山一带阵地，并负责包围吉格庄。五旅全部集结在晶山一线。上午，敌人的进攻没有奏效，中午继续猛攻。下午 3 时，我军组织了全线反击。一团由槐树底向北猛打，双方当即展开激战。我攻过去，敌攻过来，反复冲杀，胜败难分。二团二营由榆山南向顽军方向迂回，旋即把进犯卧龙村以南阵地的顽军击退，并继续进攻赤山，驱逐顽军，直逼吉格庄。这样，就对顽军的侧背槐树底的西北山造成很大威胁，迫使顽军全线撤退。战斗到晚 8 时半结束。在这次激烈的战斗中，赵保原的邓团团长的被击毙，吉格庄的困守之敌几次企图逃窜，都被我二团守军击退。

我军与赵保原的顽军已经在吉格庄和榆山一带阵地对峙了很长时间。为了尽快结束战役，许世友提出：由我指挥以五支队两个团坚守榆山吉格庄一带阵地，继续与敌人对峙；他与林浩和吴克华带领五旅两个团和清河独立团撤出阵地，经两夜急行军，用 3 个团的兵力突袭赵保原的后方基地——发城。这是比较危险的一着棋。如果当夜 3 个团撤出后，第二天拂晓顽军向我进攻，我们五支队两个团是很难坚守阵地的。为了预防万一，我和许世友订立了联络信号：如果第二天拂晓顽军进攻，我们即在山顶上放一堆火。在我们 3 个团抽走的第二天拂晓，果然赵保原纠集一万余人的兵力向我反攻过来。我们按预定的计划在山头

点火，许世友、吴克华立即将十五团调了回来。

这天的战斗打得很激烈。在各个村子里，顽我之间，你咬住我，我围住你，犬牙交错，层层包抄，内线外线都搅到一起了。十五团返回来之后，我把它放在北铺后和南铺后，争夺槐树底的120高地。记得是上午他们团一赶到，没有休息，我就把团长梁海波、政委李丙令找来交待了一下任务，接着把部队动员了一下就开上去了。这个团是个老团，有战斗经验，结果一下子就打上去了。140·3高地、100高地，都被我夺过来了。当时我们从望远镜上看到，象电影一样，一幕一幕，短兵相接，战士用手榴弹刺刀展开肉搏战，打得很激烈。敌人的兵力将近10000人。赵保原不仅得到了于学忠的增援，而且把胶东地区国民党的一切顽固势力都集结起来了。这是赵保原有计划、有组织的一次大的反攻。十五团打上去之后，由于兵力太悬殊，敌人又反攻过来，把这些高地、村庄占领了。接着，我们又组织第二次反攻。当时，十六团、十七团都守在阵地上不能动，因为在吉格庄你抱着我，我咬着你，互相都脱不开身。第二次反击，我们又攻上去了。两次反攻每次用的时间都不长，也就是一个小时左右。但是第二次攻上去之后，又一次被敌人反攻下来了。这时，我考虑顽我力量悬殊太大，不能硬攻了。于是，我命令十五团原地构筑工事，坚守已占阵地，连吃饭都由炊事班送到阵地上。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稳住敌人，准备夜里打。因为敌人的士兵许多都是抓壮丁抓来的，从内心里不愿为反动派卖命，最怕打夜战。当

时，我最大的顾虑是顽军抢修碉堡。因为我们还没有打碉堡的武器。当我从望远镜里看到顽军在最北面的120高地开始修碉堡时，便命令部队向这个地方组织扫射，顽军也就不敢继续修了。当天晚上十五团第三次反攻，将顽军全部打退，收复了榆山以北阵地。

就在这个时候，我疲劳得支持不住了，我对王文政委讲，你看一会电话吧，我实在需要“迷糊”一会儿。话刚说完，就手扶电话机睡着了。实际上就睡了几分钟。与敌人短兵相接的交手仗我也打过不少，可从来没有象这次这么紧张和疲劳。

为了歼灭吉格庄吃反共磨擦饭的投降派，我们后来又采取了以碉堡对碉堡的战斗，步步紧逼，向村沿压缩。由于不断挖地道、战壕，修筑工事，双方的前沿阵地相隔很近，甚至可以互相交谈。在战斗间隙，我们的干部、战士对顽军开展了政治攻势，喊口号，唱歌，喊话，用事实揭露其头目投降日寇的罪行，对他们的士兵进行宣传教育。有的还给顽军士兵送纸烟，送馒头，对他们进行感化教育，瓦解和削弱顽军的斗志。当时的政治工作很有效果，顽军开小差或到我方来的投诚者时有发生。

许世友、林浩、吴克华同志率领两个团到发城一打，这等于在赵保原的后院里点了一把火。后来形势急转直下，吉格庄的顽军溃逃，赤山被我军占领。至7月27日，我军又解放了发城。到此，榆山会战宣告结束。这长达五个月的战役，在胶东历史上叫“五个月反投降”。

勇敢作战 坚持反“扫荡”斗争

榆山会战结束不久，我们的司令部移驻胶东海阳县的战场坡。1941年11月7日，在崖子以东地区为纪念十月社会主义革命24周年，我们五支队举行了一次阅兵式。参加部队有五支队的三个团、军区直属部队和附近地区的民兵约万余人，在敌后能举行这样规模的阅兵式是很可观的。

榆山会战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力量，同时也暴露了我军实力，给日伪军以很大的震动。因而1941年冬季日伪军的“扫荡”来得特别早。这次“扫荡”是先从鲁南开始的。为了配合鲁南的反“扫荡”，10月份我们五支队在胶东地区主动出击，对日伪军打了几个胜仗，前后共拔掉10个日伪军据点。开始，我们把攻击地点定在张梦、于家和朱村，直接的目的是为了扩大根据地，建设政权，牵制敌人的力量，配合反“扫荡”。但是，当战斗命令下达后，又发现日本鬼子在牟平以南和南海之间的任士桥修了一个据点，于是又决定先打任士桥。

记得正是1941年中秋节的晚上，任士桥的鬼子和伪军都喝了酒，醉醺醺的，正睡大觉。我们过节也多少喝了点酒，但不影响作战。一团二营担负了攻击这个据点的任务。他们从东往西打，恰巧碰上了个敌人，抓了个“舌头”，弄清了当夜的口令是“攻击”。巧极了，那一天夜里我们的口令也是“攻击”。结果一下子我们的那个营全攻上去了。只

几个小时，便结束了战斗。这一仗俘虏了七八十个敌人，缴获了几十枝枪，打死了为数很少的几个伪军、汉奸。大概是因为新修的据点的缘故，一挺机关枪也没有缴获。

这一仗打得很干脆。总结时大家说有“三巧”：第一恰巧是中秋节，第二恰巧都喝了酒，第三碰巧口令都一样。这就是巧取任士桥。打完这一仗，参战部队发来电报汇报情况，我和王文同志都很高兴，立即回电表扬，并要他们乘胜前进，完成进攻张梦、于家和朱村的任务。这时的分工是：张怀忠带三团两个营打张梦，车学藻带一团一营 5 个半连打朱村，黄振东带 4 个排打于家。张梦有鬼子的陆战队，力量比较强，难打一些，我又把警卫连 100 多人调去，另配有 3 挺机枪，协助张怀忠打张梦。

结果，车学藻先打朱村，用 3 个小时结束战斗。俘敌五六十人和枪支弹药一批。黄振东那里也打下来了，但打得比较残酷。我方伤 30 人，敌人伤亡四五十人。打扫战场时，把敌人的伤兵都从炮楼上背下来了。那时卫生队条件又差，在这次战斗中卫生队长也受了伤，共七八十个伤号，可把他们忙坏了。抬担架时，还抬了两个装死的鬼子。张怀忠打张梦遇到挫折，又派田时兴率一个连去支援他。结果，发现张梦的敌人夜里突围逃跑了。在追击中只抓了不到 20 人，其余全跑掉了。张怀忠带部队打进去，缴获不少敌人逃跑时不能带的弹药和物资。接着，我们又打了宋村北、大水泊、成下 3 个日伪据点。

这时，有人反映老母猪河边上有个回龙山据点，是日

本鬼子在这一带的重要据点之一，对我军的安全威胁也比较大；应该把它拔掉。我打电报给一团二团，和他们商量看能不能打回龙山？两个团劲都挺足，果然一下子拿下来了。因为我不在前线，具体打法记不得了。电报回来后，我和王文政委高兴得不得了，一方面回电表扬他们，一方面向上级报告，为他们请功。

在这期间，我们五支队一共拿下敌人 10 个据点，狠狠打击了日伪军，有力地配合了反“扫荡”。山东纵队曾两次电令嘉奖参战部队，特别是对打回龙山和任士桥的评价很高。电报精神传达到部队，大家欢欣鼓舞。打完仗，部队凯旋归来，我和王文政委到五里路外迎接他们。在庆功大会上，对各团有功人员都进行嘉奖，特别表彰了十六团。

1942 年的反“扫荡”

榆山战役之后，清河独立团打得只剩下 1500 人左右，我们五支队那两个团每团也打得只剩下 1700 人左右。这时，五支队一团、二团、三团正式改称十六团、十七团、十八团。当时，五支队也拟改为山东纵队第六旅，因中央提出精兵简政而作罢。不久，清河独立团也返回渤海。

其后，为落实党中央提出的精兵简政，以及主力部队地方化的政策，我们把主力部队分散开来，坚持斗争，保存实力，保存干部。1941 年和 1942 年敌人“扫荡”非常残酷。渤海地区最后连一个连都不能集体活动。只能十个八

个人一起活动。有时，一晚上需要更换两个地方宿营。但胶东地区还好些，成团的部队还可以分散开活动。

1942年6月份，中央批准成立胶东军区：许世友为司令员，林浩为政治委员，我为副司令员，彭嘉庆为政治部主任。这时，五旅归胶东军区建制，吴克华为旅长，高锦纯为政委，赵一平为参谋长，欧阳文为政治部主任。我们五支队仍属胶东军区。

为了对付1942年的日寇“扫荡”，我们当时分了一下工：五旅到大泽地区，活动在西海一带；许世友、林浩带军区机关在牙山、桃村一带；我带一个主力营掩护区党委机关，活动在东海一带。我临时组织了几个参谋，没要其他机关人员，想在乳山口一带坚持斗争。胶东区党委的部长、副部长们都在我那里。

有关1942年胶东区反“扫荡”的回忆已经不少了。小说《苦菜花》写的就有许多情节是真实的。实际上，这次“扫荡”中，受损失最大的还是我们五支队的十六团。当时，十六团正处在敌人“扫荡”的重点地带，马石山是敌人搞所谓“铁臂合围”的地区。团长周光率领部队多次身陷重围，政委张怀虚不幸牺牲。记得当时有人向我汇报：日军追赶八路军和人民群众，有的妇女抱着小孩子跑，加上又是爬山，实在爬不动了，为休息一会儿就把小孩子包扎起来，挂在树上象个摇篮。日本鬼子竟惨无人道地把孩子当活靶子打。马石山被包围之后，敌人从周围搜捕收缩，最后把几千名干部、战士、民兵、群众合围到马石山上。当

时敌人给它起了个名字叫“拉网扫荡”，据说是从冀中学来的。白天包抄前进，逐步缩小包围圈，晚上点起火堆，几十米远一堆火，派人值勤，不准有人从包围圈中逃出来。最后被包围到马石山的，就有我们十六团的一部分部队。周光团长率领部队突围到午极与乳山县之间，集中兵力，先将包围圈的火堆打灭，结果大部分都突围出去了。只有一个排没突出来，在马石山浴血奋战，最后弹尽粮绝，全部壮烈牺牲。

我率领的一个营掩护区党委机关也遇到许多麻烦。开始，区党委的同志们告诉我，海阳所一带我党的工作做得很好，渔民群众基础也比较牢靠。当时“扫荡”还未开始，为了了解当地渔民的组织情况，他们建议我们从海上过去，先去海阳所半岛，那个营的部队和机关则从陆地上绕道过去，然后我们再到海阳所以北乳山附近会合。这样，我就只带了一个警卫班和区党委的几个部长们乘船渡过乳山口，来到了海阳所半岛，住在岛南部最大的一个村子——姜格庄。当天夜里，我们找地方党的同志汇报了解情况，一直到深夜。汇报完毕，我们准备连夜出发北上找部队。当时，我的身体很不好，本来渔民想用船送我们北上。但这时突然听到海面上马达声响，敌人的军舰把我们半岛包围了。我们赶快从陆上走。天黑的伸手不见五指，冷风飕飕，深一脚，浅一脚。走了一会儿，我实在走不动了，怎么办呢？那时又没有马。最后我们商量，决定休息一下，明天拂晓再走。第二天天还没亮，敌人就从海阳所登陆了。这

下子可严重了：敌人提前“扫荡”，把我们和掩护的部队分割开来了。日军海陆空部队从海阳所登陆后，把半岛的“瓶口”部分卡死了。外边是军舰，内海是汽艇，乳山口通往陆地的水面也被封锁了。敌人的飞机在这个小半岛上反复侦察。这么个四五里宽、二十里长的小半岛，敌人搜索了整整一天。

这一天，我们的脑袋好象比平时膨胀了很多，绞尽脑汁，考虑问题。动员每个同志都做了最坏的打算。我向全体干部讲：能突围的要突围出去，不能突围的要在子弹打完之前留一颗给自己。我们的办法是和群众混在一起，不在万不得已时谁也不准开枪。这样我们和老百姓一起埋伏到了姜格庄西南的一座小山上。山上都是松树。地图上这个地方叫“葛子岭高地”。这一带梯田丘陵也很多。我们一些伤病员就藏在梯田下面的山洞里。敌人连这些山洞都不放过。我亲眼看到他们用探针进行刺探。

敌人挖空心思进行搜索。一个个村子，一间间房子，一块块梯田都不放过。由于搜索的很细，速度自然就不会太快。当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敌人正好搜索到我们埋伏的半山腰。当时我给警卫班的具体命令是：随时把手枪、步枪、机关枪、手榴弹准备好，待敌人靠近我们100米左右，实在不能再隐蔽时，听我的命令，一阵激战，能突出去几个算几个。搜索的敌人离我们只有200多米了。周围鸦雀无声。敌人都在我军火力有效射程之内。大家早已做好了拼搏的准备，焦急地等待我的命令。但是，就在准备开火

而又没有下命令的时候，敌军的旗舰突然在杜家岛发出了信号（火堆），敌人开始往下撤了。北部的敌人也开始向南靠拢，企图登船。这样，在左边的一个山沟内便留下了一个空隙，那里的敌人早撤走了。于是，我下令：分散行动，个别突围，一个个转移出去，到指定地点集合。开头，我先一个人由葛子岭来到莱山，没情况，我便招手让大家向这里靠拢。于是大家一个个地转移出了敌人的包围圈。这时已是薄暮时分，我们从莱山出去，往那个大村子转移。最后，那挺机枪还是被敌人发现了。因为当时天还没完全黑，敌人还只当我们是老百姓呢。发现有机枪，可不得了啦，紧跟着追了过来。我们连忙进了村子，敌人又来村子里搜捕。我们跑出村子，敌人又从屁股后头追出村来。但这时已是夜幕沉沉，敌人在夜里也怕挨打，不敢轻举妄动。我们便连夜北上找部队去了。当天夜里，在马庄附近的无极山南部，我们和警卫营会师了。

会师后，我得到了十六团的消息：周光团长率全团突围出来了，政委张怀虚牺牲了。敌人由西南向东部合围、“扫荡”。但我没见到周光的十六团过来，便用电报布置了一下任务。当时的情况很紧急。我考虑在大批敌人合围马石山的情况下，我们不能西去，于是决定再往东走一段路。第二天我们东进跨过了老母猪河，住在靠东岸的村子，可能是草埠。这时，得到情报说：2000多名基干民兵被敌人自西往东平推过来了。民兵坚持不住，转移到这里来了。于是，我布置部队要收容这批民兵。连民兵带老百姓，共2000

多人，原地住下，动员大家和我们一起返回去。我说不能再往东走了，东面是大海。在天还没黑之前，我们吃完饭，准备往回突围。这时，又有消息传来，老母猪河全部被敌人封锁了。这条河是由北向南流的。西岸被敌人全部占领了，从南海边到北部的河上游，二三十米就有一堆火，火堆处派兵把守，防止我军往西突围。

怎么办呢？只有薄暮时出发过河向敌封锁线之后突围，不然天亮后会被敌人合围歼灭。怎么突围呢？我先向干部做动员，把马全部扔掉，当时区党委的部长们全有马，我的一条很好的警犬也杀掉了。最后只剩下我骑的一匹马。我动员部队脱掉棉裤，蹚水过河。好在河水不深，最深齐腰，过河后穿上棉裤，也不冷。为了越过敌人的封锁线，我们没有采用打灭火堆的老办法，而是明目张胆地在两个火堆之间突围。因为我们事前进行了一些侦察。民兵和老百姓走的比较慢，过封锁线的时间比较长，但并没有引起敌人的注意。也因为有的火堆旁并没有敌人，只是虚张声势，吓唬人的。而且，伪军内也有同情我们的。记得我们有的队伍通过封锁线时，被伪军哨兵发现后不仅不鸣枪报警，反而说：“慢一点，慢一点，不要慌，不然你们过不去”。看来，封锁这条河的前边是伪军，后面才是日军。我们过了河，穿上棉裤插敌人的空隙，突出去，往西南走了40里，到了乳山口，部队才停止前进，原地休息一下。这时，到村里找老百姓了解情况，发现前面两个村子约住有2000名日军。这下子又紧张起来，我命令部队再检查一遍水壶、缸

子、枪支，把衣服扎好，马蹄子捆上棉花，采取侧敌行军的办法，在月明的夜里，从两村子之间插过去。我们静静地行军插过去之后，还蹚过一条小河，水到膝下。过了河，又走了 50 余里，天就大亮了。这一夜，我们足足走了 120 里。敌情严重，心情紧张，当时也顾不得累了。到了天亮宿营时，才感到精疲力尽。后来，敌人在老母猪河以东的“扫荡”扑了个空。

1942 年冬季，敌人对胶东的“扫荡”极端残酷，军民伤亡约千余人，破坏惨重。但以后直至日军投降，敌人再未出动。

1943 年 3 月，我绕道渤海去鲁中出席山东分局会议，总结五年抗日战争经验。会后，又奉命去延安整风学习。经过半年的艰苦行军，通过许多封锁线和铁路，从冀鲁豫边区、太行山、晋西北于 1943 年的除夕晚上到达延安。直到 1946 年 2 月才再次返回胶东军区。人民解放战争爆发后，我又在这里组织和指挥了十三纵队，即后来的三十一军。

（于庆田整理 责任编辑 汪新）

随毛主席重上井冈山日记

(1965年5月21日至30日)

汪东兴

编者按：汪东兴同志的《随毛主席重上井冈山日记》，如实地记叙了毛泽东1965年5月下旬重上井冈山对往事的回忆，对我们学习、研究中国革命斗争史，特别是研究井冈山时期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对继承、弘扬我们党的优良革命传统和作风，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日记发表时，编者对史实进行了核实、订正和必要的注释，个别地方作了一些删节。

5月21日

晴

酝酿已久的毛主席重上井冈山之行，今天终于开始了。

上午11点毛主席在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及其夫人和省公安厅厅长李强、副厅长高文礼的陪同下，从长沙市陈山招待所乘汽车前往火车站。毛主席的专列于12时50分

到达株洲。接着由株洲改乘苏制吉姆牌汽车，经醴陵、攸县，于下午7时许到达茶陵。稍事休息，吃过晚饭，然后安排毛主席在茶陵县委办公室里住了一夜。我们在办公室安置了一张床和日常简要的用具。为了不给当地增加麻烦，毛主席生活所需的物品，如窗帘、被褥、床及便桶等，都是我们事先按照毛主席的生活习惯自己带来的。

5月22日

晴转雨

毛主席来到茶陵的消息不胫而走。一早，茶陵县委书记等领导同志就找到我说：“毛主席来茶陵您应该事先告诉我们，我们好作安排。”

我说：“怕惊动群众和干扰你们的工作。我们这次是路过茶陵去井冈山的。”

县委书记说：“我的房子可以让给毛主席住。让毛主席住在办公室里，我们心中十分不安。”

我说：“住办公室也蛮好，主席睡惯了自己的床。我们按照毛主席的基本生活需要和习惯带来了一些用品，不麻烦你们了。我代表主席谢谢你们，请你们放心。”

县委领导同志心切地要求见毛主席。我向毛主席汇报后，毛主席高兴地说：“当然要见嘛！路过一次茶陵也不易呀。三十八年前路过茶陵时很狼狈。那时我们秋收起义的队伍一部分被敌人追赶着，一部分被敌人阻截着，到茶陵吃、住都很困难。这一次来可完全不一样了！”

毛主席喝了一口龙井茶，点燃一支烟高兴地说：“你先安排好，待我饭后就接见他们。”

早饭后，毛主席接见了茶陵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全体成员。张平化夫妇、李强、我和徐业夫陪同接见，并与他们合影留念。照完像后，毛主席对大家说：“这次我们就不能多谈了，要赶路，谢谢大家。”

茶陵的同志看到主席这样精神焕发，兴高采烈，自己的愿望又得到了满足，都使劲地鼓掌欢笑，目送主席上了汽车。

毛主席乘汽车由茶陵向江西方向进发。经莲花县，到达永新县。在永新县县委招待所休息，吃午饭。饭后会见了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刘俊秀、副省长王卓超和永新县县委领导同志。张平化同志和我陪同毛主席接见并与他们合影留念。

会见时，永新县委领导同志问主席午饭吃得怎样？毛主席笑着说：“这顿饭又吃到当年在永新吃过的新鲜腊肉、鸡、鱼、青菜，味道都不错，比当年吃得更香，而且是从从容容吃的！”

随即，又乘汽车由永新县向宁冈县井冈山方向开去。天黑之前就到了井冈山山腰处茅坪的八角楼。这里是毛主席当年工作和住过的地方。根据主席的意思，我们一行人没有下车，坐在车上围绕八角楼转了一圈。毛主席非常专注地看着八角楼，引起他无限的回忆。

由此不远即到达黄洋界。车刚一停，主席就下车快步

走向山顶。毛主席满怀豪情地指着黄洋界周围的山峰叠嶂对我们说：“这就是黄洋界！当年我们就是利用黄洋界的险要地形，经过和敌人的几次较量，把敌人赶下了山。那时为了减少伤亡，保存自己，我们在这里构筑了一些工事，给敌人很大打击。”接着主席说：“东兴同志，你去那边看看，还有没有当年工事的痕迹？”我按主席指示的方向去查看了附近的地形，回到主席身边向主席汇报说：“主席，有几个地方还依稀可以看出有当年构筑的壕沟式工事在。”

我们同毛主席一起站在海拔 1300 米高的黄洋界上，环视着黄洋界巍峨险要的地势，深为毛主席等老一辈革命家当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而敬佩。

毛主席和张平化夫妇在黄洋界上合影。然后我们驱车到茨坪宾馆。

在宾馆刚坐下来，稍事休息时，毛主席风趣地说：“这可和当年大不一样了！那时敌人前堵后追，我们靠两条腿拼命走。这一千多里路走了半个多月。这次坐汽车两天就到井冈山，还是机械化快！”

5 月 23 日

小雨转晴

茨坪宾馆刚盖好不久，坐落在青松翠竹之中。毛主席住在宾馆一层，我们住在三层。

午饭后我去看主席。主席已起床，看上去精神很好。

我问主席：“休息得怎么样？”

主席说：“可以。休息得还好。这里现在的气候适宜，不冷不热。你们休息得怎样？”

我说：“休息得很好！”

主席说：“请你办两件事。第一，拟一个电报给中央、周总理，告诉他们我已安全抵达井冈山，请他们放心。这里山高路远，如没有急事暂不要送文件来。第二，安排工作人员和专列上的工作人员，还有湖南来的同志分批参观一下井冈山。最好请当地熟悉情况的同志帮忙介绍一下情况，让年轻人增加些历史知识。你抽时间去参观一下井冈山博物馆，回来向我讲讲展览室的情况。”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我拟好了发给中央及周总理的电报稿，经主席审批后发出。

5月24日

晴

今天有关同志分批参观井冈山。有的同志去五大哨口、黄洋界参观，有的同志去井冈山烈士纪念碑、井冈山博物馆参观。

我去井冈山博物馆参观。

井冈山博物馆座落在茨坪西面，离我们住处茨坪宾馆仅一华里。博物馆里分五个展览厅。展示了从毛主席上井冈山开始，经过艰苦的斗争，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终于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历程。展览馆收集了大量

的当年红军用过的实物，集中体现了毛主席等革命前辈在井冈山为中国革命做出的巨大贡献，对我的启发教育很大。

看完整个展览，我还有一些感觉。如有些展览品的处理比较零乱；有的地方文字说明不够清楚；有的历史事实介绍得不够完整……尤其是对当年井冈山红军的来历及组成情况没有说清楚；井冈山红色政权的建立经过有介绍，但组织机构等情况与毛主席著作上讲法不一致。这些问题在我脑子里环绕着。

我参观回来后，和张平化、刘俊秀等同志一起吃饭时讨论过上述问题，他们亦有同感。

饭后不久，主席出来散步。我一边陪主席散步，一边向主席汇报了我今天参观井冈山博物馆的情况，将一直环绕在脑子里的问题向主席提了出来。

我问主席：“当年井冈山的红军是由哪几支部队组成的？”

毛主席说：“当年井冈山的红军由四支部队组成。一支是我率领的秋收暴动起义的部队。这支部队在三湾改编成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在井冈山时期被编为第三十一团。实际上只有两个营一个连的兵力，在永新、宁冈两县交界处驻扎。

“第二支部队是井冈山上原来有的两支小的农民地方武装。这两支小部队分别由袁文才、王佐领导。经过我们派人上山做工作；他们同意我们上山，并接受改编，但有

一个条件即保留原来的建制，保留他们一定的独立性。这两支小部队后来改编成为三十二团，袁文才当团长，王佐当副团长，何长工被派去当党代表。

“第三支部队是八一南昌起义的部队。这次起义打响了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反革命武装的第一枪。在部队向广东潮州汕头进军时遭到失败，由朱德、陈毅率领的一部分部队退出广东，经闽、赣边转入湖南南部和湘南农军会合，并派人和我联系。当得知他们要上井冈山来的消息后，我曾带一个团到湖南桂东地区去接他们。结果由于当时联络困难，没有接到，只接到由萧克带领的一支小部队。我们回到井冈山后又听到有消息说朱德、陈毅已提前到达酃县与攸县交界的地方。我又再次下山去接他们，与朱德、陈毅的部队在湖南酃县会见。这样由朱德、陈毅率领的部队于1928年4月到达井冈山。这几支部队于5月4日在井冈山会师后组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随后改称为红军第四军）。

“1928年12月由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的红五军也来到永新、莲花、宁冈一带与我们会合。这样，井冈山的四支部队对外称红四军、红五军。山上的人多了，吃、住都有困难，人员来自不同成分组成的四支部队，红军内部的矛盾也多了。但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三大民主，经过商讨，问题和矛盾都能不断得到解决。

“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开始离开井冈山，先后到赣南、闽西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在福建西部的龙岩、永

定、上杭等县建立了革命政权。以后又扩大到江西瑞金县。这样，中国大地上有了一大块革命根据地，革命的形势进入一个高潮。

“由彭德怀领导的红五军和由王佐率领的三十二团守备井冈山，坚持斗争。”

毛主席兴致勃勃，一口气讲了当年井冈山红军的来历与组成的情况，使我对井冈山红军的历史，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历史，中国革命早期革命斗争历史有了新的更深的了解。

5月25日

小雨转晴

今天井冈山下着小雨。雨雾环绕群山，一眼望去，感到景色格外秀丽、迷人、清新和舒适。上午主席休息得很好。中午一时左右，主席派人通知我，说今天下午要见我们，要我通知张平化、刘俊秀同志，下午二时许到主席住地去。

下午二时许，我们三人准时到达主席住处的会客室。主席听到我们到来，满面笑容出来和我们一一打招呼。

毛主席说：“这几天你们在井冈山观感如何啊？张平化是酃县人，俊秀是永新人，东兴是赣东北弋阳人。你们到井冈山的机会比我多，情况比我了解。我是三十八年前来过的，现在的井冈山和过去是大不一样了，你们是不是也觉得大不一样了？”

张平化同志说：“我虽然是本地区人，但解放后我只来过一次，对井冈山现在的情况也不是很熟悉。”

我说：“我在江西工作期间，到井冈山来过两次。”

刘俊秀同志说：“我一直在江西工作，到井冈山来的机会比较多。”

毛主席说：“这次你们陪我一起来井冈山印象如何呀？”

我们说：这次能陪同毛主席来井冈山参观学习，感到特别高兴，也是我们一生难遇的机会。过去我们读主席写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因为没有实际感受，领会不深。通过这次跟随毛主席来井冈山实地看看，对井冈山的地形、地理位置，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当年井冈山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有了较深入的了解，加深了对党史、革命历史的认识。今天的井冈山变化很大，和过去比是确实不大一样了。

毛主席听后深情地说：“我离开井冈山已经三十八年了。这次旧地重游，回忆起三十八年前的这段历史，心情总是非常激动的。为了创建这块革命根据地，不少革命先烈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我早想回井冈山看看，一别就是三十八年啊！我的心情和你们一样高兴、激动。没有过去井冈山艰难的奋斗，就不可能有今天了。”

毛主席激动不已，继续对我们说：“什么事情都是开头难。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制造反革命事变，宣布反共。5月21日，发生‘马日事变’，反动军阀许克祥在

长沙围攻省工人会、省农协会，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7月15日，汪精卫又在武汉发动了反革命事变。中国革命遇到了巨大的挫折。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我才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后来瞿秋白他们在湖南弄到了一个小册子，里面有我说的‘枪杆子里面可以出政权’的话。他们大为恼火，认为‘枪杆子里面怎么能出政权呢？于是就把我的政治局候补委员给撤了，以后又说中央委员也要撤了。这件事不知怎么传到井冈山，说是把我的党籍也开除了。这样一来井冈山人也火了，不服气，为我打抱不平，要向中央写报告恢复我的党籍和名誉。我劝他们不要写了，开除就开除了，有啥子要紧？他们真开除了我的党籍，我还是要干共产党的。井冈山人听了我的话，很认真地说：‘开除了你的党籍，你就不能当党代表了，但师长总还是可以当得吧。’”

毛主席说到这里笑着对我们说：“你们说井冈山人对我好不好啊？”

毛主席思潮澎湃，继续说：“1927年9月份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队伍有原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指原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编者注），平江、浏阳的农军和安源的工人武装。在修水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卢德铭任总指挥，我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

“当时秋收起义的目标是攻打长沙。我们分别从修水、铜鼓、安源等地向长沙发起进攻。一团取道长寿街，三团

主攻东门市，准备在浏阳与北上的二团会合。结果在围攻战中，原来收编的旧白军残部（指起义前夕，收编的流落在鄂南一带的黔军残部邱国轩团——编者注）叛变；加上敌众我寡，我军又没有充分发动群众，攻打长沙的军事行动就告吹了。

“秋收起义的部队于1927年10月转战至永新、宁冈两县交界的三湾村。战斗中我观察到这支队伍在战斗中有不听指挥、纪律松懈、不会做群众工作的现象。有的人还有旧军队的不良习气，乱拿群众的东西；有的人有农民意识，爱占小便宜。另外，还有官兵关系不平等、缺乏民主空气等问题。我提议部队在此整编，把原来的四个团改为一个团，实际当时只剩下两个营，七个连，不足千人。对于那些对革命灰心丧气、摇摆不定的旧军官，根据整编原则，愿者留，不愿留者发给路费让其回家。这样，愿意留在革命队伍的都是经过战斗和过惯艰苦生活的，政治上坚定的贫苦出身的工人、农民以及革命军人。人虽然少了，但却精干得多了。”

毛主席喝了一口水，不间断地说：“为了加强共产党对部队的领导，首先开始在部队中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做到班有党员，连有支部，营团有党委；在连以上各级都设立党代表，从此这支部队完全处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

“为了革除旧军队的不良制度和习气，我们提出建立新型的带兵方法。实行政治上官兵平等，进行民主建军，成立了士兵委员会。赋予士兵委员会很高的权力，军官要受

士兵委员会的监督，做错了事要受士兵委员会的批评甚至制裁。整编前，官兵生活待遇相差悬殊。整编后，改成官兵完全一致，军官和士兵吃一样的饭菜，穿一样的衣服，很快使官兵的关系密切起来。部队在三湾完成整编后，我开始考虑上井冈山的问题。

“井冈山位于罗霄山脉中段，与广东、湖北、江西、湖南交界。周围五百里全是峭壁山崖，古木参天。只有五条山洪冲成的小道通向山顶，地势险要，易守难攻。

“井冈山邻近的遂川、宁冈、永新、酃县、茶陵、莲花等县均有党的活动和农民运动，具备一定的政治条件。

“山上有两支地方武装。一支是袁文才领导的农民自卫军。袁的部下有一个曾在广州我举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的人。袁文才听说我到了井冈山附近，就派这个人来宁冈古城看我。他和我谈得不错，并表示袁文才欢迎我上山。后来我又派何长工上山与这两支农民武装的领导人取得了联系，并做了大量的工作。袁文才、王佐的态度很热情，都欢迎我上山。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上井冈山的时机基本成熟。十月份^①我向部队宣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之后开上井冈山。袁文才、王佐的部队夹道欢迎我们。上山后袁文才、王佐同意接受我们改编。他们两支部队编成一个团。这

^① 根据《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二版）第1241页注释，“三大纪律”是1928年春工农红军在井冈山时提出的；“六项注意”是1928年夏提出的——编者注。

个团人员混杂，经常是在编不听调，不大好管理。但不管怎么说，他们毕竟还是服从了我们党对他们的改编，接受了党的领导，成为井冈山革命队伍的组成部分之一了。”

毛主席沉默了片刻，又讲了起来：“井冈山是座好山，地形条件好，群众基础好。当时我们在井冈山生活条件是相当艰苦的。住的是破草房，吃的是红米饭、南瓜汤，穿的是百家衣。自己有什么穿什么，没有统一的服装。夜里盖的是禾草，脚上穿的是草鞋。有的同志甚至连草鞋都穿不上，打赤脚。上山下山全靠两条腿。所有吃的、用的东西全靠两肩挑。当时除极少数人说点风凉话，闹点情绪外，大多数人是坚定乐观的，战斗力还是蛮强的。当年11月，我们利用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攻打茶陵县城。红军官兵斗志昂扬，作战勇敢，不到一小时就攻下县城，建立了井冈山地区第一个工农兵政府。1928年1月，我率领部队攻打遂川县城，红军官兵猛打猛冲，一鼓作气攻入城内，取得较大的胜利。当时正值过春节，部队进城后严格遵守纪律，热情宣传群众，并执行‘保护工商业利益’等政策，受到群众的拥护和欢迎。

“经过几次大的战斗后，井冈山周围的永新、莲花等县相继建立起党的组织和工农政权，各区、乡纷纷成立起农会、赤卫队、少先队、妇女会等组织。经过半年的艰苦奋斗，数不清的大小战斗，证明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是拖不垮，打不烂的。几经失败、周折，我们在井冈山站稳了脚根，扩大了、巩固了井冈山这块革命的根据地。这一段历史，使

红军在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问题上进一步统一了认识。没有井冈山人民的支持，没有井冈山做后方休整地，战斗的胜利就没有保障。所以现在人们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中国革命的摇篮。

“今天井冈山各方面比起三十八年前是大不相同了。上山坐汽车，住楼房，吃饭是四菜一汤，穿的是干净、整齐的衣服，真是神气多了。我相信井冈山将来还会变得更好，更神气。但是我劝大家，日子好过了，艰苦奋斗的精神不要丢了，井冈山的革命精神不要丢了。今天我讲了许多过去的故事，你们还可以再去访问一些井冈山的人民群众。老井冈山人都知道过去井冈山斗争是如何艰难困苦的，都知道无数的井冈山人为了中国革命奋斗牺牲的精神。井冈山不愧是革命的山，战斗的山。没有井冈山过去艰苦卓绝的奋斗，就不会有今天革命的胜利。胜利真是用生命换来的呵！”

毛主席一说就讲了两个多小时，没有人打断他的讲话。我们听着主席滔滔不绝地讲述当年井冈山的斗争生活、战斗情景，很受教育和鼓舞。

主席最后说：“我今天说的是1927年至1928年底井冈山的情况。后来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开始离开井冈山，先后到赣南、闽西地区。在东征福建后，开辟了新的革命根据地，以后又扩大到江西瑞金一大块红色革命根据地。井冈山由彭德怀领导的红五军和由王佐领导的三十二团在井冈山坚持斗争。今天说了不少话，就先说到这里。”

我们仔细听完主席讲井冈山创立和发展的经过，难得听到主席今天讲了这么多话。我用心、用笔拼命记录毛主席讲的每句话，生怕遗漏掉什么。

5月26日

晴

毛主席起床后，吃过饭，在住地附近散步。一面走在山路上观看对面群山变幻不定的白云，一面向陪同他散步的井冈山管理局的负责同志询问井冈山的建设情况。

毛主席说：“我这次回井冈山来看看，感到井冈山的变化很大。修了公路，通了汽车，解决了上山难的问题。”

井冈山管理局的同志说：“现在进出井冈山建了两条公路。一条是由黄洋界到宁冈、永新；一条由拿山、泰和去吉安。还准备再建一条，由井冈山到遂川，这条路正在修建。”

毛主席又问：“井冈山现在建有博物馆、纪念碑，还有这样好的宾馆，来客多不多？”

井冈山管理局的同志说：“不少。特别是天气热的时候，来井冈山参观的人很多。”

毛主席说：“土地革命时期，我们在井冈山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起红色政权，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燎原之火。井冈山的斗争，指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新方向。当时有人提出井冈山的红旗究竟能打多久的疑问？我们以实践回答了这个问题，坚持了井冈山的革命斗争。井冈山革命斗争的胜利，开辟了中国革命胜

利的道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斗争的实践，被中国革命的历史证明是正确的。中国革命如果没有这些根据地做后盾，就不可能取得全国的革命胜利。革命成功是多少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你们应该利用井冈山革命的这些历史，多宣传井冈山的革命传统，让后来的年轻娃娃们了解中国革命的历史。”

我们问主席：“当年井冈山的斗争那么艰苦，战斗那么频繁激烈，许多同志英勇献身了，您知道现在还有哪些老同志健在呢？”

毛主席说：“从全国来说，当年在井冈山战斗过的人还不少。包括现在在党、政、军领导岗位的领导同志如朱德、罗荣桓、陈毅、何长工、彭德怀、谭震林、陈正人、江华、曾志、彭儒、贺子珍等。袁文才、王佐不在了，现在在西藏军区工作的张国华同志原是王佐部下的兵，是个很能干的同志。”

提起这些老同志，毛主席心情有些激动。他说：“今天和你们谈及往事，心情激动是当然的。要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战斗，没有工作，没有流血，没有牺牲，不去起来推翻反革命政权是不可能的，敌人的几百万军队，是不会自行倒台、自行灭亡的。现在，我们胜利了，要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中国，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的井冈山。”

主席边谈边走，散步已远离住地，我们考虑主席应该回去休息了，就劝他回来。随后我们送主席回到住处休息，

我们也各自回去。

晚上，主席的心情仍不能平静，又找我谈心。

主席说：“这次重上井冈山，往事都想起来了。有些事情还想和你说一说。我们军队里也不那么纯，军队里也有派啦！军队里有要闹事的，历史上也经常有闹事的。不知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我信。我们军队几十年经常有人闹乱子，闹就闹吧，闹一下不要紧，闹一下就不闹了吧。最大的闹乱子的是张国焘。张国焘说他的人多，队伍要听他的。其实人多人少不是关键问题，要紧的是问题的本质，是你的路线正确不正确。比如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只剩下八千子弟兵，可长征正确的路线就应该是向陕北，再向华北、东北。人少不怕，坚持正确的长征路线，保留了革命的种子，后来建立了陕甘宁根据地，队伍又壮大了。”

主席稍平静下来继续说：“大大小小的事没有断过，井冈山闹过，闽西闹过，赣东北闹过，中央苏区也闹过。他要闹，你有什么办法。”

5月27日

小雨

今天安排毛主席身边工作人员及专列工作人员第二批参观井冈山。

主席让我第二次给党中央、国务院周总理发电报。报告主席平安无恙，如中央有重要文件可派飞机送往江西南

昌樟树机场，然后用汽车送上井冈山。

下午三时，中央派人将文件送到井冈山。我们把文件送到主席处时，我看到主席正在聚精会神地写“重上井冈山”的诗稿。

诗是这样写的：

水调歌头 重上井冈山 1965年5月

久有凌云志，
重上井冈山，
千里来寻故地，
旧貌变新颜。
到处莺歌燕舞，
更有潺潺流水，
高路入云端。
过了黄洋界，
险处不须看。

风雷动，
旌旗奋，
是人寰。
三十八年过去，
弹指一挥间。
可上九天揽月，
可下五洋捉鳖，
谈笑凯歌还。

世上无难事，
只要肯登攀。

5月28日

阴

上午毛主席散步后，回到住所看中央送来的文件，其中有关于苏联赫鲁晓夫下台后的情况简报。

下午三时，毛主席找我商量安排接见井冈山革命老同志；井冈山上的负责同志；宾馆的服务、警卫、医务人员；工厂的工人、山区农民；还有湖南来的送主席上井冈山的同志等。

毛主席对我说：“这些同志辛苦了，我乐意见见他们，和他们合影留念。过去井冈山的许多人民群众为了红军的生存，受尽苦难，流了不少血和汗，给了我们很大支持和帮助，我和他们同甘共苦过。张平化同志代表湖南送我上山，刘俊秀同志代表江西欢迎我上井冈山，你陪同我上井冈山，你们应该和我一起参加会见井冈山的主人们。这件事由你安排他们分批进行。”

我接受任务后去作安排。

5月29日

晴

主席起床散步后，同张平化、刘俊秀和我一起谈话。

毛主席对我们说：“井冈山是座好山，风光好，空气新

鲜，是休息、健身的好地方。我们已住了一个星期，该走了。”

张平化、刘俊秀同志说：能有这次难得的机会陪同主席重上井冈山，心里非常高兴。现在井冈山的人民迫不及待要见主席。

主席说：“我们难得上山一次，一定要见他们。昨天我让东兴同志安排了，不知安排得怎么样了？”

我回答说：“我按主席的意见将人分成四批会见。”

毛主席说：“就照你的安排办。下午见面，见完就走，不要他们送了。”

下午四时，接见开始。井冈山上人群鼎沸，欢声雷动，群情激奋。到处都有人高喊着：“毛主席！毛主席来了！”热烈的场面感人至深。

由于准备工作充分，井冈山人很守秩序地和毛主席见面。见面和照像进行得很顺利。毛主席频频向人群招手致意，然后在欢呼声中登上汽车，开始下山之途。一路上井冈山的人民自动形成夹道欢送，依依不舍地送主席离去。

毛主席一行经拿山、泰和县直达吉安地委招待所。由于主席这一天比较劳累，吃过饭后即休息。

这一夜主席休息得很好。

5月30日

晴

毛主席起床后吃了午饭，问我下面如何安排？

我说：“一早吉安地委的同志要我转达他们要见主席的

愿望，我答应报告你后再定。”

主席说：“那就见吧，照照像。”

我安排了吉安地委的常委、吉安市委的负责同志和毛主席一一握手，合影。

然后主席一行乘汽车，经峡口、分宜到达樟树机场的火车停车处。

主席上火车前，和张平化、刘俊秀等同志亲切话别。我们和主席一道在樟树机场旁的专列上宿营一夜。

(责任编辑 刘昌亮)

革命教育家谢台臣传略

中共濮阳县委党史办

谢台臣原名丕阁，字台臣（苔岑、苔尘），1884年出生于直隶省濮阳县（现属河南省）鹿斗村一个农民家庭。其父谢陵崇一生务农，全家连同台臣兄妹6人近15口，靠六七亩田地，尚能勉强度日。因谢陵崇的长兄谢陵峰无子女，将谢台臣过继为嗣子。在两家人合力支持下，谢台臣得以入学读书。1902年，他应科举，中秀才。1905年，考入直隶省保定高等师范学校就读，毕业后在保定、大名、天津等地中学任教。1921年当选为直隶省参议员。1923年7月，奉直隶省教育厅派遣到大名创办省立第七师范学校，并被委任为七师首任校长，致力于教育改革。1927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他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全力配合中共组织开展活动，为革命作出很大贡献，被誉为革命教育家。1936年逝世，终年53岁。

（一）

早在1918年，谢台臣就接受《新青年》所宣扬的新文

化、新思想。五四运动爆发后，他深受科学与民主思想的影响，反对旧文化，提倡科学与民主。1923年他担任大名七师校长时，为改革旧教育制度，首先抓教师队伍的建设，广招人才，逐步形成了以晁哲甫、王振华、高韶亭等为骨干的一支进步教师队伍。他针对读死书、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的旧教育制度，参考国内外教育论著，结合自己的亲身体会，提出了“以作为学”和“师生打成一片”的主张。在他制定的教学大纲中，既阐明“以作为学”的含义，又对“作”与“学”的辩证关系作了精辟论述。指出“凡是称得起科学的理论，通统是作的经验的结晶，同时，又是推进作的经验发展的动力。”他重视理论，重视实践，强调“我们要尊重劳动，长于劳动，会生产，说真话，做实事。”

为了实现“以作为学”，谢台臣领导全校师生在校园内开展种植和养殖活动，并兴办了纺织、制革、制肥皂等小工厂。经过二三年的努力，大名七师已成为一座整洁美观的学校。当时，直南道尹周韶南对学校的变化很感兴趣，他到校给学生讲《种树郭橐驼传》，并拨给七师500元银币作植树费，以资鼓励。更重要的是，通过“以作为学”，使书本知识与实践相合，使学生学到了真正有用的科学与技能。当谢台臣发现在蜡纸上刻字的学生找到了用煤油刷钢板的科学根据、研究物理的学生对建筑礼堂的托架找到了原理时，心里感到由衷的高兴。

谢台臣十分强调讲授教材要充实新政治内容。他逐步废除了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审定的文科教课书，决定国文课

选用李大钊、鲁迅、郭沫若等人的文章，也选用苏联作家高尔基等人的革命文艺作品。他自己讲授历史课，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通俗扼要地讲解从先秦到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历史，深受学生欢迎。

为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他把自己积累多年的宝贵书籍赠给学校图书馆，还让图书馆购进大批进步书刊，如《共产党宣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新青年》等。同时，他还发动学生自购书籍，动员学生多读课外书籍。在他的指导下，学生们借书、购书、读书蔚然成风，并对某些重要问题进行学习和讨论，大家的政治思想大有提高。

谢台臣提倡民主办学，并具体规定了4条原则：“第一，全校师生打成一片，无感情上隔阂及生活上的差异，使师生关系变成象家人父子一样的亲切；第二，学校设施不善，是全校师生共同的损失，要随时见到随时建议，随时通过，随时改进；第三，教师要不耻为学生，学生要不怕为教师，师生在互相教授互相学习之中，用集体力量废除课本教育，实现‘以作为学’；第四，有疑便问，有得便教，种菜的园丁可以教我们园艺学，做木工的工友可以教我们手工，我们又可以根据所学过的理论来教育他们，提高他们的技术与认识。”在这些原则指导下，师生互教互学，自由讨论，亲密无间。谢台臣和学校其他领导人，不仅与学生一齐参加学术讨论，还一起参加劳动和体育活动等，使七师校园充满了民主进步的空气。

对于教师和职员，谢台臣从生活上关心，从工作上不断指导和帮助，有错误就批评教育，但绝不随意惩罚和辞退，因而深得广大教职员的信任和爱戴。大家同心协力，为办好学校、教书育人贡献力量。

(二)

1926年8月，谢台臣获知中共党员冯品毅在开封受到军阀和反共分子的迫害，他毅然聘请冯品毅到大名七师任教。冯品毅在校仅3个月，最后在学生中发展赵济焱（赵纪彬）、刘大风（安明）、李世玮（李大山）加入共产党，继而发展成滋（成润）等入党，并于10月建立了党、团两个特支。1927年1月，七师学校放寒假前，已有共产党员10余人。时逢大革命高潮，在北伐取得节节胜利形势下，谢台臣、晁哲甫、王振华各拿出70元银币，资助赵济焱、刘大风、李世玮到南方去参加实际革命斗争。

赵济焱等3人首先到了北京，找中共北方区委要求介绍去武汉。在北方区委的同意下，刘大风赴武汉学习，赵济焱、李世玮仍回大名坚持工作。赵、李返校前，谢台臣再次资助路费，使赵、李二同志及时回到大名七师。

1927年春，大名党、团特支已有党团员30余人，党团特支改为大名党、团县委。此时，由李素若、赵济焱介绍谢台臣、晁哲甫、王振华等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

谢台臣等入党后，了解到党的活动经费十分困难，便

主动从每月薪水中拿出二三十元银币缴纳党费，如有特殊需要就随时供给。这样，中共大名县委成了直南各县中共组织中收党费最多的县委。尤其在谢台臣等入党后，七师学校的主要行政职务如校长和教务、训育、总务主任，均由共产党员担任。在党的领导下，七师成为大名一带共产党活动的基地。学校成为党的上下级接头、通讯和联络的地点，可以印刷党的宣传品。在谢台臣“以作为学”的教学宗旨下，有不少党员和学生到农村开展革命活动，建立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学校中公开地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课程，还购买更多进步书刊供师生阅读和研讨。

为了向校内工友和附近村庄农民进行革命文化教育，学生自治会的平校部组织平民夜校，派党员学生去讲课，这些作法都获得了谢台臣等校领导的大力支持。到1930年上半年，在全校学生和教职员工300多人中，党团员已有100多人，连同反帝大同盟等党的外围组织，革命力量占全校总人数的2/3以上。从1927年到1930年，以谢台臣为领导的大名七师，为革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干部，他们象种子一样，散布在直南、豫北、鲁西等广大地区，大名七师成为这一带的一个重要革命策源地。

1927年5月，因红枪会攻大名城，七师学校放假。谢台臣等赴濮阳与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三军军长梁寿凯联系，并去濮阳、清丰召开军民大会，号召群众起来革命，协助国民革命军北伐。梁寿凯占领濮阳后，李素若在濮阳县组织了国民党县党部，谢台臣以跨党党员去县党部任职。“七

“一五”反革命事件后，谢台臣随梁寿凯退走新乡。此后由于奉系军阀占领大名城，学校被毁，无法开学。1927年底，谢台臣、王振华只好奔赴天津，暂在天津中日中学教书。

1928年底，河北省教育厅决定大名七师开学，谢台臣仍回七师任校长。在七师停课一年半的时间里，300多名学生作了大量的农村工作，有不少人加入中国共产党，为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七师开学不久，1929年2月发生了温邢固二一五农民革命斗争事件，反动当局将赵济焱、李世玮、刘汉生、王卓如等逮捕入狱。谢台臣闻讯亲自到狱中探望，他含着泪水对赵济焱等人说：“你们在狱中要站稳立场，我们在外边一定坚持活动，并想法营救你们。”不久，赵济焱等被押解到大名，谢台臣拿出400元银币供他们打官司用。

(三)

1929年下半年以后，特别是1930年上半年，谢台臣、晁哲甫、王振华与立三路线的“左”倾错误作了斗争，受到不公正的打击和迫害。

1929年9月，河北县委一位巡视员到大名巡视工作。大名县委根据上级指示决定在“双十节”晚上大量散发传单，以共产党的名义，提出“打倒国民党”、“组织工农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等口号，并说“一张传单就等于

一颗重磅炸弹”。对此，谢台臣在事先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不应当暴露党的组织，也不能公开散发传单，因为以党的名义公开散发传单，就会过早暴露党的力量，引起敌人注意，增加工作困难。但是，这些正确的意见却没有引起党内“左”倾错误执行者的重视。结果，仍按预定计划在大名城散发了大量传单，由此也引起了大名县反动当局对七师学校的严密监视。不久，由于在邮检中发现七师学生孙耀宗在写给十一中同学的信中引用了七师教师原政庭批评国民党和三民主义的话，国民党军警包围七师，逮捕并迫使孙耀宗供出教师原政庭。敌人在大名七师搜查了5天，先后捕去师生员工10余人，谢台臣也遭到传讯。然而，由于谢台臣不畏艰险，及时与党组织通报情况，学校领导人与党组织密切配合，采取有力措施，使敌人没有抓到证据。对于被敌人抓去的师生，除原政庭和孙耀宗被判刑外，其他人由谢台臣竭力担保，陆续被释放回到了学校。

面对这一情况，中共直南特委负责人并没有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而是更加严重地推行“左”倾错误方针。1930年4、5月间，中共直南特委几次派人到大名组织暴动，他们错误地认为“革命高潮已经到来”，目前已到了“振臂高呼，群起响应的时候”。提出七师学校为暴动中心，以七师的学生、工友和学校周围参加夜校学习的农民为主力，攻打大名城，把红旗插在大名七师校门口，立即行动。谢台臣、晁哲甫、王振华认为暴动的主客观条件不成熟，党的力量比较薄弱，广大群众还没有组织起来，而敌人力量比

较强大，搞暴动是不实际的，不仅没有成功的可能，还会招致不应有的损失。他们还坚持认为，党应当保持和掌握好七师学校这个公开合法的革命阵地，为党培养干部输送到农村，深入地发动和组织农民群众，壮大自己，积蓄力量，待条件成熟再举行暴动。这些意见完全是根据直南当时的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的实际情况提出来的。但是，执行“左”倾路线方针的领导人不仅置若罔闻，还在一次活动分子会上，大批右倾机会主义，指出谢台臣等3人已成为暴动的主要障碍，宣布开除他们的党籍。在这种“左”的错误压力下，不少党员消沉了；学校周围村庄的农民也被吓跑了，暴动计划也成了泡影。

(四)

被开除党籍，对谢台臣是一个最沉重的打击。失去党的领导和支持，使他无法开展工作。与此同时，河北省教育厅鉴于大名共产党的活动与谢台臣领导的大名七师有关，意欲借故撤掉谢台臣的校长职务，只是因谢台臣在社会上有崇高威望，便采取不给学校拨款等办法，迫使谢台臣自动辞职。谢台臣失去党的支持，又因经费无着，学校无法再办下去，便向省教育厅提出辞职，省教育厅立刻照准，并派反动政客张达夫以督学身份来大名七师，准备取而代之。

为了不让反动势力掌握七师的领导权，保住这块红色革命阵地，七师中共组织遵照上级指示，组织全校进步学

生展开了轰轰烈烈的“驱张挽谢”斗争。张达夫到大名七师，立刻遭到广大学生的攻击。学生代表对张达夫说：“唯有艰苦卓绝的谢校长才能领导我们，我们反对其他任何一个人来掌其权，请张督学帮助挽留我们的谢校长。”张达夫装腔作势地说：“你们谢校长辞意甚坚，厅里一再劝他不要辞职，但无法挽留……现在还是开学吧。”张达夫赖着不走，学生便一天几次找他，弄得他狼狈不堪，只好搬到第五女师去住。学生仍不放过，在七师与五女师之间的来往路途上，张贴驱赶张的标语，还在七师大门口贴了一张“混牛，你想长七师吗？”的漫画，校院内也到处贴着“混牛你滚吧！”的大标语。张达夫的日子难过得很，只好向省教育厅反映。10余天后，省教育厅将张达夫调回，重让谢台臣回大名七师工作。

此间，谢台臣心情抑郁，加上操劳过度，精神衰弱，竟病倒了。为了不影响教务，他于1930年5月又力辞校长职务。省教育厅批准谢台臣辞呈，并于7月5日正式任命张达夫为大名七师校长。

张达夫带领一班人马接管了七师之后，对革命师生大打出手，不到半年时间就辞退了全部进步教师和工友；开除进步学生110余人，其中有中共党员学生50余人；还有一部分学生被当局逮捕。他们禁止学生阅读进步书报杂志，动辄训斥甚至扣发教职工工资，终日领着学生唱旧戏，根本不把上课当正业。张达夫的倒行逆施，进一步激起了全校进步学生的强烈反对。9月下旬，大名七师学生又展开了

激烈的驱张挽谢运动。虽经反动军警的严厉镇压，大家仍然顽强不屈。

由于广大进步学生的诚心挽留，加上省教育厅派来处理问题的阎承之极力相劝，谢台臣感到如果再坚持不回七师，情义上实在说不过去，于是在1931年春，谢台臣再任七师校长。这时，他虽说失去党的组织关系，却仍然坚持为党工作，贯彻以往的教育方针，恢复学校的革命传统，让原班教师到校，被张达夫开除的学生均得以复学，学校中的党团组织很快恢复，还建立了学生自治会、读书会、反帝大同盟、社联、左联等，群众组织的活动也活跃起来。谢台臣虽有病在身，仍满怀信心希望再度振兴七师。

可是，执行“左”倾错误路线的中共直南特委负责人，却看不见谢台臣重振七师后所作出的这些成绩，硬说他“不敢干”，“仍然坚持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谢台臣在北平住院治疗时听到这些指责，内心感到十分痛苦。他表示：“我决不和党闹对立”。因此，1932年夏，他仍然决定辞去校长职务。接着，河北省教育厅委任国民党蓝衣社分子郭鸣鹤为校长，使七师遭到更严重的摧残，党团员和进步学生被开除学籍的达170多人。这是“左”倾错误在大名七师造成的又一次严重后果。

谢台臣再次遭到打击，精神上更加痛苦，一直无法治愈的精神衰弱症更加严重，终于在1936年2月26日含冤去世。

谢台臣逝世后，直南中共党员和革命群众极其怀念他。

1937年7月，大名七师校长王振华在校内外同学的积极要求下，在校园内用汉白玉建立了一栋“谢台臣先生纪念碑”，碑座上刻有《谢台臣先生教育语录》，以垂永远。

1945年，邓小平、刘伯承、薄一波、宋任穷等同志路过大名，看了“谢台臣先生纪念碑”，称赞谢台臣是一位革命教育家。1949年秋，大名民主政府决定将大名中学命名为“台臣中学”。

1979年3月15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通知，认为谢台臣在“1930年被执行‘左’倾路线的直南特委开除党籍，是错误的”，并决定“恢复谢台臣同志的党籍”。谢台臣英灵有知，当含笑于九泉。

（责任编辑 邢济萍）

闽粤赣边区革命根据地的 建立及其斗争情况

闽粤赣边区党史办公室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领导创建的闽粤赣边区革命根据地是在闽西、东江（粤东）、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建立的基础上形成的，其范围包括闽西、粤东北和赣东南的一部分县、区。1930年10月被党中央划定为全国六大块苏维埃区域之一；接着，闽粤赣边革命根据地内成立了统一的党、政、军、工、团的省一级领导机关，正式形成了闽粤赣苏区。在红军三次反“围剿”战争期间，闽粤赣苏区是中央苏区的后方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后，闽粤赣苏区进一步巩固发展，成为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拟就闽粤赣苏区的建立及其斗争情况、闽粤赣苏区同中央苏区关系的发展变化以及闽粤赣苏区的历史地位和作用问题作一概述。

一、闽粤赣边区工农武装割据斗争的发生发展

(一) 闽粤赣边区各县的工农武装起义

地处江西、福建、广东三省边界的赣南、闽西、东江广大地区，都经受了 1925 年至 1927 年大革命急风暴雨的战斗洗礼，都曾经有过广泛的工会和农民协会组织，有过工人农民对地主豪绅阶级的许多经济、政治的斗争，大多数县都相继建立了共产党的县委、支部和特支组织。“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发生以后，闽粤赣边区的党组织和工农运动都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摧残，但是，各县的党组织基础依然存在。

1927 年 9 月至 10 月间，周恩来、叶挺、贺龙、朱德等同志领导的南昌起义部队在南下广东途中，先后转战于赣南、闽西、粤东各县，产生了深刻的革命影响。在党的“八七”会议确定的关于土地革命与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总方针的指引下，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的推动下，赣南、闽西、东江地区的党组织遵照各自省委制定的武装起义计划，在各县分别组织发动了以农民为主体的工农武装起义。

在赣南地区，从 1927 年冬至 1928 年春，先后爆发了赣县大埠起义，信丰起义，于都里仁、步前、桥头起义，寻邬起义等。参加起义的工农武装，先后组织成立了各地的工农革命军纵队和红军独立第二、第四团，建立了红军游击根据地。

在闽西地区，1928 年春夏，先后爆发了龙岩后田起义，

平和起义（平和县属闽南地区，同闽西的永定县和东江的大埔县、饶平县接壤），上杭蛟洋起义，永定金丰、湖雷、溪南起义并联合攻打永定县城。参加起义的工农武装，先后组织成立了福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和红军第七军第十九师第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团。同年7月，闽西各县和平和县的党组织成立了统一的领导机关——中共闽西特委。接着又成立了永定溪南区苏维埃政府，并在溪南区实行分配土地，有近两万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

在东江地区，早在1927年4月即根据形势发展变化的需要成立了中共东江特委。从4月下旬至1928年2月，中共东江特委及下属组织先后组织领导了澄海起义，普宁起义，海丰、陆丰、惠阳、紫金（即海陆惠紫）起义，梅县“五·一二”起义，兴宁兴城起义，五华年关起义，龙川鹤市起义，大埔高陂起义和声势浩大的攻打惠来县城的战斗。在以上地区的工农武装起义中，先后建立了各地工农革命军的团一级组织，许多县、区还成立了短时间的苏维埃政权。从1927年秋冬至1928年春，由于敌强我弱，东江地区各县的工农革命武装先后向边界山区集结，并分别在大南山、西岩山、八乡山、九龙嶂、大塘肚、铜鼓嶂等山区建立游击根据地。1928年5、6月间，根据东江特委的指示，成立了五、兴、梅、埔、丰“五县暴动委员会”，并于8月间组织发动了“畚坑暴动”。不久，揭阳、潮安两县党的负责人到八乡山九龙嶂与“五县暴委”领导人汇合，“五县暴委”扩大为“七县联委”，并接着组织发动了梅县、兴宁、

五华、丰顺、大埔等县的秋收斗争和年关斗争。1929年4月，又爆发了丰顺起义。

赣南、闽西、东江各县的工农武装起义，揭开了闽粤赣边区“工农武装割据”斗争的序幕，为尔后赣南、闽西、东江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和闽粤赣边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二）红四军进军闽粤赣边区与赣西南、闽西、东江革命根据地的开辟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先后向赣南、闽西进军，并一度进入赣粤、闽粤边境。在地方党组织和红军的密切配合下，红四军相继取得了大柏地、宁都城、长岭寨、龙岩城、白砂等战斗的重大胜利，消灭了国民党地方土著军阀的有生力量，解放了闽赣边界重镇汀州和赣南、闽西的许多县城、区镇及乡村，广泛发动了地方群众的武装斗争。3月20日，毛泽东在闽西汀州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决定“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从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①

遵照红四军前委制定的战略计划，1929年4月至7月，红四军先后在赣南、闽西举行著名的“四月分兵”和“七月分兵”，进一步扫荡了地方反动势力，促进了各县红

^① 《红四军前委关于攻克汀州及四、五军江西红二、四团行动方针等问题向福建省委和中央的报告》，1929年3月20日。

色政权的建立和土地革命的开展，同时帮助建立了地方红军和扩大了红四军主力部队，初步形成了以兴国、宁都、于都三县为中心的赣南革命根据地和以龙岩、永定、上杭三县为中心的闽西革命根据地。

1929年5月，中共赣南特委召开赣南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大会遵照红四军前委和毛泽东的指示，确定赣南党组织的任务是：充分发动群众，壮大党的力量，扩大地方武装，实行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大会选举产生了以肖韶为书记的新的赣南特委领导机构。同年7月，在毛泽东的指导下，中共闽西特委在上杭蛟洋召开闽西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政治决议案》、《苏维埃政权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等。大会提出闽西党组织的方针和任务是：坚决地领导群众，为实现闽西工农政权的割据而奋斗；巩固并扩大党组织；发动并组织广大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扩大工农武装。大会选举产生了以邓子恢为书记的新的闽西特委领导机关。

中共赣南“二大”和中共闽西“一大”的召开，将赣南、闽西的工农武装割据斗争进一步引向深入。到1929年11月底，闽西红色区域已扩大到龙岩、永定、上杭、武平、长汀、连城6县的纵横数百里之间。在这区域内，先后建立了4个县苏维埃政府和50多个区、400多个乡的苏维埃政府，近80万贫苦农民分到了土地；党的组织至1930年5月已拥有6个县委、53个区委、19个特支和546个支部，党员人数约1万人。赣南红色区域则从1930年春向赣西

南地区发展，同以吉安东固、延福为中心的赣西红色区域连成一片，形成以赣南为中心区域的赣西南革命根据地。

1930年3月间，闽西和赣西南相继召开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分别成立以邓子恢为主席的闽西苏维埃政府和以曾山为主席的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它们标志着闽西和赣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形成。

在东江地区，1929年6月，中共东江特委在丰顺县的黄礪召开东江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会议传达了中共“六大”精神和决议，讨论了政治、党务、组织、宣传、职工运动、农村工作、军事问题等。大会确定东江党组织目前的总路线是：“扩大党的政治宣传，加紧日常斗争的鼓动与指导，争取广大群众”。大会指出东江党目前的中心任务和策略是：“团结、积聚革命力量，准备暴动的时期”，“游击战争必须积极的运用，农民自发的暴动，必须积极领导，武装必须尽可能的准备”。^①大会选举产生了以卢济为书记的新的东江特委领导机关。

在中共东江“二大”方针政策的指导下，在赣南、闽西工农武装割据斗争胜利的推动下，东江地区各县以及地域属赣南、党组织属东江特委领导的寻邬县的农民斗争逐渐由减租发展到没收分配地主的土地，推翻豪绅政权和建立苏维埃政府。党的组织也迅速发展，至1929年8月，在

^① 《中共东江特委通告第一号—东江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总结与精神》，1929年8月1日。

东江特委之下已建立了 14 个县委和 50 个区委、419 个支部，党员共 5000 多人。

1929 年 10 月至 11 月间，红四军奉命从闽西上杭经武平出击东江，进一步帮助和促进了东江地区工农武装割据斗争的深入开展。是年秋冬，农民的秋收斗争和年关斗争遍及整个东江地区，打土豪、分田地到处都在进行，各级革命委员会和苏维埃政府纷纷建立。到 1930 年 3 月间，东江特委所管辖的 16 个县中，已有县革命委员会 8 个（即寻邬、龙川、梅县、兴宁、五华、丰顺、大埔、潮安），县苏维埃 1 个（即惠来），区苏维埃 20 个，区革命委员会 10 多个，乡苏维埃 278 个，人口约 30 万，迅速形成了以八乡山为中心的东江革命根据地。5 月 1 日，东江苏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八乡山召开，成立了以陈魁亚为主席的东江苏维埃政府，它标志着东江革命根据地的正式形成。

1930 年春夏，在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精神的指导下，闽粤赣边区党组织和红军的思想、组织建设又取得了新的成绩。边区的地方红军经过整编和扩充，相继建立了政治、军事素质都比较好的军一级红军部队。其中赣西南苏区先后建立了红六军、红二十军、红二十二军；闽西苏区先后建立了红十二军、红二十军；东江苏区建立了红十一军。此外，各苏区还普遍建立了工农赤卫军、赤卫团、赤卫队、少先队等群众性的武装。

闽粤赣边区工农武装割据斗争的发生发展，赣西南、闽西、东江革命根据地的形成，为闽粤赣边革命根据地的建

立创造了条件。党中央和红四军前委，正是在这三块革命根据地逐渐形成和巩固发展的过程中，进一步提出建立大规模的、连成一片的闽粤赣边革命根据地的战略计划的。

（三）闽粤赣边革命根据地的基本形成与土地革命的深入

在赣南、闽西、东江革命根据地初创和巩固发展的过程中，中共中央和红四军前委即已把打通三块革命根据地，使之连成一片，作为党与红军的战略行动计划来执行，并于1930年6月基本实现了这一计划。

1929年6月中旬，在赣南、闽西革命局面初定与联系沟通的形势下，红四军前委派陈毅赴东江，“向东委（东江特委）商量红（四）军来东江工作问题”。^①同年7月，在毛泽东直接指导下召开的中共闽西“一大”上，专门讨论了打通闽西、东江、赣南、湘赣边苏区的联系问题，并确定了以下的计划和步骤：“加紧长汀、武平工作，注意瑞金、会昌、寻邬、平远、蕉岭工作，特别是闽粤赣三省枢纽的长汀要加紧工作；建立闽西、赣南、东江、湘赣边界四个区域的最高党部，指挥四区域的工作，造成四省边界的赤色政权；应与东江、赣南两地党部发生秘密关系。”^②

1929年9月，第二次两广军阀战争爆发，给红军打通闽西、东江苏区的联系造成了有利条件。因此，中共中央

^① 《中共东江特委报告第九号》，1929年6月25日。

^② 《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之政治决议案》，1929年7月。

通知福建省委指示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朱毛红军（红四军）全部立即开到东江去……要扩大我们的工作到东江来，与闽西相呼应，取得很好的联络，使闽西、东江连成一片”；“四军开往东江的路线，是应当加紧向梅县、大埔、丰顺、兴宁、五华前进，与海陆丰联络起来。”^①9月28日，中共中央又在著名的《九月来信》（即《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对红四军如何利用两广军阀战争，开创闽粤赣边区工农武装割据新局面的军事行动问题进一步作了具体的部署，并强调指出：“在全国革命高潮未来时，红军此时主要地采取粤、湘、赣、闽四省边界游击的策略是对的，但要注意使这四个区域的赤色势力联系起来。”^②

1929年10月中旬至11月下旬，红四军遵照中央的指示，先是从闽西的上杭经武平出击东江，转战于梅、埔、蕉、丰、平5县。继而折入赣南的寻邬、安远，而后回师闽西，进占汀州，进一步沟通和密切了闽粤赣边区红色区域的联系。与此同时，东江特委和闽西特委也积极从组织上、军事上、政治上和后勤保障工作上配合红四军进军东江的军事行动：东江特委命令驻大南山的红四十七团立即开赴西北，协同红四十六团占领汤坑、隘隍，以截击从潮汕方面赴援西北之敌；闽西特委则大力“加强上杭南路和武平工作，统一汀河（江）两岸的赤色区域，使之与赣南、东江

① 《中共福建省委给闽西特委、四军前委的信》，1929年10月6日。

②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2页。

的革命势力取得联系”。^③

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在上杭古田针对林彪的右倾悲观思想给他写了复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批评了那种不愿做艰苦工作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错误倾向，同时也批评了林彪没有在闽粤赣边区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观念，因之也就没有由这种红色政权的深入与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观念。从而进一步强调创建闽粤赣边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意义和作用。毛泽东在复信中深刻指出只有中国工农红军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才是半殖民地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毛泽东在这封信中进一步发展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开始形成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这一理论又及时地指导了当时闽粤赣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工作。

1930年1月，毛泽东、朱德等率领红四军从闽西转战赣西南，胜利地打破了闽粤赣敌军发动的第三次“三省会剿”。2月6日至9日，在毛泽东、刘士奇、曾山的组织领导下，红四军前委和红五军、红六军军委及赣西、赣南特委，在吉安县陂头召开联席会议（即“二七”会议），听取了毛泽东关于政治形势和今后任务的详细报告。会议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成立既领导赣西南、闽西、东江苏区，又指挥红军第四、五、六军的“前委”，其委员由红四、

^③ 《中共闽西特委通告第十三号》，1929年11月2日。

五、六军和赣西南、闽西、东江等苏区的主要党政军领导人组成，毛泽东为前委书记。前委成为当时闽粤赣边区各苏区的党政军最高领导机关，直属中共中央领导。此外，会议还决定将中共赣南、赣西特委合并，成立以刘士奇为书记的中共赣西南特委。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领导机关的成立，不但加强了闽粤赣边区党和红军的斗争联系及统一领导，而且为尔后闽粤赣边区大规模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形成提供了组织上的保证。

“二七”会议后，红四军和红六军一部协同作战，于2月24日、26日在吉安县水南、施家边全歼国民党独立第十五旅唐云山部近3000人，极大地震动了闽粤赣三省敌人。随后，红四、五、六军又进行了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和贯通闽粤赣边苏区的大规模分兵游击活动。

1930年3月中旬，毛泽东在赣州城郊楼梯岭主持召开前委会议，并于3月18日发布了《前委通告第三号——分兵争取群众的意义及工作路线》。《通告》客观分析了当时闽粤赣三省的敌我形势，认为赣南、闽西敌人力量空虚，是红军分兵游击和深入发动群众的极好机会，因而决定红四、五、六军部队以3个月为期，实行分路游击，以完成打通和连贯闽粤赣三省各红色区域的战略任务。为了达到分兵的战略目的，《通告》要求红军分兵各地时，要采取“同时扩大同时深入”的方针，有计划地帮助原有红色区域的党及群众去组织政权，建设武装，分配土地，加强党与团体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将原有区域扩大到全县，并推广到邻

县。同时要求红军分兵期间必须遵循“波浪式的向前扩大”的工作路线，地方党的行动要与红军的行动合拍，以切实完成连接闽粤赣边区红色区域的战略计划。

1930年3月下旬至5月下旬，红四军所属各纵队和红六军第二纵队等部队，遵照《前委通告第三号》确定的分兵计划及其方针策略，根据前委的具体分兵游击部署，先后实行战略展开，在赣南和粤东北地区各县开展大规模的分兵游击活动。3月19日，红四军第三纵队从赣州城郊出发，向于都开拔，首先以于都县为中心，举行为时一个月的分兵游击，建立了于都县各级红色政权，并打通了于都、安远两县红色区域的联系。随后，第三纵队继续向东游击，先后分兵于瑞金县境和闽西汀州地区，完成了前委所赋予的分兵任务。同一期间，红六军第二纵队沿兴国县境向宁都、瑞金县境发展，同红四军第三纵队的分兵密切配合。3月20日，前委和红四军军委及红四军第一、二、四纵队离开赣州城郊，向南康县境开进，红四军军部率第一、四纵队进占潭口，第二纵队攻占南康县城。在南康县分兵数天之后，即向大余转进，于3月下旬攻占大余县城。3月27日，毛泽东在县城主持召开大余、南康、信丰、崇义、上犹和粤东北南雄等6县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对地方武装的组建以及配合主力红军的分兵游击、巩固和扩大红色区域等问题作了重要指示。4月1日，红四军第一、二、四纵队越过梅岭，打败粤敌毛维寿所部吴文献的两个营，俘敌数百，并乘胜攻占南雄县城，尔后在南雄县境内分兵一个多

星期。4月中旬，红四军由南雄回师赣南，胜利攻克信丰县城，共打死打伤和俘虏国民党靖卫团团总以下官兵1700余人，缴枪500余支，活捉了国民党信丰县长。红四军在信丰县分兵期间，帮助建立了信丰县革命委员会。同时，前委决定将信丰、南雄、大余、南康县的红军游击队整编为红军第二十六纵队。随后，红四军第一、二、四纵队分兵游击于安远、会昌等县，并攻占了会昌县城，还帮助建立了以盘古山矿工为主体的红军第二十二纵队。4月下旬至5月初，毛泽东等率领红四军第一纵队从会昌县筠门岭进入寻邬县境内，先是消灭澄江的地主武装，接着于5月2日进占寻邬县城。5月6日，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寻邬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县城胜利召开，正式成立寻邬县苏维埃政府。从5月上旬至6月初，红四军第一、二、四纵队一部分主力继续分兵于寻邬、会昌、安远，另一部分主力于5月7日进入粤东北地区，先后分兵于平远、五华、兴宁等县，“攻下五华、兴宁，把白军毛维寿所部约两营及当地之警备队、民团缴械。”^①到6月初，东江苏区西北7县之五华、兴宁、丰顺、梅县、平远、蕉岭、大埔的红色区域，已经同赣南苏区东南之会昌、安远、寻邬等县的红色区域连成一片，同时与赣南其它各县红色区域的联系亦已相通。

^① 《捷报——四军来讯》，载《永定县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日刊》，1930年5月21日。

红四军等部队在赣南粤东北各县举行大规模分兵期间，闽西苏区的红十二军在巩固闽西红色区域的基础上，于3、4月间大力向闽西南交界地区的漳平、华安、南靖、龙溪、平和等县开展游击战争，沉重地打击了地方反动势力，发动了数十万的闽南群众蓬勃的斗争。5月中旬，红十二军遵照党中央关于“红军十二军发展方向是东江”的指示，^①分3路从永定县向大埔县出击，5月19日在永埔交界的炉下坝和虎头砂首战告捷，共歼敌数十人，俘敌120余人，缴枪近百支。随后，红十二军乘胜向大埔县境内开进，相继攻打枫朗、百候、高陂之敌，又节节取得胜利。6月间，因两广军阀战争趋于缓和，粤敌香翰屏师入东江，红十二军在同香翰屏部作战失利的情况下，于6月下旬回师闽西。红十二军进军东江历时一个多月，打通了闽粤边境的永定、平和、大埔、饶平等县红色区域的联系，有力地配合了红军在赣粤边区的分兵。

1930年5月，爆发了国民党蒋、冯、阎军阀的中原大战，整个时局更加有利于红军和苏区的发展。前委和毛泽东、朱德等对时局作出了冷静正确的估量，认为：“应付时局的方针还是遵循着过去的路线，以为发动广大群众，广泛的在农村中建立群众的基础，深入土地革命，彻底分配土地，扩大土地革命影响于全国，普遍的建立小块赤色政权、赤色武装，（并）使小块苏维埃与零星的红色武装继续

^① 《中共中央给闽委转闽西特委信》，1930年4月28日。

发展，渐次汇为一个总流。”^① 前委和毛泽东强调红军必须在此信念之下来确定斗争任务，红军的分兵游击“都要以达到这种信念为目的”。^②

6月初，乘蒋、冯、阎中原大战之机，毛泽东和朱德依照《前委通告第三号》中关于3个月分兵最后会师闽西的计划，率红四军从寻邬等地出发，沿赣粤边境北进闽西武平县境内，接连攻克武所、东留、下坝、中赤、岩前和武平县城，横扫地主民团钟绍葵、蓝玉田、钟文才等部。红四军完成在武平的分兵任务之后，即由武平东进上杭，于6月7日在官庄、回龙突破国民党周志群旅的汀江防线并打败该旅，接着一鼓占领上杭县城。随后，红四军从上杭转兵北进长汀县境内，于6月中旬进驻汀州。此时，红四军所属部队和红六军一部，经闽粤赣边区的大规模分兵之后，胜利会师于汀州地区，完满地结束了3个月的分兵游击活动。

6月19日，红四军等部队奉命在汀州举行整编，以红四军为基础包括闽西红十二军和赣西南红六军（7月改称红三军），统一整编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一路军（不久改称为红军第一军团），共2万余人，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在红一军团整编成立时，原红四军第四纵队奉命回归闽西地方，并与红十二军第一纵队合编为闽西地方主力红军第二十一军，共2000人，由胡少海任军长，邓子

^{①②} 《红四军部队情况报告（1929年7月至1930年4月）》。

恢复政委。

从《前委通告第三号》发布到红一军团成立的整整3个月时间里，经过红四军、红六军、红十二军、红十一军等部队在闽粤赣边区的大规模分兵游击活动，使闽粤赣边区的工农武装割据斗争“渐次汇为一个总流”。到1930年6月，以闽西、粤东北和赣东南之间连成一片的红色区域为基础的闽粤赣边革命根据地基本形成。到1930年10月，闽粤赣边革命根据地被党中央确定为全国六大块苏维埃区域之一。

闽粤赣边革命根据地基本形成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苏区内部土地革命政策的统一和土地革命的深入。

在赣西南、闽西、东江革命根据地初创和形成阶段，各根据地虽然都根据中共“六大”决议精神进行没收和分配土地，但各根据地的土地革命政策和分田原则是不大一致的。1929年4月红四军分兵赣南期间，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兴国土地法》，根据“六大”决议精神，纠正了原《井冈山土地法》中“没收一切土地”的错误，明确规定“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及少地的农民耕种；分配土地的区域和数量标准应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和男女老幼平均分配为主体。但在红四军离开赣南后，赣西南党内分配土地的问题上出现意见分歧：“一为没收一切（土地），平均分配，一为没收豪绅地主反动派及富农剩余土地和祠庙土地，依照劳动力分配。这两个意见坚持未

得解决。”^① 因此，赣西南苏区迟迟分配不了土地，土地革命不能全面发动和深入进行。东江苏区也因主张按劳动力分田而影响土地革命的深入。1929年7月，在毛泽东指导下召开的中共闽西“一大”上，通过了《政治问题决议案》和《土地问题决议案》，在贯彻党的“六大”规定的土地政策和《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党的土地革命政策。在分田问题上，第一次提出按原耕为基础，实行“抽多补少”的原则。对富农的政策，明确规定只没收其多余的土地，不“过分打击”富农。规定了对小地主同大中地主有区别的政策，即“对农村小地主要没收其土地，废除其债务，但不要派款及其他过分打击”；规定对不外逃的地主及其家属，在其不反对革命的情况下，可“酌量分与田地”。对大小商店采取“一般的保护政策（即不没收）”。这些土地革命政策不但推动了闽西苏区土地革命的健康发展和迅速深入，而且推广到赣西南和东江苏区。1930年2月，毛泽东在吉安陂头主持召开“二七”会议上，根据闽西苏区土地革命的政策和经验，在土地问题上强调“一要分、二要快”的精神，确定了以乡为单位，以原耕为基础，按人口平分土地的原则，从而迅速促进了赣西南苏区土地革命的开展和深入。

随着土地革命的全面发动和步步深入，苏区内部出现了贫雇农同富农争夺肥田的斗争。主要原因是富农抽出来

^① 《张怀万巡视赣西南报告》，1930年4月5日。

的土地大都是瘦田，而自己留下肥田。因此，贫雇农普遍要求改变分田中肥瘦不均的状况。1930年5月，毛泽东在寻邬进行大规模的深入社会调查之后写的《寻邬调查》一文中，明确指出：“肥瘦分配的斗争，这是土地斗争的中心，也即是富农与贫农的斗争，共产党是毫无疑义应该站在贫农方面，反对那些富农的肥田独霸主义。”6月，毛泽东在长汀南阳主持召开的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即南阳会议）上，专门通过了《富农问题》决议案，进一步正确地提出了限制富农的措施，即第一次规定了分配土地应于“抽多补少”之外加上“抽肥补瘦”的原则，不准富农瞒田不报和把持肥田。从而进一步完善了党关于限制富农的政策。

1930年春夏，伴随着赣南、闽西、东江苏区的贯通和闽粤赣边苏区的基本形成，以毛泽东为代表提出的土地革命政策也接着在东江苏区贯彻执行，东江苏区的土地革命也随之深入发展。因此，闽粤赣边苏区的土地革命政策，从原来的不统一到基本统一，土地革命从原来发展不平衡到发展平衡。闽粤赣边苏区的土地革命政策，成了当时全国各苏区正确土地革命政策的代表。

二、闽粤赣边革命根据地的正式建立和三次反“围剿”战争

（一）李立三“左”倾错误对闽粤赣边苏区的影响

在闽粤赣边革命根据地基本形成和日益巩固发展的关键时刻，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并影响和打乱了前委和毛泽东对闽粤赣边

革命根据地的各项工作部署，给根据地的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政权建设造成了危害。

早在1930年4月李立三“左”倾错误开始形成时，党中央在4月3日《给四军前委的信》中就指责前委领导人说：“‘造成闽粤赣三省边境的红色割据’，或者是‘争取江西一省的政权’，这是你们历来的观念，在目前这是极端错误的了！前者是割据政策，是保守观念，是没有以全国胜利为前提，在目前革命形势之下，自然是极端与党的总任务相冲突的。”

6月11日，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的主持下，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接着又制定了一个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向中心城市进攻的冒险计划。其中命令红一军团进攻南昌、九江，然后与彭德怀等领导的红三军团，贺龙等领导的红二军团会攻武汉，饮马长江，夺取湘鄂赣数省的首先胜利；命令闽西的红二十一军和东江的红十一军向潮汕、惠州出击，然后与广西左右江的红七军会攻广州，夺取闽粤桂数省的首先胜利。为推行上述冒险主义的军事计划，党中央在6月15日《致四军前委信》中强调：“中央新的路线到达四军后，前委须坚决按照这个新的路线转变……如果前委有谁不同意的，应即来中央解决。”

在党中央李立三的指令下，毛泽东、朱德等于6月下旬率红一军团离开汀州，经赣南向南昌推进，尔后西进湖南，同彭德怀等领导的红三军团会师并合编为红一方面军。

红一军团是当时全国最强大的一支正规红军，如果不是奉命北上，而是继续按照前委和毛泽东的原定战略计划行动，那么整个闽粤赣边区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将会更为开展。

红一军团北调以后，李立三的“左”倾错误也接着在闽粤赣边苏区的党政军组织中贯彻执行，赣西南、闽西、东江苏区先后成立了党团合一的“行动委员会”。8月间，闽西红二十一军奉命向东江出击，计划占领潮汕；东江红十一军两次远出进攻潮州，计划占领惠州。8月至9月间，赣西南的地方红军和群众武装，先后强攻吉安和赣州。结果，上述军事行动均遭到挫败，苏区内部的各项工也受不同程度的破坏。红二十一军从东江退回闽西之后，因兵力损失较大，同地方红二十军合编为红军新十二军。

1930年9月下旬，党中央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随后，党中央又对全国各苏区的工作作出新部署。

（二）闽粤赣边革命根据地的正式建立

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后，中央为巩固发展全国各苏区，早日召开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成立全国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于1930年10月，初步将全国主要红色区域划分为六大块苏区，即：“1、中央区——湘鄂赣及赣西南；2、湘西、鄂西；3、鄂东北；4、赣东北；5、闽粤赣；6、广西。”^①同年11月，中央政治局拟定的《关于苏维埃区域

^① 《中央给赣东北特委并红军前委的指示信》，1930年10月28日。

目前工作计划》中，对上述六大苏区的党组织、苏维埃政府、红军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组成及其隶属关系作了具体的规定。其中决定在中央苏区立即设立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以指导全国各苏区的党组织和统一各苏区的军事指挥；在其它各苏区设立省一级的党（特委）、政（特区苏维埃政府）、军（军事委员会）组织，在特委之下可根据地域的宽广和需要设立分委。对于闽粤赣苏区党和红军的组成，《关于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规定“闽西东江两特委合组为闽粤赣特委，‘闽西两军东江一军合编为第六军’，并强调指出：“闽粤赣这一苏区，无论如何总要保持它与赣西南可以打成一片的联系，并且要迅速的完成这一打成一片的任务。”^①

1931年1月15日，以项英为代理书记和主席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宣告成立，并发表《中共苏区中央局通告（第一号）》，对全国六大苏区的具体范围作了明确的补充规定：“1、赣西南特区与湘鄂赣边特区为苏维埃中心区，中央临时政府建立在此区；2、湘鄂边苏维埃特区，包括鄂西、湘西北；3、鄂豫皖边特区，包括鄂东北、豫东南、皖西；4、赣闽皖边特区，包括赣东、闽北、皖赣边；5、闽粤赣边特区，包括闽西、广东东北、赣东南一部分；6、广西左右江苏维埃特区。”《中共苏区中央局通告（第一号）》不但明确地划定了闽粤赣苏区的地域范围，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431—458页。

而且也划清了闽粤赣苏区同中央苏区组成部分的赣西南苏区的区域界限问题。根据苏区中央局的划分，闽粤赣苏区的地域包括闽西的龙岩、永定、上杭、武平、连城、长汀、漳平（部分区乡）等县和闽南平和、南靖县的部分区乡，粤东北的五华、兴宁、龙川、蕉岭、平远、梅县、大埔、丰顺、饶平等县，赣东南的寻邬、安远、会昌、瑞金（部分区乡）等县。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以下两点：（1）闽粤赣苏区是当时党中央确定的全国六大苏区之一，它在当时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中有着深刻的影响和作用，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它当时并不属于中央苏区的组成部分。（2）中央苏区的范围，当时包括湘鄂赣和赣西南两大块苏区。此外，还必须说明的是，赣西南和湘鄂赣两苏区在1930年10月红一方面军打下吉安后，即已经基本连成一片，后在国民党发动的第一次“围剿”中被分割开，中央苏区的范围因此缩小到以赣西南苏区为中心，故亦称为“江西中央苏区”。

1930年10月，党中央为传达贯彻六届三中全会的决议精神，同时落实党中央对闽粤赣苏区的工作计划，建立闽粤赣苏维埃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决定派邓发（原广东省委常委，在六届三中全会上补选为中共中央委员）赴闽粤赣苏区主持工作。11月上旬和12月上旬，邓发分别在东江苏区的大南山大溪坝村和闽西苏区的龙岩主持召开东江、闽西苏区党代表会议，这两次会议统称为中共闽粤赣

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①大会在政治上传达了六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总结了闽粤赣苏区党与红军过去的斗争经验及其教训，在组织上落实了党中央关于建立闽粤赣苏维埃特区的工作计划：成立了中共闽粤赣苏区特委，归属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由邓发任特委书记，李明光任组织部长，郭滴人任宣传部长，肖向荣任秘书长，方方任职工委员会书记，李坚真任妇女委员会书记；建立了以邓发为主席的中共闽粤赣苏区军事委员会和以邓发为司令员兼政委、肖劲光为参谋长的红军闽粤赣边军区司令部；将闽西红军学校改为中国工农红军军官学校第一分校（亦称为彭杨军事学校），由肖劲光兼任校长，张鼎丞兼任政委。随后，又成立了以陈荣为书记的共青团闽粤赣省委和省总工会。根据闽粤赣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的决定，12月7日在龙岩召开了闽西、东江、赣东南苏维埃代表联席会议，选举产生了以罗寿春为主任和由11名委员（其中闽西4人、东江3人、赣东南3人、红军1人）组成的闽粤赣特区苏维埃政府筹备委员会，“负建立闽粤赣边特区苏维埃政府的重大责任”。^②中共闽粤赣苏区特委、特苏（筹）和军委等领导机关的成立，在组织上、政治上、军事上统一了闽粤赣苏区党政军的领导与指挥，标志着作为全国六大苏维埃特区之一的闽粤赣苏区的正式建立，完成了中央政治局的“苏区

^① 岱仑：《中共闽粤赣苏区党员代表大会的成功与当前的严重任务》，1931年1月21日。

^② 《闽粤赣边特区苏维埃政府筹备委员会成立宣言》，1930年12月7日。

工作计划”。

闽粤赣苏区特委成立后，原闽西、东江特委撤销，在东江苏区设立直属闽粤赣苏区特委领导的党的西南、西北分委。在闽粤赣苏区特委的统一领导下，经过1个多月的努力工作，恢复和建立了（上）杭武（平）、饶（平）（平）和（大）埔、潮（阳）澄（海）饶（平）、五（华）兴（宁）龙（川）、蕉（岭）平（远）寻（邬）、梅（县）丰（顺）等6个中心县委、县苏政府及县游击大（总）队。同时，各级党政军组织还大力配合党中央交通局，迅速开辟了由上海经香港、汕头进入闽粤赣苏区直至江西中央苏区的红色交通线，还健全了从厦门经漳州、南靖、平和进入永定的闽西南红色交通线。此外，闽粤赣苏区特委同西南、西北分委及各县委之间，也先后建立纵横交错的交通线，加强了特委同各级党组织的联系。上述这些工作的完成，进一步巩固了以闽西、粤东北为中心的闽粤赣苏区，密切了闽粤赣苏区同中央苏区的联系。

综上所述，闽粤赣苏区是党中央政治局认定的全国六大著名苏区之一，它既有广阔的连成一片的红色区域，又有统一的党政军工团领导机关，还有省地县区乡各级政权组织，是一块独立而完整的苏区。它的正式建立及其后来的斗争，对于中央苏区的巩固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三）配合红一方面军的三次反“围剿”战争

1930年12月至1931年夏秋，闽粤赣苏区的党政军民，积极地配合了红一方面军和江西中央苏区的三次大规

模反“围剿”战争，抵御并最终打破了闽粤两省国民党地方军阀的进攻，充分发挥了中央苏区后方根据地的重要作用。

闽粤赣苏区特委、军委和特苏（筹）成立之日，正值国民党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发动第一次“围剿”之时，闽西南和东江军阀张贞、香翰屏等部也积极配合，对闽粤赣苏区发动进攻。为了使闽粤赣苏区红军同中央苏区红一方面军密切配合作战，共同粉碎敌人的“围剿”，中共中央在1930年12月10日《给红军的训令》中指出：红一方面军第一、三军团“应以赣（西）南和赣东南为作战地区，而以闽粤赣（苏区）为后方根据地”；东江红十一军和闽西红新十二军“应对粤东之敌和闽南闽西之敌取积极防御，目前应尽力牵制敌人不致其进入赤区而抄袭我一、三军团之背”，同时应“巩固并扩大其作战地区的苏维埃政权”，争取闽粤赣苏区与赣西南苏区连成一片。在中央“训令”下达之前，闽粤赣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即已提出：“以闽西为阵地巩固闽粤赣苏维埃向外发展，首先冲破敌人的包围进攻，使之成为苏维埃中央（区）巩固的后方。”^①这一决定同中央“训令”的精神是一致的。

1930年12月中旬至翌年春夏，闽粤赣苏区党政军民连续进行了艰苦曲折的第一、二次反“围剿”战争，从闽

^① 岱仑：《中共闽粤赣苏区党员代表大会的成功与当前的严重任务》，1931年1月21日。

西南与粤东北两个方向迟滞和牵制了敌人对江西中央苏区的进攻，打破了闽西南军阀张贞提出的“会师汀州，围剿朱毛”的狂妄计划，配合支持了红一方面军在江西反“围剿”主战场的对敌作战。但是，由于敌我力量的极端悬殊，由于闽粤赣苏区特委在第一、二次反“围剿”战争中提出的“巩固闽西苏区，与东江苏区打成一片”和“保卫龙岗、虎岗”的战略方针不切合实际，并包涵了保守防御的错误，加上苏区内部“肃反”的严重错误，闽粤赣苏区党政军民也付出了极大代价：闽西苏区原有的红色县城及东南部的一些重要乡镇，大多被敌人攻占；东江苏区除饶和埔、蕉平寻红色区域外，其余大部分陷入敌手；红十一军余部一部分转入闽西同红新十二军汇合，另一部分在古大存等的率领下，先后撤离粤东北的八乡山，转入大南山坚持游击战争。红十一军退出八乡山后，由西北分委书记刘琴西与红十一军参谋长梁锡祐，共同在蕉平寻红色区域集中地方武装，组建了红十一军独立营，并与赣东南的红三十五军密切配合，保卫和巩固了粤赣边界的红色区域。

1931年5月底或6月初，根据党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决定，中共闽粤赣苏区特委改称为闽粤赣苏区省委，直属中共苏区中央局领导，仍由邓发任省委书记。7月间，邓发奉调去苏区中央局另行分配工作，由中央派来的卢德光接任省委书记和军委主席，罗明任省委组织部长，郭滴人任省委宣传部长，张鼎丞、李明光任省委常委，肖向荣任省委秘书长。

7月下旬，红一方面军第三次反“围剿”战争开始后，改组后的闽粤赣省委、军委和军区司令部，总结了第一、二次反“围剿”战争的经验教训，并根据红一方面军于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在闽西北地区开辟大片新苏区的有利形势，确定了“向北发展”、“争取与中央苏区打成一片”的战略方针。^①实践证明这一方针是正确的。8月间，红军新十二军、虎岗警卫营和军事学校学员，在永定、上杭交界地区接连取得了芦丰、蓝家渡等战斗的胜利，击溃了国民党钟绍葵主力及反动民团邱弼琴等部共1000余人。9月上旬，红军新十二军等部队经上杭白砂北上连城、长汀，又接连在朋口、钟屋村歼灭国民党卢新铭旅马鸿兴团和反动民团数百人，缴枪数百支，并于9月11日乘胜克复汀州。9月中下旬，新十二军转向汀、连交界处发展游击战争，在恢复和巩固闽西老苏区的基础上，打通了同闽西北新苏区的联系。同一期间，东江蕉平寻苏区的红十一军独立营，配合红三军团第七军胜利克复寻邬县城，并扩编为独立团，共1000余人。独立团接着又向安远发展，恢复和巩固了粤东北和赣东南的部分老苏区，并打通了同赣西南苏区的联系。

9月中旬，红一方面军取得第三次反“围剿”战争的重大胜利后，主力转向闽赣南部边界进军。10月上旬，红一军团第十二军进入汀州与红军新十二军胜利会师。接着，新老十二军奉命合编为红一军团第十二军，由罗炳辉任军长，

^① 肖劲光：《闽西军事斗争的回顾》，载1987年8月6日《人民日报》。

谭震林任政委，谭政任政治部主任，肖劲光任参谋长。闽粤赣省委等机关移驻汀州后不久，原省委书记卢德光携带公款叛逃，由罗明接任省委书记兼宣传部长，李明光任组织部长。

闽粤赣苏区党政军民第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红军新老十二军在汀州的胜利会师，为今后闽粤赣苏区巩固发展成为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奠都瑞金创造了条件。

（四）苏区内部“肃反”的严重错误及其纠正

红军三次反“围剿”战争期间，闽粤赣苏区内部相继发生以肃清所谓“社会民主党”和“AB团”为中心的“肃反”运动。当时，酿成苏区内部“肃反”严重错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导致了闽粤赣苏区红军军事上的失利，红军部队中出现了不少战士离队逃跑现象，地方干部和群众中产生了悲观失望情绪。对此，闽粤赣苏区特委主要负责人邓发，不是通过彻底纠正“左”倾错误加以正确引导和解决，而是对基层党、政、军领导干部加以指责，缺乏政治上的信任。

第二，国民党军队发动第一次“围剿”之后步步深入闽粤赣苏区，苏区内部的地主豪绅残余势力乘机破坏捣乱，革命队伍中出现少数投机分子的叛变投敌。为保卫苏区，闽粤赣苏区特委决定在苏区内部开展肃清反革命的工作，这在当时是有必要的。但是，特委主要负责人邓发，在

“左”倾思想指导下，混淆敌我界线，不加分析地把革命队伍内部的思想问题同对敌斗争的政治立场问题等同起来，把干部群众中出现的不良行为和思想混乱，全部归咎于地主、豪绅、阶级异己分子混进我党政军组织的破坏，特别是把它同国内和国际上的“AB团”、“改组派”、“社会民主党”等政治派别的活动相联系。同时，邓发在肃反工作中又偏听偏信于肃反委员会负责人、道德品质极端恶劣的林一株，并放任逼、供、信错误。^①这些指导思想和政策、方法及用人上的错误，使闽粤赣苏区内的肃“社会民主党”、“AB团”运动愈演愈烈。

第三，闽粤赣苏区特委在处理原中共闽西特委委员傅柏翠问题上的错误。在闽粤赣苏区特委成立前，傅柏翠与闽西特委领导人之间存在着某些意见分歧而受到批判，傅固执己见，以致在组织上行动上日渐不服从闽西特委的领导和决定。因此，闽粤赣苏区特委成立后，先是宣布开除傅柏翠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接着又主观臆断地判定傅柏翠是所谓闽西“社会民主党”派别组织的头子，并派出红军部队到古田、蛟洋搜捕傅柏翠等人。傅柏翠被迫拥兵自卫，造成公开分裂局势。傅柏翠虽然有缺点错误，如他在分配土地问题上提出“共耕”主张和平时表现出来的个人主义、地方观念等，但是，闽粤赣苏区特委在处理

^① 《邓发同志在闽西党史座谈会上的发言记录》，1945年2月23日于延安。

傅柏翠问题时，却把党内意见分歧和思想问题当作敌我矛盾加以处理，把不应当激化的矛盾激化了，因而进一步加深了“肃反”运动的错误。

第四，王明“左”倾错误统治下的党中央，对闽粤赣苏区“肃反”工作的错误指导。1931年3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中央代表团成员到达永定虎岗，闽粤赣苏区特委在虎岗召开特委扩大会议（即虎岗会议），传达贯彻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王明“左”倾决议，确定“肃反”是苏区党的中心任务之一。4月4日《中央给闽粤赣特委信》中又指示说：“敌人积极从各方面来向苏区红军进攻，普遍的白色恐怖，积极的打入到党的组织内和红军中来从事破坏，闽西的所谓社会民主党、江西的AB团及其他地方的改组派等等，从蒋介石到傅柏翠都有整个联系和计划……必须肃清内部的——红军中、政府中、党部中的一切反革命分子，站在阶级立场上以最严厉的手段来镇压。”“虎岗会议”的召开与党中央指示信传达到闽粤赣苏区后，苏区内部的“肃反”运动迅速升级。

第五，受当时赣西南苏区内部肃“AB团”运动的影响。

闽粤赣苏区内部的肃“社会民主党”和“AB团”运动从1930年12月开始，先后持续了1年左右时间，酿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极大地摧残了苏区的党、团组织和红军的力量，使一大批苏区干部和革命群众蒙受冤屈。

1931年7月，对闽粤赣苏区内部“肃反”严重错误负有不可推诿责任的邓发调离闽西后，闽粤赣苏区省委于8

月间采取果断措施，首先处决了在“肃反”工作中乱捕乱杀、品质恶劣和民愤极大的肃反委员会负责人林一株，苏区内部“肃反”工作中的严重错误从此开始得到纠正。同年11月，张鼎丞、郭滴人等在瑞金出席全国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期间，向毛泽东和苏区中央局汇报了闽粤赣苏区的各项工作，特别是“肃反”工作中的错误做法，毛泽东指示必须进一步纠正这一错误，并拨给5000元银元作善后救济费。张鼎丞等返回汀州后，遵照毛泽东的指示，进一步纠正了“肃反”工作中的错误，使苏区的各项日常工作走上正轨。

1932年1月，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在瑞金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讨论和检查了苏区肃反工作的历史与现状，作出了《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严肃批评了苏区“肃反”工作中的严重错误。至此，闽粤赣苏区和整个中央苏区“肃反”工作中的严重错误才基本得到纠正。对于闽粤赣苏区内部“肃反”的严重错误及其沉痛的历史教训，当事人邓发在延安整风期间曾作了检查与总结，并承担了自己应负的责任。^①

三、闽粤赣边革命根据地巩固发展成为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党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将闽粤赣苏区划入中央苏区

^① 《邓发同志在闽西党史座谈会上的发言记录》，1945年2月23日于延安。

的战略决策与军事部署范围

在红军取得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的形势下，恢复和巩固发展闽粤赣苏区，使之同中央苏区连成一片，由原来中央苏区的后方根据地变为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是当时革命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为此，闽粤赣苏区省委、苏区中央局和党中央及时作出新的战略决策及军事上的部署。

1931年11月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通过的《政治决议案》中，就苏维埃根据地问题作出决定：“赣东南苏区是中央苏区的主要根据地，这根据地应当伴着闽西苏区和河（赣江）西与湘东南苏区，而把这些苏区打成一片，建立起更广大的根据地。”《政治决议案》还指出：“中央（苏）区的根据地还是很流动的，与闽西苏区只在最近才能贯通，与河西苏区仍是隔离的。”为建立起巩固与固定的中央苏区，《政治决议案》强调：“中央（苏）区与闽西的联系必须巩固，中央区与湘赣苏区以及赣南的零星苏区必须于最短时间内贯通。”同年12月4日，《中央给各苏区中央分局省委及红军各军政治委员的训令》中进一步指出：“目前红军行动的总方向应该首先是使中央区（闽西在内）^①与湘赣边苏区完成一片，巩固赣南根据地”；“中央区应以红军主力军配合群众行动向西进攻……对赣南（寻邬、崇义、安远、信丰、南康、大庾、上犹、孝悌等

^① 括号里内容为原文。

县)① 闽西北(清流、宁化、归化等县)②应发展广大的游击运动与土地革命,阻滞敌人,巩固后方与扩大苏区。对于闽粤赣及湘鄂赣两苏区要保持绝对的联络。”《训令》接着指出:“闽粤赣(苏区):在中央区的帮助之下,首先取得永定、上杭、武平,恢复龙岩、大埔苏区,巩固的向闽北发展。应设法帮助(闽南)漳浦的游击队壮大起来……恢复和发展韩江上游的根据地,与闽粤赣和中央苏区联系起来。”

综上所述,苏区中央局和党中央先是把原闽粤赣苏区所属的赣东南划入中央苏区,接着又把闽西及整个闽粤赣苏区划入中央苏区,并为实现这一计划确定了具体的军事行动方针。

(二)闽粤赣苏区同中央苏区巩固连成一片及其全盛局面的开创

1931年11月至12月间,遵照苏区中央局和党中央的战略决策与军事行动方针,由新老十二军合编而成的红十二军,积极向连城、宁化、清流发展游击战争,全歼了国民党卢新铭旅的易启文团,扫清了地方上的反动民团,接连解放了连城县城和汀、连、宁交界的广大地区,使闽西苏区与红一方面军在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新开辟的建宁、泰宁、清流、宁化、归化等闽西北红色区域连成一片。与此同时,红一、三军团也奉命在闽赣、粤赣边界广大地

①②括号里的内容为原文。

区分兵发动进攻，先后展开于宁都、石城、长汀、瑞金、会昌、安远、武平、寻邬、信丰各县，消灭国民党地方反动武装，扫除白色据点，贯通各红色县、区、乡的联系；蕉平寻苏区的红军独立团也游击于粤赣边，局部地恢复和巩固了粤东北及寻邬南部苏区，并与赣东南苏区连成一片。同年冬，该团编入赣南红军独立第三师，归红三军团领导。此时，苏区中央局指派原东江西北分委及红军独立团领导人梁锡枯、陈锦华、罗屏汉、罗文彩等 10 余人分别担任会昌、安远、寻邬县委与县苏领导人。

1932 年春，在闽西的红十二军奉命从汀、连地区转兵向南发展，直指杭、武、永、岩地区，于 2 月 20 日、23 日接连消灭敌钟绍葵主力，胜利克复武平、上杭县城和杭武两县老苏区，国民党张贞第四十九师退守到龙岩、永定县城及湖雷、坎市至龙岩一线。至此，闽粤赣苏区经过短短几个月的恢复巩固之后，已经同江西中央苏区巩固地连成一片，成为中央苏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此，早先由赣西南和湘鄂赣苏区组成的、不稳定的与流动的中央苏区，即发展成为由赣西南和闽粤赣苏区组成的、稳定与巩固的、全国最大的、在土地革命战争中起了最重要作用的中央革命根据地。

1932 年春夏，伴随着中央主力红军在闽西、闽南的胜利进军与转战赣粤边区，作为中央苏区重要组成部分的闽粤赣苏区，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恢复发展阶段，出现了全盛的局面。3 月中旬，红一方面军撤兵赣州后，由红一、五军

团组成的东路军，在毛泽东等同志的率领下，由赣南挥师东进，向闽西、闽南发展。在闽粤赣苏区党政军民的密切配合下，红军东路军于4月10日首战考塘，克复龙岩，消灭守敌四十九师杨逢年旅之一部。接着以破竹之势向闽南推进，于4月19日在南靖天宝山、靖城一带歼灭了张贞四十九师主力，翌日攻克闽南重镇漳州，终于实现了1930年3月18日《前委通告第三号》中提出的“稍远的将来我们可以取得漳州，使红色区域直通海口”的战略目标。从4月下旬至5月底，东路军所属部队在闽南各县分兵，接连解放了漳浦、南靖、平和、长泰、石码、海澄等城镇和广大农村，建立了地方红色政权和以王占春为主席的闽南工农革命委员会，还帮助建立了闽南红军独立第三团，共1000多人。与此同时，留在闽西的红十二军，也乘胜收复了永定县城和坎市、龙潭等要镇，并进而向永、和、埔、饶等县边境发展，恢复了饶、和、埔、永老苏区。尔后，红十二军又转向杭、武、蕉等县发展。6月初，红军东路军和红十二军奉命回师赣南会昌、安远休整。接着于6月下旬至7月上旬在著名的水口战役中，击溃粤军20个团，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闽粤赣边界三角地区的红色区域。

中央主力红军向闽西、闽南和闽粤、赣粤边地区的胜利进军，不但全面恢复了闽西和闽粤、赣粤边的老苏区，而且新开辟了闽西至闽南地区的大片红色区域和游击区，开创了闽粤赣边区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同时，中央红军还在闽南地区筹集了大批经费和物资，为以后进行的第四

次反“围剿”战争准备了物质基础。

（三）闽粤赣苏区第二次党代表大会的召开，福建省苏和粤赣省委、省苏的成立

在闽粤赣苏区迅速恢复发展并成为中央苏区重要组成部分的新形势下，根据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决定，1932年3月上旬至中旬，闽粤赣苏区省委在汀州召开闽粤赣苏区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任弼时代表苏区中央局出席了大会，他在大会上传达了苏区中央局的有关决议并作了政治报告，罗明代表省委在大会上作了一年多来的工作总结和今后任务的报告。大会讨论通过了《目前政治形势与闽粤赣苏区党的任务决议》、《关于党的建设问题决议》、《关于苏维埃工作决议》等。这些决议总结了1930年12月闽粤赣苏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以来，苏区党在武装斗争、红军建设、土地革命、政权建设、党组织建设中的成绩与经验教训，并提出了闽粤赣苏区党今后的斗争方针和任务。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共闽粤赣省委领导机关，以罗明、张鼎丞、谭震林、李明光、郭滴人为省委常委，罗明任省委代理书记，肖向荣任省委秘书长（后为李沛群）。此外，大会还遵照苏区中央局的决定，将闽粤赣省委改为福建省委。但是，在闽粤赣苏区党的“二大”之后，仍继续沿用闽粤赣省委的名称，闽粤赣团省委亦然。

在闽粤赣省委的领导下，3月18日在汀州隆重召开福建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大会接受了“全苏大会”的决议和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指示，并以发展革命战争为

中心议题，先后通过了土地、劳动、军事、财政、经济、苏维埃建设等问题决议案。大会选举张鼎丞等 35 人为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张鼎丞、阙继明、张思垣、范乐春、李六如、郭滴人、钟显光、张华先、谭震林等 9 人为主席团，张鼎丞为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

在福建省苏成立之前的 1932 年 2 月 20 日，已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在汀州成立了以罗炳辉为总指挥、谭震林为政委的红军福建军区指挥部，直接受中革军委领导。在闽粤赣苏区同中央苏区巩固连成一片的大好形势下，闽西地方红军迅速发展，先后建立了红军独立第八、九、十师，这三个师后来又合编为正规红军第十九军，由叶剑英任军长，杨尚昆任政委。

闽粤赣苏区党的“二大”后，该苏区原来的党政军和共青团、工会等组织，分别划入当时中央苏区所属的江西、福建两省的组织系统之中。到 1933 年间，中央苏区又增设闽赣、粤赣两个省。4 月，成立了以张云逸为司令员的红军粤赣军区总指挥部；8 月，又成立了以刘晓为书记的中共粤赣省委和以钟世斌为主席的粤赣省临时苏维埃政府。同年 12 月，在会昌县城召开粤赣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以钟世斌为主席的粤赣省苏维埃政府。粤赣省下辖赣东南的于都、会昌、西江、门岭、寻邬、安远、信康 7 县，以及闽西武平和粤东北的兴宁、龙川等县部分地区。

(四) 闽粤赣苏区的经济文化建设

在闽粤赣苏区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为了战胜国民党的大规模军事“围剿”和严密的经济封锁，苏区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十分重视根据地的经济文化建设，认真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提出的苏区经济文化建设的方针政策，积极领导苏区军民进行各种可能的经济文化建设，保证军需民用，改善和提高军民物质文化生活。

在恢复发展农业生产方面，主要措施是：1、开展互助合作运动，调剂农村劳动力。通过组织耕田队、劳动互助社、犁牛合作社的办法，有效地克服了苏区内部普遍存在的缺乏劳动力、耕牛、耕具等困难问题。2、实行奖励开荒和兴修水利。3、发挥妇女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作用。4、实行干部参加劳动。5、武装保卫春耕、夏收和秋收。此外，各级苏维埃政府还通过组织农民积肥、造肥，改良土壤；植树造林，保护山林；开办农事试验场、研究会，推广先进技术和优良品种；发挥苏维埃银行和信贷作用；扩大农具和肥料生产供应；做好农副产品收购；组织劳动竞赛、表彰先进等等措施，促进了苏区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

在发展地方工业生产方面，一方面配合主力红军的后勤部门，利用缴获敌人的各种设备，建立军需工业，如：枪械修造厂、红军被服厂、中华织布厂、印刷厂、红军斗笠厂、铁厂、铸币厂等等。另一方面发动群众，因陋就简，充分利用各地自然条件，发展民用工业，如造纸、刨烟、印刷、织布、开采钨砂、炼铁、铸锅、烧石灰、烧木炭、挖

煤、农具制造、熬硝盐、煎樟油、制药、制陶、编草席、编竹器、制木器、做纸伞等 20 多种手工业生产，还建立群众性的生产合作社。再一方面就是保护和扶持个体手工业。

在发展商业和对外贸易方面，一方面建立公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其种类主要有：公营商店、药店、饭店、商业公司；粮食调剂局；对外贸易局等。另一方面实行保护商人贸易的政策，确保红白区域的商品流通。再一方面是通过境内的汀江、韩江沿岸的汀州、上杭、永定、大埔、兴宁等重要商口，积极开展对外贸易，输出苏区的土特产和矿产，运入苏区军民急需的工业品、食盐、布匹、西药、军用器材等。东江苏区还与商人订合同，沟通与香港等地的贸易。

在财政金融方面，建立了苏区银行，如闽西工农银行。它对于发展闽粤赣苏区乃至整个中央苏区的工农业生产和商品流通起了重要作用。

在文化建设方面，苏区政府除注重对干部进行马列主义政治理论教育外，也十分重视普及苏区工农群众的文化教育，创办各种形式的学校，大力扫除文盲。在县、区、乡苏维埃政府之下均设立文化委员会，负责领导群众的普通教育（包括儿童、青年、成年教育等）、社会教育（包括俱乐部、阅览室等）和编辑、出版事业等。此外，为丰富苏区军民的文化生活，在乡村中设立列宁室，组织群众读报、唱革命山歌；在县、区成立工农剧社，编演话剧、歌舞剧、活报剧等。

闽粤赣苏区的经济文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闽粤赣苏区省委所在地汀州，成了当时全国各苏区中经济最繁荣的县城。1931年12月25日周恩来在汀州写给中央政治局的信中赞扬说：“汀州的繁盛，简直为全国苏区之冠，中央（苏）区虽有9个城市，但无有如汀州的，其他苏区尚无固定城市。”

闽粤赣苏区自1930年6月基本形成，到1932年3月与中央苏区巩固连成一片，先后经历了近两年的斗争岁月，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史中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主要表现在：

第一，闽粤赣苏区是在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和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的直接指导下建立发展起来的，它在武装斗争、土地革命、红色政权建设、党与红军的建设、苏区经济建设等方面的成功经验，在土地革命战争开始的头几年中，直接或间接地指导、帮助了其它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

第二，闽粤赣苏区的建立、巩固、发展和工农武装力量的成长、壮大，为红一方面军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闽粤赣苏区在创立与发展过程中，先后建立了红四军第四纵队、红六军（后为红三军）、红十二军、红二十军、红十一军、红二十一军、红军新十二军、红十九军等正规红军和许多地方红军独立师、团，这些红军部队都先后大部分编入红一方面军建制，成为红一方面军的主力部队之一。

第三，闽粤赣苏区在成为中央苏区重要组成部分之前，在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中，从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交通上密切配合了红一方面军在反“围剿”主战场的对敌作战，既与中央苏区相互依存，又充分发挥了中央苏区后方根据地的作用，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奠都瑞金作出了重要贡献。闽粤赣苏区成为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后，使中央苏区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农村根据地，成为中国共产党坚持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最重要的战略基地。

第四，闽粤赣苏区为中国共产党锻炼、造就了一大批既敢于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又能理论联系实际和善于治党、治军、治国的优秀骨干力量。他们大都是在毛泽东、朱德的领导下，经过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实践斗争锻炼和考验的优秀分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方针政策对他们有着深刻的影响。因此，1933年初，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中共临时中央机关及其主要负责人博古等从上海迁到瑞金后，以罗明、张鼎丞、谭震林等为领导的闽粤赣省委、福建省苏和福建军区的多数领导人，还有下属党政军机关的领导人，对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方针政策，一般都采取怀疑和抵制的态度。他们虽然被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诬陷为“罗明路线”，但对党对革命始终坚贞不移。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后，他们有的参加长征到达陕北，后来成为八路军和北方各抗日根据地的重要领导人；有的留在南方坚持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后来成

为新四军和南方抗日根据地的重要领导人；有的则长期坚持闽粤赣边区的革命斗争，直至全国解放。闽粤赣边区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重要战略基地之一，其光辉业绩将永载史册。

（执笔 林天乙 责任编辑 邢济萍）

五大至六大期间东北三省 党的组织状况

赵 朴

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东北三省党的组织有哈尔滨地委、长春特支、奉天（即沈阳）特支和大连地委等。其中大连地委之下仅大连一地就有党员 300 余人；哈尔滨地委下有党员 130 余人（哈尔滨市区内有工人党员约 20 余人）。哈尔滨党的支部组织与工作比较健全，学生支部的工作实际上代替了学委的工作。

1927 年 4 月末 5 月初，哈尔滨党和青年团地委遭到了破坏，被捕去 20 余人，党和青年团之重要负责人高洪光（哈尔滨地委组织部）、安贫（哈尔滨地委委员）、吴晓天（青年团地委书记）、韩心平（青年团地委委员、工人运动负责人）、高洁心（党地委学委负责人）、吴宝祥（党地委军委委员、警察支部书记）、王寒生（地委军运委员、吉林执委）、金永绪（交通员）、吴雅泉、蒋文周（工人支部书记）等都被捕去。事变发生后，哈尔滨地委在决定恢复支部活动的同时，决定：将表现动摇的、一向不努力工作的党员暗中开除；对支部进行改组，将原来五六人或七八人

的支部，划分成三个人、最多四个人一个支部，以便于开会和进行其它活动。为了地委工作能继续进行和加强，地委决定将原在青年团工作的苏子元补为地委委员，由长春调来吕一之任青年团地委临时书记。

党的五次大会之后，5月18日，在蔡和森主持下，中央常委召集邓鹤皋、尹才一、关向应、陈日新、穆景周、曲文秀等开会讨论东北三省工作。蔡和森分析了东北三省的形势和任务，提出：大连地委和哈尔滨地委应当改组为市委，奉天（沈阳）也应成立市委，东北三省并应成立省委。吉林方面有支部属奉天，看发展情况再作决定。5月19日中央常委决定：先调邓鹤皋、尹才一到奉天，省委筹备委员会书记由邓鹤皋担任。

“八七”中央紧急会议之后，中央决定建立北方局的同时，决定成立满洲临时省委归北方局管理。北方局成立后，9月下旬在改组顺直省委的同时，决定派陈为人去满洲省委工作。

10月14日，陈为人到达沈阳。此时东北三省党的组织与中央断绝关系已近半年，有300多党员的大连党组织已经瓦解；沈阳原有90多个党员，已只剩了30余人；吉林、长春的组织已经停顿；哈尔滨的党组织由原来的130多个党员，减少到了30余人。另一方面，各地组织不统一，奉天外县的特别支部与党断绝关系已近五六个月。在这种情况下，陈为人几经筹划和商谈，于10月24日召集起哈尔滨、长春、吉林、沈阳、大连等地比较活动的分子共14人

开了一个省委扩大会议，产生了满洲临时省委，正式执委 3 人为陈为人、吴灵生和一个印刷工人（可能是王力功），候补执委 2 人（不详）；并举出监察委员 3 人，候补监委 2 人（均不详）。监察委员 3 人均为大连、长春、哈尔滨的工人同志，候补执委与候补监委除一人为青年团临时省委书记之外，亦均为工人。满洲临时省委成立后，即派人分头恢复了哈尔滨、长春、吉林、沈阳、大连等各地的党组织。

中央临时政治局 11 月扩大会议之后，11 月 17 日的中央常委会议上，曾有调彭述之任省委书记、肖子暉任宣传去满洲工作之议，但均未实行。12 月 4 日，中央关于东北工作曾经指示：“东三省目前任务是急须恢复党的组织，在奉天、长春、大连及各铁路各矿山开始建立工会运动的工作及基础，农民运动亦应开始注意。”

12 月中旬，陈为人到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并请求指示。据陈为人的报告，到这时为止，满洲党的组织状况如下：哈尔滨成立了市委，兼管中东路沿线各地工作，共有支部 10 余个，党员 70 人。长春和吉林已成立一个区委，共有 4 个支部，党员 19 人；党员对工作负责而且积极，因之虽然人数不多；但在工人中有相当作用。沈阳已在省临委之下建立了区委，有 10 个支部，党员××人，除一两个工人外，均为知识分子与店员。奉天的外县，已有 5 个县建立了党的支部，党员共计 28 人，大多数为小学教师与校长，均已与省临委建立了关系。大连已成立市委，有 4 个支部，党员共 17 人，成分大部分是工人，小部分是店员，都是青

年。此外旅顺已建立了党的支部，金州已有了党员。以上南满、北满合计共有党员 173 人，成分：过半数是知识分子，余均为工人，没有农民党员。陈为人在报告中要求中央：将东北籍的以前在黄埔军校、农民运动讲习所以及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的党员“概行调查清楚调到满洲工作”，以适应开展东北三省工作之需要。此外，陈为人还在报告中请求中央与满洲建立直接的交通关系，以便东北三省的工作能及时得到中央的指示与帮助。

中央在审议了陈为人的上述报告之后，于 12 月 24 日通过了一个《满洲目前工作计划决议案》。决议认为：“我党之在满洲，至今同志才 170 多人，而这 170 余同志，又复散在北满、南满各地。在党的组织上，尚在原始无基础之中；……在党的工作上，尚在未打进群众与领导群众爆发群众作过任何大的斗争和党员毫无革命工作经验的状况之中。”根据这种分析和认识，关于党的组织工作，决议首先提出：对“170 余同志的训练教育工作特别重要，因为满洲的工作一发展，此 170 余同志必将变为满洲党内的各级干部人才。”其次，决议强调：“发展工厂支部与农村支部军队中的支部，这是唯一扩大党与深入群众的基本组织的工作，我们的同志应时时刻刻在各地用全力执行此项工作，并具体的规定各地同志每周每月发展此项组织的数量、对象与方法。”关于满洲临委本身，决议规定：“满洲省临委在目前应即扩大组织，举出 7 人的委员会，3 人的常委会，去分别执行工作。”决议还指出：为“使党的工作不致停顿

与散漫”，各地党部在“随时查出有不力的负责同志与新活动分子时，立即改组。”中央的决议还强调：应纠正党员“不到会不缴纳党费的坏习惯”，加强党的秘密工作以防止敌人的摧残与破坏；指出这些“是组织任务之一”。关于党的组织形式，中央在决议中指示：“哈尔滨因要兼指挥中东沿路的工作，应即改为县委。长春因要兼指挥吉长沿路、中东路、吉林省城等地的工作，亦应即改为县委。大连要兼指挥关东州的工作，亦应即改为县委。”为要加强职工运动工作的指导，决议要求“哈尔滨、长春、奉天、大连都可设立职工运动委员会，此等委员会应以工人同志占大多数”。关于农民运动，决议要求致力于牡丹江、沈辽、关东州、柳河以及与热河蒙古接近的地区等5个区域，并注意发展党的组织。“为了提高一切工作之速度起见”，决议要求对北满、南满与奉天各县，“经常的派出巡视员往来各地巡回工作指导工作”。

陈为人由上海回到沈阳后，经过省临委讨论决定，1月上旬派出3个巡视员分赴北满、南满巡视各地并指导工作，并督令各地从支部起以至县委进行改组。另一方面，着手办了每期七八人、时间半个月的训练班培训干部人才。与此同时，计划在阴历正月初五以前将各地党组织改组完竣，初十以前召集省的代表会议改组省委。1月16日，满洲临委就以上问题向中央写了报告，并说明省临委决定每月月底专派一人到上海送报告、取文件和经费。中央收到上述报告后，于1月27日复信给满洲临时省委称：“满洲省代

表会必须在各县各区各支部经过中央决定的改组方法改组完竣后才可以开”；如果在阴历正月初十以前即举行省代表会议改组省委，时间仅“二十日之谱”，“必不能切实执行改造各级党部的工作”而成为“草率的改组，失掉了改组党部的意义”。因此，中央要求满洲临委“不必急急于省代表会议之召集，应尽可能的切实的彻底的将下级党部改造好”，然后再开省的代表会议。关于交通问题，中央在信中答复说：“中央有交通由津转大连来取文件，临委文件可留在大连，不必每月专门派一交通来。”

1928年1月29日，满洲临时省委召开了全满代表会议，每30名党员选举代表1人，计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代表9人，仅有发言权的代表5人。会议议程是：（一）中央扩大会议决议报告和讨论；（二）满洲临委工作报告和讨论；（三）中央对满洲工作计划的报告和讨论；（四）改组省委。会议选出了执行委员7人，候补执委3人。10人中，工人同志占6人，由陈为人、王力功和×××组成省临委的常委。到这次会议时，满洲党出现了如下的新情况：知识分子脱党的多，工人入党的多，农民则开始加入。据不完全的统计，此时满洲党员已由173人增加到250人。成分如下：工人占70%，知识分子与自由职业者占30%弱，真正的农民党员仅有6人。党的组织计有3个县委即：哈尔滨、长春、大连；1个特委即东边道特委（亦称东南特委）；3个特别支部。在代表会议召开的前后，满洲临委开办了三期特别训练班，讲授了马列主义概论、中国革命问

题、中央新政策新决议、党的组织工作以及工农运动等课程；到2月中旬，经过训练的24人已分别调往各地担任工农运动与党务的指导工作。

2月中旬，陈为人再一次到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于2月20日向中央写了书面报告。中央审查了陈为人的报告之后，于2月22日发出了中央致满洲临委信。中央首先表示：“临委代表大会举出之正式执委7人，候补3人，批准。”中央指示：“满洲临委政策的主要精神应当是深入到广大的工农群众中去艰苦的领导他们作各种迫切的经济斗争，发动成为群众的组织，发展党的组织，成为群众的政党”；要以“艰苦的有耐性的工作发展党的组织，发展群众的秘密组织。”

2月29日，满洲临委通过了一个《东边道工作决议案》，决定：“为东边道工作急迫而且重要，特成立特委，指导农运、匪运、发展党的各种工作。（二）极力发展农村支部，对于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入党要放任的方法，对于胡匪、小商人及其他分子要严格的方法，……（三）胡匪里要建设支部，对于这种工作，要注意下列几点：（1）最初党的组织绝对秘密；（2）吸收匪中大多数贫民参加；（3）对于极少数较好的土匪首领要相当慎密的吸收。”与此同时，满洲临委还决定了一个《满洲东南特委工作计划》。计划认为“主观力量之整備成为目前工作之唯一任务”，并规定：“发展党的工作”的对象，主要是“农民、路工、苦力或一部分能成为农民助力的会匪或知识分子”。计划要求在两个

主要县份召集原有知识分子同志开训练班，然后即派出去任特派员，担负发展支部的任务；在春耕前：一个县要建立6个支部，另一个县要建立5个支部，同时设法在此二县的临近各县找线索做发展党的工作。计划还规定：“特委的机关暂为各地特派员的接头机关”；省委与特委应“极力避免”在此机关内“接头和集会”；要建立好省委与特委、特委与各地特派员的交通关系。

3月3日，满洲临委常委通过了一个《最近三个月工作计划决议案》。关于发展党的组织，决议要求在三个月内“至少限度须发展二倍以上：京奉路、奉海路须成立5个以上农村支部，东边道沈（阳）、辽（阳）二地各须成立5个农村支部与各有农民同志50人，关东州须成立3个以上农村支部各有农民同志30人，哈尔滨、大连、奉天三处各须发展50人以上的工人同志。”在作出上述计划的同时，满洲临委认为：“满洲工农自发斗争的开展”，要求“党必须加紧更艰苦的在群众中建树党的组织以取得群众的领导”；但是，满洲党组织的“基础太弱，现在的组织还说不上一个小团体，一般组织的形式可以说是个人友谊的结合，党的教育指导工作方法，也是一种朋友的谈话、通信而已。因此，临委对各种工作计划几乎是无从说起。”根据这种认识，满洲临委提出：“（一）注意向产业工人中发展组织，建立产业支部；（二）注意奉天、哈尔滨、抚顺、大连几个中心区域；（三）加紧党的训练，特别注意培养下级干部分子。”

大约是1928年3月中旬，满洲临委又召开了一次扩大

会议。会议原拟讨论中央2月22日关于满洲临委工作方针问题的批评与指示，然而因为会前收到了中央调临深到南方工作的命令，会议遂主要讨论了补充省委常委和批评省委工作的错误。会议认为满洲临委常委有改组的必要，并一致赞成和推选得力的工人分子汤洪景（唐宏经）为省临委常务委员；原常务委员王力功因肺病太重，短期中不能工作，会议同意其暂时退出常委休养；会议仍将原常务委员临深、叟信选入常委。常委3人的分工如下：书记、军事——叟信，组织、职工运动——唐宏经，宣传、农民运动——临深。对于中央拟调临深回南方工作，一面表示“下级机关自应服从”，另一方面扩大会议经过讨论，皆同意留临深继续在满洲工作，要求中央再作核夺。会后，满洲临委于3月21日将上述改组情况向中央作了报告。报告同时对中央2月22日关于满洲暴动问题的指示信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并“请中央千万不要误会我们是忘了和不注意党的中心工作——即党的建立的工作，而只梦想凭空暴动或玩弄暴动，我们整个的意见是要迅速努力建立党在各重要工业区各农村各军队中的支部”。一个月之后即4月末，临委一名常委被派南下。

中央收到满洲临委的上述报告之后，本拟很快答复，但因为中央一个机关遭到破坏，罗亦农被捕遇难以及各种应变和善后处理等工作，直到5月1日才发出了给满洲临委的指示信。中央在信中再次指出：目前满洲的工作方针，最主要的还是很艰苦的开始做工农运动的基本工作，从领导

工农日常的细小斗争中来创造一个工农运动的基础，“从斗争中来改造并发展党的组织”。

满洲临委扩大会后，继长春、吉林党的组织于2月间被破坏，关东州的党组织于5月间也遭到破坏。另一方面，5月下旬又有一位常委（可能是唐宏经）被派去参加党的六次大会，其他4个执委：一人调任东南特委书记，一人任哈尔滨县委书记于县委改组后失踪，王力功病势沉重不能工作，张任光也去出席党的六次大会。种种原因，致使党的发展尚赶不上减少：3月间统计东北三省共有党员250余人，4月初哈尔滨由原来的近百名党员减至40余人。稍后，计哈尔滨淘汰了60多个党员，奉天淘汰了20多人，长春、吉林遭到破坏后被捕和逃亡的党员有24人，其他各地共淘汰了约30余人，总计全省淘汰了190多个党员。7月下旬统计全省党员为180余人，大多是新发展的。

（责任编辑 刘昌亮）

更 正

《中共党史资料》39辑第94页倒数第14行“在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下”应为“在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下”；第130页倒数第4行“谢峰”应为“解峰”，特此更正。

《中共党史资料》(1—40辑)

目录索引^①

发刊词 廖盖隆 (1·1)

文 献

关于一大的回忆

——董必武给何叔衡的信 (3·1)

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及大会后的一些情况

——张国焘给威金斯基、穆辛的信 (3·3)

关于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彭述之给中共旅莫支部全体同志的信 (3·16)

关于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团的第三次全

国代表大会 (3·23)

——张伯简给东方大学同志的信

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

报告 (3·26)

陈潭秋在庆祝党的十五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3·60)

陆定一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① 索引分类文章按发表先后顺序排列；标题后面括号内中圆点前数字代表辑号，后数字代表页数。

的发言	(3 · 66)
答薛暮桥同志	刘少奇 (4 · 1)
关于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及内战时期白区工作问题	
——薛暮桥同志给少奇同志写的报告	(4 · 7)
黄安县委关于黄麻暴动经过情形给中央的报告	(4 · 189)
把知识和经验留给后代	周恩来 (5 · 1)
(乙)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	陈 云 (6 · 1)
陈云同志对《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	
的调查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批复	(6 · 13)
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	
.....	(6 · 35)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	
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	(6 · 55)
忆友人詹大悲	董必武 (7 · 1)
邓小平同志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的讲话	(8 · 1)
杨尚昆同志答复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信	(8 · 11)
陆定一同志向共青团中央报告广州暴动的经过	
及广州共青团在暴动中的工作	(9 · 1)
关于《辽沈决战》一书的谈话	陈 云 (10 · 1)
彭德怀同志对美军视察组的谈话	(11 · 1)
刘伯坚致季振同、赵博生、山宇、董振堂信	(11 · 255)
刘伯坚致季振同、董振堂、赵博生信	(11 · 258)
红十二师陈光、赐凡的一封信	(11 · 261)
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宣言	(11 · 263)
二十六路军革命士兵委员会敬告全国士兵兄弟书	
.....	(11 · 268)

-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红军总司令朱德、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为孙连仲部二十六路军兵士投入红军告全国兵士书 (11·276)
- 中央苏区红五军团全体战士答复反革命军阀孙连仲、高树勋并告全国工农兵 (11·279)
- 中革军委关于调送一批本地战士给五军团的命令 (11·284)
- 军委总政治部关于一、三、五军团分编问题给各级政治委员的指示信 (11·285)
- 中革军委关于重编一、三、五军团问题的训令 (11·288)
- 宁暴经过 董振堂 (11·290)
- 二十六路军举行暴动的计划 (11·294)
- 李青云给刘伯坚的信和宁暴经过的报告 (11·296)
- 中革军委关于嘉奖宁都暴动干部战士的通令 (11·306)
- 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摘录) 毛泽东 (12·3)
- 邓颖超同志给中共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座谈会的信 (12·4)
- 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 (12·232)
- 迎接 1941 年 邓小平 (15·1)
- 晋西北之今昔 贺龙 (16·1)
- 陈云同志谈泸定桥会议 (16·11)
- 对遵义会议纪念馆请示恢复陈云同志当年居室的答复 陈云 (16·12)
- 支持华北抗战中的八路军 任弼时 (17·1)
- 关于“三勤”政策 周恩来 (18·1)

陕甘宁边区三三制的经验及其应该纠正的偏向	林伯渠 (18·16)
陈毅同志 1942 年 5 月 7 日在盐阜区各界座谈会 上的演说	(18·52)
〔附〕盐阜区士绅座谈会工作经验	(18·78)
津浦路东苏皖边区抗日民主政府一年来施政工 作总报告 (节录)	(19·1)
新四军在抗战烽火中成长着	张鼎丞 (19·22)
聂荣臻在中共北方分局代表会上的报告	(20·1)
牺盟会和山西新军斗争历史的回顾	薄一波 (21·1)
关于中央分局和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来往的 一组电报	(22·1)
张闻天关于长征和统一战线的六篇文稿	(22·20)
争取持久抗战的几个先决问题	彭德怀 (23·1)
关于挺进大别山的一组电报	(24·1)
关于我党在新疆做盛世才统战工作的几点意见	陈 云 (25·1)
毛泽民为整顿新疆财政金融给张闻天毛泽东的 信 (节录)	(25·2)
在新疆的工作任务与工作方针	陈潭秋 (25·6)
陈潭秋为新疆局势变化致电中央提出善后准备 意见	(25·11)
中央关于盛世才诬我暴动我准备撤回的指示电	(25·13)
任弼时为营救陈潭秋等致周恩来电	(25·14)
中央关于向张治中接洽营救我党在新人员致 周恩来、林彪电	(25·15)

在新疆监狱中反法西斯斗争经过报告（节选）	方志纯（25·16）
中共中央给中共广东省委转七军前委的指示	（26·1）
七军工作总报告	陈豪人（26·41）
红军第七军报告（节录）	（26·72）
为什么要写信给毛主席	彭德怀（28·1）
关于在农村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一个问题	张闻天（29·1）
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	瞿秋白（32·1）
湘鄂边风暴	贺龙（32·11）
西安事变前我党就联合抗日问题与张、杨部	
联络谈判的一组文电	（33·1）
在全国扩展公私合营会议上的总结报告（节录）	陈毅（34·1）
谈神府调查的体会	张闻天（35·1）
“力群电台”文电选	（36·1）
皖南事变文电选	（37·1）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聂荣臻（38·1）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	叶剑英（39·1）
论敌后抗战	聂荣臻（40·1）

回 忆 录

周恩来同志谈个人与革命的历史	（1·4）
艰难时期的正确决策	彭嘉庆（1·48）

我的回忆	王维舟	(1·69)
伍修权同志回忆录(之一)		(1·114)
关于中共旅莫支部	孙冶方	(1·180)
1935年前后北方局的情况	高文华	(1·184)
西安事变前后争取东北军工作的回忆	刘培植	(1·189)
关于创办延安自然科学学院的经过	胡琦等	(1·211)
赣南三年游击战争	陈丕显	(2·5)
伍修权同志回忆录(之二)		(2·170)
关于“罗明路线”问题的回顾	罗明	(2·234)
山东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	黎玉	(2·277)
回顾东方军的英勇战斗和深刻教训	李志民	(4·20)
伍修权同志回忆录(之三)		(4·54)
张国焘在鄂豫皖根据地的恶行	成仿吾	(4·147)
平江扑城暴动	钟期光	(4·208)
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和粉碎国民党的		
一、二、三次“围剿”	崔田民	(4·218)
回忆冀热察抗日根据地建立的前后	马辉之	(4·259)
聂荣臻回忆录——红军时期		(5·18)
对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回忆与研究		
.....	李维汉	(5·209)
我党无线电通讯事业的创建	曾三	(6·61)
庚申忆逝(之一)	张稼夫	(6·73)
回忆无锡秋收暴动	徐彬如	(6·141)
我所知道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经济组的活动		
.....	方卓芬	(6·148)
记上海现代经济通讯社	勇龙桂 刘志诚	(6·166)

抗大抗大 越抗越大 (之一)	李志民 (7·21)
伍修权同志回忆录 (之四)	(7·143)
模范的兴国 英雄的人民	肖华 (7·226)
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工作和整风运动	李维汉 (8·13)
〔附〕动机与立场	罗迈 (8·51)
抗大抗大 越抗越大 (之二)	李志民 (8·55)
坚持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钟期光 (8·182)
回忆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的一段斗争	杨成武 (8·211)
庚申忆逝 (之二)	张稼夫 (8·239)
收复张家口之战	段苏权 (8·293)
北伐纪实	肖劲光 (9·27)
回忆苏中战役	粟裕 (9·56)
关于通道转兵一些情况的回忆	罗明 (9·98)
争取十七路军联合抗日的谈判经过	汪锋 (9·101)
谈谈我在绥蒙工作的简况	白如冰 (9·117)
回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	张明远 (9·139)
湘鄂西工农红军第四军编制的前后变化	
情况	张德 (9·154)
回顾党的六大前后	李维汉 (10·6)
山西抗战的回忆	任弼时 (10·53)
国民党改组前后和大革命的失败	吴玉章 (10·70)
解放长春	肖劲光 (10·92)
洛川会谈前后	钱之光 (10·122)
艳晚事件	宋黎 (10·139)
忆川陕根据地时期与杨虎城十七路军的	
统战工作	徐以新 (10·160)

回忆三十年代中共东京支部的成长历程

- 陈 健 梁威林 (10·169)
- 皖南惨变记(节录) 钱俊瑞 (11·74)
- 抗大抗大 越抗越大(之三) 李志民 (11·195)
- 在南方局工作的片断回忆 孔 原 (12·46)
- 关于南方局的组织机构和南方局组织部的
情况 荣高棠 (12·57)
- 抗日战争时期四川地下党的重建和川东党
组织发展、巩固的主要情况 廖志高 (12·69)
- 回忆南方局成立前后湖南地下党的工作
..... 高文华 (12·131)
- 建设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卓越思想和光辉
实践 郑新如 (12·162)
- 一条看不见的战线 童小鹏 (12·245)
- 南方局整风学习运动的部分情况
..... 王 汶 姚黎民 (12·273)
- 中央干部教育部与延安干部教育 李维汉 (13·1)
- 从百色到湘赣 袁任远 (13·49)
- 从第五次反“围剿”到遵义会议 陈伯钧 (13·80)
-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与盛世才的关系
..... 黄火青 (13·100)
- 开辟辽东根据地 肖 华 (13·113)
- 老航校诞生前后 黄乃一 (13·151)
- 回忆南方局文委——文化组 张 颖 (13·190)
- 初到陕北 李维汉 (14·1)
- 长征中的红一师 李聚奎 (14·21)

- 对我国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历程的回忆 许涤新 (14·64)
- 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前后白区党内斗争的
 一些情况 刘 晓 (14·87)
- 从山东到太行 肖 华 (14·108)
- 回忆在第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的战斗
 岁月 钱之光 (14·178)
- 从第三厅到文化工作委员会 阳翰笙 (14·224)
- 香港《经济导报》的创刊及其活动
 赵元浩 雷起予 林铃 方卓芬 (14·263)
- 回忆陕北公学 李维汉 (15·18)
- 忆冀热辽部队挺进东北 李运昌 (15·57)
- 解放军打到哪里 火车就开到哪里 吕正操 (15·81)
- 真假和谈的斗争 李维汉 (16·13)
- 内蒙古各族人民在东北解放战争中的作
 用和贡献 乌兰夫 (16·35)
- 从苏北到东北 黄克诚 (16·56)
- 李聚奎回忆录 (摘登) (16·82)
- 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辽东
 根据地 江 华 (16·131)
- 在坚持黔东斗争的岁月里 段苏权 (16·155)
- 我所了解的八路军南京办事处成立前后
 国共合作的有关情况 钱之光 (16·174)
- 解放战争时期云南武装斗争概略 郑伯克 (16·196)
- 大革命时期的湖南 (节录) 李维汉 (17·10)
- 红五军团的初创时期 肖劲光 (17·61)
- 回忆我党在杨虎城部三十八军的工作 蒙定军 (17·84)

- 内蒙工作的回忆 刘 春 (17·111)
- 我的回忆 李伯钊 (17·167)
- 彭涛同志谈“一二·九”运动 (17·191)
- 回忆东北解放战争期间东北局驻北朝鲜办事处 (17·197)
- 抗战前后天津地下党组织和平、津、唐点线工
作委员会的情况 姚依林 (18·85)
- 我在抗战时期的经历 胡愈之 (18·97)
- 一次重要罢工的回顾 周 林 (18·143)
- 抗日战争中的在华日人反战同盟 小林青 (18·151)
- 浙东四年 谭启龙 (19·39)
- 新四军第五师的抗战历程 任质斌 (19·63)
- 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公安保卫工作回顾 汪金祥 (19·82)
- 江淮春晓 谭希林 (19·104)
- 陕甘宁边区的反摩擦斗争 肖劲光 (20·27)
- 忆长征中的红军干部团 宋任穷 (20·64)
- 塞北抗日回顾 高克林 (20·99)
- 港九人民抗日游击队的战斗历程 张子燮 (20·117)
- 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在淮海战场上 滕海清 (21·16)
- 我在红三军团的经历(上) 黄克诚 (22·68)
- 回忆湘南起义 赵 镨 (22·116)
- 红军长征以后 袁血卒 (22·131)
- 我在红三军团的经历(下) 黄克诚 (23·19)
- 从大革命失败到六届四中全会期间几件往事的
回忆 徐彬如 (23·67)
- 重建鄂豫解放区的斗争 段君毅 刘子厚 (24·10)
- 千里跃进大别山的第三纵队 陈锡联 (24·28)

- 千里跃进大别山的第六纵队 杜义德 (24·52)
- 对中原独立旅战斗历程的回顾 张才千 (24·85)
- 我的经历事实简述(节选) 张治中 (25·39)
- 难忘的战斗岁月 高登榜 (25·42)
- 新疆监狱斗争中的通讯联络工作 刘护平 (25·69)
- 绥远和平解放和起义部队的改造 高克林 (26·180)
- 进军四川 杜义德 (26·213)
- 回顾西藏和平解放的谈判情况 阿沛·阿旺晋美 (27·1)
- 接管北平财经工作的回忆 戎子和 (27·18)
- 陕甘宁边区的政权建设 刘景范 (27·47)
- 忆中外记者参观团访问延安 金城 (27·72)
-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反摩擦斗争
..... 耿 飏 贺晋年 (28·8)
- 陕甘宁边区工业的发展 李 强 (28·30)
- 回忆延安《解放日报》 田 方 (28·37)
- 解放战争中参加华东、中原战场支前后勤
工作 刘瑞龙 (29·5)
- 西安办事处工作片断的回忆 孔石泉 (29·42)
- 张闻天同志领导牡丹江军区剿匪 刘贤权 (29·48)
- 《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产生前后 刘志坚 (30·1)
- 关于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党的建设的回顾
..... 马文瑞 (30·45)
- 我的回忆 李坚贞 (31·1)
- 关于朝鲜开城谈判的回忆 解 方 (32·24)
- 回忆投身西藏和平解放的历程 乐于泓 (32·40)
- 晋察冀边区党组织在战斗中成长壮大 刘澜涛 (32·82)

平山土改与整党	冯文彬 (33·18)
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文艺工作回顾	周巍峙 (33·52)
入滇前后的回忆片断	宋任穷 (34·23)
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的回顾	伍修权 (34·40)
苏鲁豫边区(湖西)抗日根据地创建时期 的回顾	郭影秋等 (34·64)
动乱中的八年	伍修权 (35·13)
回忆和平解放西藏	李 觉 (35·80)
第三野战军的渡江作战	张 震 (36·39)
周恩来是我党我军电讯、机要和情报工作的 创建者和领导者	罗青长 (36·72)
莫斯科中山大学与“十天大会”	张崇文 (37·37)
创建东北根据地的群众工作	张秀山 (37·49)
在陕甘宁边区工作、学习的回顾	刘 春 (37·68)
夺取全国胜利的伟大进军	徐向前 (38·18)
接管南京前后	宋任穷 (38·66)
北伐和南昌起义(上)	李一氓 (39·4)
新疆工作的回顾	黄火青 (39·48)
忆张家口地区保卫战	肖 克 (39·53)
难忘的三年	胡开明 (39·68)
我所知道的“乒乓外交”	赵正洪 (39·133)
抗日战争时期《新华日报》及图书出版发行 的封锁与反封锁斗争	左明德 (39·151)
北伐和南昌起义(下)	李一氓 (40·8)
接管沈阳记事	李 锐 (40·30)
我的革命生涯	张庆孚 (40·72)

战斗在胶东抗日战场的日日夜夜 王 彬 (40·90)

专题资料·综述

- “伍豪事件”的前前后后 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 (5·7)
- 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
..... 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6·16)
- 张爱萍同志为遵义会议纪念馆书写的诗词二首 (6·59)
- 新疆航空队始末 欧阳如华 (9·204)
- 关于作出南昌起义决定的情况
.....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 (10·245)
- 大连“福纺”厂罢工始末
..... 中共大连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10·255)
- 内蒙古蒙旗独立旅的创建前后 乌嫩齐 (11·308)
- 中共南方局组织系统概况
..... 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组织组 (12·5)
- 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概况
..... 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南委组 (12·105)
- 南方局军事组前段工作概况 (1939年1月至1941年2月)
..... 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军事组 (12·203)
- 我党领导的一次大规模的营救活动
..... 中共惠州市委党史研究办公室 (13·212)
- 关于胡世合事件 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工运组
重庆市工人运动史编写组 (13·228)
- 南方局领导下的青年工作

- 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青年组 (13·246)
- 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斗争和党的领导
- 罗占元 李秉刚 (15·96)
- 东北抗日联军的斗争历程 李鸿义 王 景 (15·128)
- “八·一五”前后的东北抗日联军
- 张一波 袁鲁毅 (15·173)
- 解放战争时期东北根据地的创建、巩固和
发展 丁晓春 (15·189)
- 三五九旅南下支队南征北返和中原突围
纪略 黄 铭 (17·211)
- 黄麻起义 红安县革命史编写办公室 (17·220)
- “三勤”政策是党在国统区工作的一项
重要政策 吴瑞章 黎 勤 (18·4)
- 抗战时期党在赣南“工合”中的活动和
作用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18·198)
- 抗战时期党在国统区统战工作的一些情况
..... 杨圣清 谭宗级 (18·211)
- 淮南抗日根据地概述
..... 《淮南抗日根据地》编辑委员会 (19·174)
- 浙东抗日根据地概述 浙江省委党史办公室 (19·196)
-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浙江
..... 《抗日先遣队在浙江》征编组 (19·220)
- 红军长征后中央苏区的《红色中华》报 凌步机 (19·245)
- 英明的战略决策 卓越的指挥艺术
..... 罗焕章 (20·143)
- 晋察冀边区土地政策的发展和实施效果

- 成汉昌 (20·160)
- 淮海战役综述
 南京军区《淮海战役综述》编写组 (21·30)
- 抗日战争时期的山西新军概况
 山西新军史料征集办公室 (21·63)
- 山西新军决死第二纵队概况
 山西新军第二纵队史料征集组 (21·84)
- 1927年中共中央机关由上海迁武汉的经过
 及在汉情况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
 武汉市文物管理处 (21·113)
- 1927年中共中央机关自武汉迁上海的经过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征集编研委员会 (21·128)
- 福建查田运动的前前后后
 中共长汀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 (21·132)
- 拉法、新站战斗有关简况
 中共吉林省委党史办公室
 中共吉林蛟河县委党史办公室 (21·148)
- 英雄的红军三十四师 朱光梅 (21·154)
- 中共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的成立
 及其活动 中共于都县委党史办 (22·165)
- 国统区妇女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的范例
 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妇女组 (22·188)
- 红一方面军的罗坊会议
 中共新余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23·188)
- 江西省委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中的历史
 功绩 陈立明 (23·210)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辖区前后变化的情况	李春祥 (23·215)
延安中国女子大学述略	曾瑞炎 (23·222)
刘邓大军南下和大别山解放区的建立与坚持	中共黄冈地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办公室 (24·99)
陈谢兵团挺进豫陕鄂	胥佩兰 (24·143)
桐柏解放区简介	曹一凡 (24·158)
他们无愧于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	新疆监狱斗争史编写组 (25·79)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综述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 (25·113)
1927年的中共中央长江局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25·154)
1930年的中共中央长江局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25·176)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	广西区党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 (26·130)
党领导下的桂林抗日文化运动	中共桂林市委党史办公室 (27·95)
满洲省委概述	韩志峰 王家德 (27·127)
1959年庐山会议记事	陈诗惠 (28·111)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东北问题上三国四方 的关系和斗争	金蕴芳 丁晓春等 (28·150)
太岳革命根据地发展概述	师文华 卢海明 (28·180)
1936年广东省党组织的重建和南方临时	

- 西藏军区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32·163)
- 新疆和平解放始末 朱培民 (32·188)
- 湖西“肃托事件”
..... 中共济宁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 (32·212)
- 1956年国务院体制会议介绍 李兵 (33·131)
- 北京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综述
.....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
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 (34·131)
- 北京古旧书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
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 (34·173)
- 北京同仁堂药店的社会主义改造
.....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
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 (34·193)
- 红军土城战斗与四渡赤水 叶心瑜 (34·204)
- 解放战争时期民革策反和组织武装活动
概述 王德夫 (34·238)
- 西藏平叛纪实 西藏军区党史办 (35·212)
- 川陕革命根据地综述 温贤美 杨平 (36·80)
- 郭子化与中共苏鲁豫皖特委 戚惠民 董助才 (36·116)
-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斗争概述 邓礼峰 (36·135)
- 抗美援朝群众运动简介 孙启泰 (36·161)
- 陕甘宁边区“抢救运动”始末 王素园 (37·205)
- 东北学兵队简史 学兵队简史编写小组 (37·234)
- 海外同胞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 黄慰慈 许肖生 (38·146)

美国对华侵略干涉的失败和我解放战争

的胜利 翁仲二 (38·161)

黑龙江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元仁山 (38·183)

改革开放方针形成的历史考察 孙大力 (38·214)

李大钊与苏联及共产国际 黄修荣 (39·169)

抗日战争前夕彭德怀为争取东北军和西北

地方军队所做的贡献 蒋宝华 (39·179)

解放战争时期辽东军区的政治工作 莫文骅 (39·193)

党对军队领导的几项组织制度综述 李俊亭 (39·206)

闽粤赣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及其斗争

情况 闽粤赣边区党史办公室 (40·156)

人物介绍·传略·年谱

朱德同志与辛亥革命 赵 榕 (1·18)

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蔡和森 廖盖隆 (1·29)

罗荣桓年谱(初稿) 《罗荣桓传》编写组 (6·173)

叶剑英同志在西安事变前后 陈 力 (9·165)

我的历史与思想自传 朱 瑞 (9·217)

创建闽西苏区时期的邓子恢同志 蒋伯英 (9·266)

怀念黄道同志 方志纯 (10·285)

吴玉章略传 吴玉章 (11·10)

长征中的彭德怀同志 蒋宝华 (14·129)

李维汉同志对统一战线工作的卓越贡献

..... 王 刚 李 青 余鉴则 (18·164)

- 红军长征中的任弼时 章学新 (22 · 145)
- 抗日战争时期的叶剑英 李鹿辉 (23 · 110)
- 周保中年谱 赵素芬 (25 · 202)
- 雷经天自传 (节录) (26 · 97)
- 黄一平自传 (节录) (26 · 101)
- 邓小平在广西
 广西区党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 (26 · 105)
-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潘汉年 刘昌亮 (27 · 151)
- 庐山会议与彭德怀 王 焰 (28 · 47)
-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周恩来在潮汕等地的革命活动
 蔡超 刘纪铭 陈汉初 (29 · 56)
- 周恩来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潘合定 (29 · 105)
- 刘少奇视察黑龙江林区 元仁山 王正清 (30 · 71)
- 我所了解的徐明清同志 孙达生 (31 · 59)
- 刘少奇在盐城 王世谊 (31 · 206)
- 杨虎城与西安事变 孔从洲 (32 · 100)
- 何孟雄反对立三、王明路线的斗争 张祖柱 (32 · 150)
-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马明方
 强晓初 李力安 姬也力 (33 · 111)
- 李六如传略 凌 辉 (34 · 98)
- 张闻天传略 程中原 (35 · 118)
- 陈翰笙事略 吴友文 田 野 (35 · 188)
- 罗瑞卿传略 (上) 黄 瑶 (36 · 171)
- 项英传略 王辅一 (37 · 105)
- 罗瑞卿传略 (下) 黄 瑶 (37 · 154)
- 陈毅在赣南闽西 蓝君文 (38 · 84)

- 罗荣桓同林彪的一次原则斗争 梁 汉 (38·108)
- 叶剑英与我党我军历史科学的研究 范 硕 (38·125)
- 党的挚友陈嘉庚 曾昭铎 (39·234)
- 革命教育家谢台臣传略
 中共濮阳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 (40·145)

大 事 记

- 延安整风运动大事记 贺晋清 (8·313)
- 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大事记 黄修荣 (16·216)
- 辽沈、淮海、平津战役记事 傅国祯 周宏雁 (21·167)
- 西北解放战争大事记 吴序光 (22·209)
- 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大举出击，经
 略中原”记事 周宏雁 袁 伟 (24·164)
- 抗战时期中共人员在新疆工作和斗争大事记
 徐慈君 (25·25)
-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大事记述
 晋察冀大事记编写组 (27·170)
-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董必武、
 彭德怀、贺龙等同志建国后视察黑龙江
 活动年表 龙 言 (30·220)
- 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大事记
 《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丛书编辑组 (33·175)
-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内夫利特(马林)在华记事
 杜魏华 (36·223)

中共组织史资料

- 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届代表大会、中央全会和中央委员、
中央领导机构情况的资料 (3·164)
- 中国共产党黑龙江省组织沿革概况 (初稿)
..... 王 景 金字钟 (7·264)
- 1921年至1927年上海、江苏、浙江党组织发展概况
..... 上海中共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档案馆等 (10·181)
- 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沿革概况 袁 伟 (11·327)
- 太岳革命根据地领导机构和行政区的沿革
..... 阎文彬等 (15·223)
-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福建党的组织机构、
领导人员变动情况及其主要活动 (17·241)
- 抗战期间中共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组织发展概况
..... 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18·181)
- 东北抗日联军组织序列 金字钟 常好礼 (18·226)
- 中共中央中原局、刘邓野战军、大别山各解放区
组织序列表 中共黄冈地委党史办公室 (24·201)
- 1927年至1937年间的中共陕西省委组织概况
..... 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等 (32·248)
- 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沿革 雷渊深 (34·218)
-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华北地区中共顺直省委和
北方局组织沿革梗概 王乃德 (36·103)
- 五大至六大期间山西省党的组织状况 赵 朴 (37·267)
- 五大至六大期间东北三省党的组织状况 赵 朴 (40·198)

专题调查·专题访问

- 恢复俞秀松同志在党史、团史上的地位 (1·224)
- 刘仁静谈托洛茨基派在中国 (1·238)
- 黎川事件的真相——访肖劲光同志
..... 李泽才 张 炜 (5·305)
- 屈武谈周恩来敦促张治中释放被关押在新疆的
一批共产党员的情况 欧阳如华 (13·272)
- 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开辟 张云逸 (19·33)
- 何长工谈罗坊会议前后的几个问题 (23·173)
- 刘志坚谈桐柏区的几件大事 (24·94)

史 实 考 证

- 有关平江起义若干史实的考证 吴定邦 晓 玉 (8·359)
- 叶挺同志在皖南事变中被扣的经过 郑建英 (10·296)
- 关于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几个问题的
调查和考证 中共于都县委党史办 (22·234)
- 李富春、蔡畅由法国赴莫斯科时间考 阎永雪 (28·232)
- 关于国民党“一大”代表人数诸问题的考辨
..... 周兴梁 (31·255)
- 关于中共陕北建党时间的考辨 高中哲等 (33·151)
- 为《湖南致中央函》辨白 吴荣宣 (35·243)
- 红二、四方面军长征左纵队全部经过了青海
班玛地区 张世华 索 南 (37·261)

小 资 料

- 金粉泪五十六首 陈独秀 (4·316)
〔附〕简释陈独秀《金粉泪五十六首》 陈旭麓 (4·329)
西安事变、红军南下支援抗日友军 (9·203)
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籍贯概览 李 伟 (27·242)
卢福坦其人 陆友山 (30·243)
苏联珍藏有吴玉章的《八一革命》手稿
..... 李良志 (35·255)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创立的震东社会科学院
..... 陈汉初 (36·254)
党的各级委员会制度在军队的恢复
..... 瞿定国 周炳钦 (38·255)

转 载

- 抗战时期中共人员在阿克苏区的工作情况
..... 中共新疆阿克苏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 (25·271)
关于1946年6月23日上海人民和平请愿
运动的一些回顾 刘 晓 (26·231)
彭德怀同志视察敦煌小记 王文焕 (28·235)

日 记 摘 登

- 《秦蜀日记》摘录 武志平 (19·113)

对日记的补充和说明	(19 · 158)
附件：(一) 杨虎城给武志平的信	(19 · 169)
(二) 孙蔚如给武志平的信	(19 · 171)
(三) 王宗山给武志平的信	(19 · 173)
阵中日记 (摘录)	(20 · 186)
随毛主席重上井冈山日记	汪东兴 (40 · 124)

译 文 选 登

《陈独秀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摘译	美籍华人郭成棠 (1 · 256)
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史料三则	马贵凡译 (38 · 242)
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	[苏] Г·З·索尔金著 马贵凡译 (39 · 255)

读 者 · 作 者 · 编 者

《赣南三年游击战争》序言	谭震林 (2 · 5)
回忆周恩来同志和美国记者李勃曼谈话的一 些情况	吴 青 (5 · 317)
对《1935年前后北方局的情况》一文的补正	孔 原 (5 · 321)
敬告读者	(7 · 288)
来函摘登	(7 · 289)
来函摘登	(13 · 280)

- 李昌同志关于“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问题给中
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一封信 (17·188)
- 在党的历史转折时期的重要文献——评介张闻天
的六篇文稿 张培森 (22·60)
- 新发现的张闻天农村调查史料述评 张兆宪 (35·5)
- 《平津唐点线委员会》补遗 安捷 (37·276)